

中國工業化通論

谷春帆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573.07
924
2

論通化業工國中

(業工新與明文舊名原)

著帆春谷



3 0610 9668 5

行發館書印務商

04007

A 210231



序

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是：什麼是工業化，中國爲什麼要工業化，中國能不能工業化，尤其是工業化對於中國各方面有什麼影響，發生什麼作用。

這本書不討論如何工業化，譬如說要如何開礦，要如何辦工廠等等，這是技術問題。這本書也不討論在何種條件下推行工業化，何種政治經濟制度，何種社會理想。換句話說，我並不提出政治立場社會理想。這種態度似乎奇怪，也不免困難。但正是我個人對於工業化問題一貫的認識。

我對於工業化的認識其實很簡單。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要賴工業化。中國文化政治社會道德教育的型態與含義，也會得隨着工業化的步伐方向而進展。雖然不便說工業化是因其餘是果。但很可以說，如沒有工業化做背景，則對於將來政治社會道德教育的型態，便不易有具體概念。工業化是問題的核心，他表示中國文明轉變的方向。

中國在將來要採取什麼政治制度，什麼道德標準，要走上軍國主義，或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不是現在所能立刻解決，至少不能於現在完全解決。他祇能隨着工業化而解決。中國應當工業化。工業化便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覺得中國維新以後八十年的紛亂，是認錯了問題妄

作主張所起。我這本書僅是想指明這個問題所在。

因此，在本書中，我不說道德哲學應當要如何改變，而祇說工業化時道德哲學會得如何改變。我不說政治社會應當要如何改變，而祇說工業化時政治社會會得如何改變。我不說工業化時生活文化種種方面應當要如何改變，而祇說他會得如何改變。換句話，我不提出主張，而祇指出可能。

建國問題，千頭萬緒。四千年傳統文化的轉變，尤其包含千千萬萬問題。各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見解。但問題的本質，顯然包含時間性在內。長期的理想的解決方案，與眼前的現實的問題，本質不同，答案亦不同。人是在現實裏生活而又富於理想的動物。其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又隨年齡環境而不同。克利滿沙說：三十歲以下而不醉心社會主義是無血性的人，三十歲以後而仍醉心社會主義，是無腦子的人。血性與腦子，感情與理智，不免永久是一個矛盾。但天下事很多正面扯結不解，而在旁邊可以輕鬆解開的。若有人對於明天天氣的陰晴扯結爭論，便教天文學家也很難判斷。但是不須躁急。到明天自然解決。工業化既是問題的核心，是建國必要過程，我們祇當努力於工業化。一切政治問題，道德問題，思想問題等等，雖非不值得考慮討論，卻不值得扯結爭執。得到工業化發展時，這些問題，自然有個適當的解決。

我自己常常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裏感到苦惱。本書內隨時隨地均提到這些苦惱的思想。有位老朋友覺得從寫作技術上說，這些問題可以避免，或雖提到而可以輕快些。這是真的。但我

覺得爲這些問題苦惱的人不止我一個。我之所以忠實地將苦惱的心緒時時寫出，正可以使同感的人更深切認識這問題，因或許更能贊同我所提出的「從旁而解答」的答案。如其因此而使人們對於工業化的努力更爲正確，對於扭結不解的主張更能認識其危險而放鬆，則中國生存發展的前途庶幾進一步，其障礙庶幾少一步。

這本書初寫在一九三五年中日關係緊張時。那時先有一些關於中國工業化展望的意思。抗戰以後，注意到中國民族性的缺點及文化的惰性。絡繹又寫了關於國家及政制諸篇。最後寫了緒論中時代精神工業化及結論中工業化可能性速率限度諸篇。

各篇文字有一部分已經在各種雜誌上零散發表過。現在收在一起時，幾乎大多數完全重寫過。寫的時候原有預定系統，所以本書不是論文集而是首尾貫穿的書。許多朋友讀過一部分或全部，也有不少批評。現在或生離死別，或語默殊勢，不能一一記名。我自己的思想過程，在這幾年中，也大有變更。所以初稿內容與現在很不同。雖經重寫，或許尙留一二漏未更改的地方。而現在的稿本，隨着時代的變遷，或許又要修改。我的主張，我的書，與中國工業化一樣，要隨着時代走，也祇有時代能決定他。

谷春帆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三十日

此書於三十一年七月脫稿後，種種困難，至今始獲刊行。時隔三年，雖情形無變。而著者思想，又稍不同。復讀一過，彌增感慨。時間之與中國真無關係，獨吾以有涯隨無涯，可

畏可哀。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六日補記

此書初版之時，著者方從美國回來。原稿甫經檢查通過。雖有許多新思想，一字不能更改。現在抗戰勝利，檢查取消。時間亦稍充裕，因復重為改訂出版。戰亂正殷，政治糾紛難解，工業建設無望，愈覺得對此問題正確瞭解之重要。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補記

555.3
924.4

目次

第一篇 緒論

- 一 時代精神……………一
- 二 工業化……………九
- 三 從不變到變……………一七
- 四 中國文化之脫輻……………二五

第二篇 中國文明

- 一 進取文明與停滯文明……………三六
- 二 欣賞與知足……………四三
- 三 兵與武功……………五四
- 四 家庭倫理學術宗教……………六一

目次

—

第三篇 民族性

- 一 農業組織與社會意識……………七七
- 二 真正農民……………八五
- 三 士大夫與組織……………九三
- 四 氣節面子等等……………九七

第四篇 政治問題

- 一 放任政治……………一〇四
- 二 中國民治運動……………一一一
- 三 法治與經濟關係的轉變……………一一八
- 四 中國政制展望……………一二四

第五篇 國家

- 一 中國人的國家意識……………一三三
- 二 國家意識之演進……………一三九

三 戰爭與和平……………一四四

第六篇 工業建設的可能性，速率與限度

一 爲什麼中國尙未工業化……………一五一

二 資本……………一五八

三 資源，人工，組織……………一八二

四 國際合作……………一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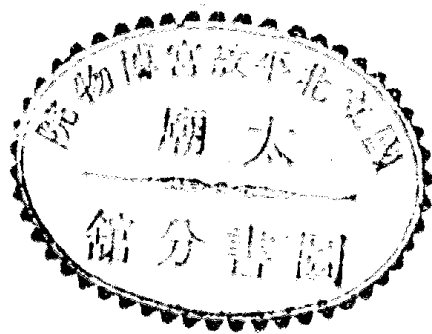
五 工業化的中國……………一九九

中國工業化通論（原名舊文明與新工業）

第一篇 緒論

一 時代精神

有兩種勢力支配着中國，左右了中華民族每一舉措，決定了中華民族每一形態，並且暗示着中華民族未來命運。這兩種勢力，就是（一）新工業文化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民族主義，（二）中國傳統經濟背景所造成的民族性與文化。中國現正在新舊嬗遞的過程中。不獨中國，世界亦在新舊嬗遞的過程中。新工業文化，經過產業革命，將中古時代古老僵化的人生文物社會輪廓摧毀改造，世界各地無不被其影響。但各地感受新工業文化的早晚深淺不同，其本來的傳統歷史文化環境不同，因而世界各地對於新工業文化之容納，抗拒，因應，轉變，亦各不同。中國之受新工業文化影響比較遲，舊文化之歷史比較長久，故其轉變比較艱澀。因而中國問題，從大體上說，與世界各地之適應新工業文化雖是相同。而從其個別的傳統歷史文化環境說，卻是一個特殊問題。尤其因為新工業文化，即在發展最早的歐美，還不會達到具體常規的



狀態。非但新工業文化的內容，還不會固定，其輪廓還不會固定，甚至其方向亦未必已經固定。各種衝突激烈的勢力與思想，正向着各方面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二十年的世界，其改變多麼快，多麼重要。誰也不能保證將來會發展成何種形態。中國要從舊的文化轉變到新的文化，而新的文化本身又在轉變中，所以中國是雙重轉變。想從事實與歷史方面，試為尋出支配中國兩種勢力的輕重與其轉變的趨勢，即是新工業文化新政治思想及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狀態，以及傳統經濟生活與民族性與文化的轉變狀態，並要注目到世界新工業文化的轉變方向與歸宿，這是本書的企圖。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精神。現在正是大變動的時代。時間是繼續的，文化是連綿的。新的時代精神即使與舊時代完全不同，其根芽總在舊文化舊時代內胚胎孕育出來。如其我們真有巨眼高手，我們應當能夠從歷史的趨勢上，大體看出未來時代的輪廓，

首先，我們可以指出生產力的發展。從工業革命以後生產力大大解放。二十世紀以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以及第二次大戰中間，生產力的擴充更是可驚。飛機，無線電，汽車，原子彈，農業機器，電汽化，以及企圖變更氣候的大堤壩等等，均是最近期內發明或實地應用的事物。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發展的前途，可謂無限。科學家已經預言人類不久可從空中淡氣得到養料，可以大量將煤，水，空氣做成衣料，可以從原子中解放無限量的動力。這種繼續擴充生產力的努力與成功，我們預料，勢將繼續。不獨和平時要擴充生產，戰時亦要擴充。

現代戰爭，如其雙方作戰精神無多懸殊，則主要的便是生產能力之比較。有強大軍艦，坦克，飛機的國家，單獨說來，總是打敗了軍艦，坦克，飛機生產不足的國家。所以交戰雙方全要竭力擴充生產。戰爭或許會得使某些物品的生產特別受到注重，但雙方均不得不注重生產技術之改良與生產效率之提高。這一趨勢將來必定繼續着。在歷史上我們見過生產力停滯的社會，其文化生活及國力亦趨停滯。尙未見過生產力前途大可發展，而人類自甘知足停頓的事例，中世紀時對於商工百業均有限制，但中世紀是生產力停滯的時候。其限制商工業是社會生產力停滯的反映，不是生產力被阻的原因。貪得進取是人類本能之一。如其科學前途有新的發見，則人類生產力之發展亦可以預料。

與生產力的發展相應而來的，便是人類對於分配平均享樂公平的要求。人類以其智慧，以其力量，征服自然，增加物質供應。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功績，而是全體人類的努力。所得成果，應當全體共享，而不應當歸少數人獨享。工業社會中資本家獨占資本，農業社會中地主獨占土地，使工人農人在失業與貧窮中掙扎的分配制度，永久將成爲人類不滿意的根源，永久將成爲改革爭執的對象。而其趨勢總是逐漸要使分配更公平。因爲一般人民智識水準之提高，以及正義理性的力量，大資本家大地主欺騙羣衆分裂羣衆而使資本土地一切財富享用更獨占更不公平的反動，不容易有實現可能。尤其因爲生產力的擴充，財富享用總量的增加，縱使工農羣衆所分配到的成數相對沒有增加，其分配到的實數絕對必有增加。在分配多寡的變遷中，必有

爭執以至爭鬪。工農羣衆越有理智，即越有力量，其公平分配的目標，越能和平得到。否則也許要經過流血革命的方式。但不論方式如何，公平分配的趨勢是確定的。

第二點我們可以指出企圖統一世界的勢力衝突。在歷史上列國並存的時代，國際間的戰爭總是有的。人類有一種本能，自己要充英雄好漢。這種好勝心昇華 (Sublimato) 而爲愛國心。在現代世界上要圖生存發展，非有大力量的組織不可。生產力之發展超過了國界的限制。要市場，要原料，要殖民，要在國際間發展競爭，均要依賴國家組織。所以隨着十八九世紀工業革命而來的就是歐西各國的建國運動，各國在內部均盡力於國家機構之統一與建立，對外均盡力覓取處女地及落後國家作爲殖民地。整個世界漸漸被分割爲若干勢力範圍。從那時候起，從未有過均勢的世界。所謂均勢是各國各自擴充勢力的藉口。列國並存的趨勢總是各自向抵抗小誘惑大的地方自去擴充。到得世界分割已盡，生產力膨脹不已，已得的把握不放，未得的恃強搶奪，因此而有世界再分割的戰爭。現代國家對於殖民地分配的爭執，所謂「生存空間」，所謂「包圍政策」，全是世界再分割的縱橫戰局。在建國擴張的初期，世界勢力範圍未定。國與國間縱有利害衝突而致動武，祇是兩國或三四關係國間局部的戰爭。世界分割已了，南北東西沒有一角落沒有強大的主人。即使名義上獨立的國家，事實上往往亦爲某一強國的勢力圈。強國之間又各以一時的利害關係而結爲陣營。所以世界再分割的戰爭，不再是以前局部的國際戰爭而成爲世界性的戰爭。不戰則已，一戰則全世界全要捲入漩渦。十八九世紀沒有世界戰

爭，二十世紀祇有短短四十年倒有了兩次，這是明證。

企圖統一世界的戰爭，是強與強的戰爭，非到一方殲滅，完全消滅抵抗力不止。所以現代閃擊戰術不貴爭奪土地而必須消滅對方主力。這樣白熱殘暴的戰爭，雙方均不得不竭盡國家全部精力。因此全體性的國家主義成爲最有效的工具而保留而發展。非但實際戰爭時如此，即在戰前準備時期亦是如此。除非此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人類真能以和平方式處理國際爭端，而漸能從和平達到世界統一。否則全體性，極權，計劃，統制的國家組織將與殘酷延長的滅國戰爭間歇而繼續發生。

現代戰爭是生產力發達的結果。戰爭與文明均是生活力量充裕的表現。現代戰爭尤其需要很大的消耗。若不是生產力充物，可以移低度生活以外的餘力來製造軍備，則現代戰爭無法實現。生產力薄弱的時候。即使各國並存，有敵愾，有競爭，沒有人想以一國之力吞併天下，想到也不會見諸實行。生產力發展，人們自己覺得真有莫大力量。但小小世界卻被割據的羣雄細住了，無處發洩。力的充物刺激了統一的雄心。所以十八九世紀無人想統一世界，另造新秩序。生產力再增加，則強國的勢力亦必增加。弱小國家一天一天減少，或消滅或降爲附庸。世界祇有幾個大國，戰爭更凶更殘酷。每次戰爭均是世界戰爭。其每次戰爭的間歇期限，隨着生產力累積的擴充，亦可能的日益密接。祇有壯丁的補充，或許仍要相當時期，因此限制了捲土重來的時間。

但是世界不必定由武力來統一。世界各民族各有歷史語言生活文化之不同。真正的統一不必使各民族的思想道德生活文化完全一律，但必須使各民族間不同的思想道德生活文化可以互相了解，並存而不害。武力統一的世界是幻妄的統一。必須於武力統一以後，再將思想道德生活文化等等一齊統一起來，就是說將失敗的民族完全同化或消滅以後，方能合到極權獨裁武力統一的全圖。這幾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反之容許各民族不同的道德思想生活文化而在相互了解下和平相處的統一，是理性的統一。儘管表面上富於差異性，而互相尊重理性尊重別國別民族之自由，其統一倒是真正可望久長的。如其人類能從這種高尚目的下求世界之統一，則列國並存，而民族儘可自決。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的作風必須停止。各國國內政制亦必須是非常民主而完全堅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民族的個性與人民的個性儘管發展而不妨礙全世界之和平統一。究竟人類將以武力求毀滅的統一，抑以理智求和平的統一，雖尚待努力，而統一的趨勢則是必然的。

第三點可以指出的是一般理智水準之提高。十八九世紀至今一般民智實已大大提高。現代西洋人的一般理智水準，已足以使中古時代之專制壓迫政制，不能存在。現代獨裁領袖並不像中古專制帝王之以個人喜怒爲出發點，至少表面上亦以國家利益爲出發點。獨裁領袖雖能利用羣衆心理，製造侵略藉口，而仍要將戰爭責任諉之別國，將和平正義歸之自己。其對將來世界亦仍以新的「秩序」號召。可知獨裁領袖亦不得不以和平秩序爲終極目的。即使他們自己不相

信和平秩序，至少他們不敢違反民意，不敢放棄和平秩序。既然多數人願意和平秩序，則和平秩序的運動早晚自必發展而建立。

現代極權國家有一套新的愚民政策。宣傳教育與智識封鎖，在一時亦頗有效果。但這僅是十年左右的事。其執政其人民均在未極權以前得到高等知識。新的宣傳教育政策是不是影響到次一代以至次二三代人的智識水準，尙待時代證明。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很複雜精細。非有哲理及社會科學的瞭解，及多數智識較高的人民，不能完美運用。國家生產力及武力之擴充，亦不能單靠自然科學及應用技術。即使退一步說，照極權國家的理想，科學家祇發明新武器，人民的手與腦祇訓練成爲使槍放炮的傢伙，仍不能使人民不得到新的理智，科學研究的影響往往會改變人生觀，哲學，道德與政治理想。物競天演進化互助等等哲理借自生物學。相對論及電子是物理學的發現。但其影響則人類對於物質，時間，以至是非道德之心均受改動。如其將來優生學有新人種子方法，心理學有新的發明可以「境造」(Condition)羣衆心理，原子動力解放成功，則其影響決不限於實驗室以內，可以斷言。好智好奇亦人類本能之一。習羣模仿更爲人類天性。已經受過理智薰陶的人類，如璞玉已斲，無法回到渾渾噩噩的時代。世界交通日繁，人羣接觸日多，思想封鎖，愚民政策，一天一天困難。所以一般民智之提高，在將來似無可疑。且不因極權國家之政策而改變。(極權國家之愚民政策，或可使民智開通延緩一些。)所以可預知者，科學會有什麼發明，有什麼影響。

上面三點，有相成處，亦有相抵處。世界本是參錯矛盾勢力的交織品。其中最主要一點，生產力發展與分配之趨向公平，明確無疑。全能國間世界性的殲滅戰，與人類理智的涵養深沉，將互為消長。列國並存，其趨勢結果為統一亦可無疑。歷史上誠然尙不曾有過人類以理智克服戰爭以和平達到統一的奇蹟，但人類亦從不曾有過普遍受理智訓練的機會，如現代一樣。古代民衆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觀察與主張，及其主張之有效程度，均比現代差得多。我們不能因為從前沒有，便決定將來亦一定沒有。民智提高是事實。雖高而尙不能克服戰爭，亦是事實。我們祇承認此事實，將來理智能否迅速普遍提高使世界能不流血而一統，或竟被戰爭所毀滅，不獨待時代證明，亦要待今人及後人之努力。H. G. Wells的「未來世界」是以交通發達為樞紐的大同世界。Olaf Stapledon的「第一代人類」是中美兩國領導的世界聯盟，但結局仍不免戰爭而毀滅。雷海宗先生推測從封建式的分裂局而起至西洋大帝國統一要五百五十年，距今尙有一世紀。我不是預言家，亦不願預言。我祇從過去以推測今後一二百年內事物趨勢。在這一二百年內，生產力一定還要大大發展。科學與技術亦要飛快的進步。人們要想種種方法來建設永久的和平秩序與公平分配。而野心的政治家則仍要企圖以戰爭來統一世界。前途盡賴吾人努力。結局雖不可知，而趨勢卻自明朗。那就是（1）生產力與公平分配，（2）全能戰爭與民族自決，（3）理智，三方面共同發展。其中最末一項理智是最不可知的項目。間接說來亦是最重要的項目。科學會有什麼新奇的發明，如何改變現代人生哲學，完全不

能預測。

從中國說來，問題亦很清楚。我們應當以公平的分配來提高生產力，應當提高理智。全能戰爭與民族自決的衝突早已捲進了我們，更無法避免。過去的傳統文化與民族性能不能及，要保存，亦常用這種新的標準來衡量。我們是否在戰國中消滅掉，抑擔得起東西聯盟的領導責任，要看我們自己的努力，亦要看國際局勢的機會。

二 工業化

要提高中國生產力，要提高中國人智識水準，要使中國能自決地擔當得起全體性戰爭，祇有一條出路，乾脆又乾脆，要工業化。

以工業化爲萬應仙丹！不免有人要說我偏見。工業化是常用而又常常誤會的名詞，應當先解釋明白。

工業化不是單純的辦工廠，築鐵路，開礦，造輪船。亦不是單純的利用機器生產。亦不是單純的大量爲市場生產。亦不是單純的採用科學管理方法。亦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辦工廠，築路，開礦，使用機器，大量生產等等是工業化的重要工作之一，但不就是工業化。五六十年以前李鴻章張之洞諸位已經辦過工廠，辦過路礦，辦過機器，現在有多少成績？

我所說的工業化注重在「化」字。化是王化教化風化同化的化。工業化是以工業建設爲中

心，創立一種企業進取組織管理的精神與習慣，成爲社會人羣生活活動的標準。而使一切文物制度思想，依着這個中心標準精神而同化的意思。所謂文物制度思想，包括一切。大而國家民族的根本大計，小而鄉下老太婆豆棚對話的生活觀念，盡在這範圍以內。

工業化不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那種自欺自慰的說法，早已失敗。工業化並不是中國本位文化，加上一套工業。那是牛頭上裝馬面的辦法。工業化亦不是中西雜揉，說春秋合於公法，孔教合於耶穌，那是聊以解嘲的笑話。但工業化亦不是全盤西化，因爲西洋文化究竟不限於工業。這些爭執，或者想保留一些古董，或者想全古腦兒換新，全不是我所說的工業化。

工業化是以工業建設爲出發中心，以工業生產組織之精神及方法爲標準。其他經濟政治社會道德方面之制度思想合於工業精神者推行之，違礙者排除之，無關係者放任之。因此舊制度舊思想必有大部分要改變，亦必有一部分無須改變，而另外又必加上許多新制度新思想。所以工業「化」的結果，既不是中國本位文化加上一套新工業，亦不是全盤西化沒有一些舊根蒂。我們現在應當明白，自清末至今一百年的改革，有些是工業而不化，有些是化而不工業，所以沒有發生多大成效。社會是一根節節勾連的連環，政治，經濟，道德，思想，制度全是連環中之一節。如其甲往東而乙往西，丙要走而丁要住。這個社會祇有混亂，不會有進步。即使大家往東，如其甲走快而乙走慢，也還是不興。或是把甲拉跟斗，或是把乙拖住了。

然則所謂標準的工業生產組織之精神及方法究竟如何？向來講工業革命多注重於工業革命

的變遷與影響，很少提出其精神方法，當作一種教化風化來講。歐洲人從工業革命以來，人生哲學，道德觀念，社會組織，政治制度之變更，均是漸進不自覺的演化。起初是工商企業的發展，隨後人們自然而然以辦工商企業的精神方式來處理社會國家事務，來應付人生日常問題。他們原不必抽象提出工業精神及方法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現在吾們既然是自覺地要以工業建設來同化一切文物，思想，制度，吾們不得不大膽嘗試，將工業精神與方法抽象列舉出來。這種嘗試工作，未必會恰好；但即使掛漏也沒有關係。因為實行工業化時，仍要與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一樣，從工業建設中訓練出精神方法來，並不是用這些抽象的文字刻舟求劍去辦工業。工業精神與方法，並非完美無缺。工業革命以後，已有許多流弊，但亦有許多進步。我們的工作並非批評其善惡，而祇是從分析歸納中提出一些工業革命抽象的精神。這是必要的。工業之所以能「化」，不在其有機器資本等實物，而在其精神訓練。

工業精神係從西洋工業革命中發展出來。R. H. Tawney 教授的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曾經詳細敘述，近代工業生產，獨立奮鬥，勇往邁進，打破一切桎梏，以求個人事業成功的精神，如何在工業革命的初期，受宗教改革的支持，而發展成爲社會上公共道德。Leonard Woolf 在 *After the Deluge* 中，又詳細敘述工業革命時刺激起來的勇猛奮鬥精神，如何在政治方面，演爲法蘭西的人權革命及美利堅的獨立戰爭。這種政治上求自由（經濟發展的自由），求平等（生產機會的開放），求享樂（事業成功的報酬）的精神，便是工業革

命所「化」出的精神。L. C. A. Knowles 教授的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又詳細敘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如何逐步「化」出到世界爭霸。鐵路與輪船「創造了新的大英帝國，新的積極的帝國主義以及十九世紀末葉新的農業」。近代國家主義，近代社會思想，近代霸術政治，就從這裏再「化」出來。工業革命勇往邁進以求成功的精神，可說是一切社會政治的指導精神。從蒸汽機到鑄錠到化學戰爭是科學的「進」與「化」。從小城市小店舖到計劃經濟到大帝國，是事業組織的「進」與「化」。從飢寒凍餒國無蓋藏到金融獨霸大托辣斯等等是財富殖物質文明的「進」與「化」，從個人自由的奮鬥到統一世界的雄圖。鬭爭力量日強。鬭爭範圍日大。治事效率日求增高。政治機構日求充實。任何時，任何地，可以尋到一個勇猛精進求高求大求強求權的精神，在後面作主。工業生產的進步無限。其「化」出來的求高大求強權的精神亦無限。表現在社會政治的各方面。世界是各種強力激盪的場所。人類是一般大力的狂流。在幾種新發生的運動上，我們還看得出一些工業精神同化社會的痕迹。假如「效率」一觀念，本為機械生產力高低的概念。合理化標準化均為工業生產而起。現在均有擴大到政治社會上應用而成爲事業指導精神的趨勢。生產技術，生產組織，生產精神，所給予人們的教訓經驗與暗示實在深廣，竟將整個人類變化氣質。人們在工業中得到的做工精神做工道德，竟成爲日常生活處世接物的哲理與習慣。不期然而然人是工業「化」的人，世界是工業「化」的世界。這種求高求大求強求權的工業精神，正與中國的農業道德相反。所以中國工業化，決非簡單的工業建

設，而要將整個文化，整個社會，連中國人自身一齊變化過來。

爲什麼要從工業化來着手推行改革呢？

中國是三千年的傳統農業社會。如將有史以前時期算入則或有五六千年農業根基。其文明的各方面深受了農業社會生產力停滯不進，財富蓄積不豐的影響，養成了知足寬弛消極的精神。其民族性，從現代眼光看來，散漫無組織，孤獨自私而無大的社會意識。卑順馴伏沒有自信力。遲緩不緊張。非但實質的武力武備夠不上世界標準，連心理上亦是一向和平雍容慣了，喚不發揚激越的愛國熱情與國家主義。政治組織統一的基础還很薄弱。全能的政府無處着手。這許多事實全與眼前大時代的需要不合。在生產力日增民智日高日趨統一的世界裏不能有效應付，更說不到領導世界。這種種弱點其根源來自年深月久的農業生產。小農耕作自給制度，生產力長時期停滯不進，資本蓄積不豐，交通不便，工商業不發達，是一切困難的中心點。所以要救亡圖存，要提高生產力，要開發民智，要擔當全體主義世界戰爭的任務，乃至要參加和平統一的世界，俱不得不工業化。工業化是針對農業化的說法。

爲什麼要以工業建設作中心？以工業建設來「化」政治社會道德思想？爲什麼不以社會政治道德等等的建設來「化」工業？社會政治道德等等均與經濟相連。社會政治等等之改進亦可以促進工業化，這事毫無疑問。但吾們必要以工業化爲中心，以工業來領進政治道德社會等等，這固然可說是經濟史觀，唯物史觀的看法，但另外尚有兩層原因。

社會進步，國家建設，要諸多方面步伐協調，不能太快太慢。所以一社會一國家之進步，常爲其中步伐最慢的一個份子所決定。吾們不能預料道德政治一切制度思想比之工業建設究竟誰最頑固最不容易變化。但我們確知道一切制度思想盡是人爲的，而工業建設則含有實物的限制較多。所以政治思想道德等等如其進步得慢，其限制是人的限制。吾們終希望人的限制，可以用人的力量加速使其變更。但工業建設則不獨是人的限制，而有物的限制。沒有鐵礦不能用人力來造一個。沒有資本不能用魔術變出來。創辦工業要相當日子。機器生產數量與速度均是可計算的確數。所以工業建設的時間要受實物環境的限制。其速度，其動向，比較確定。因此，可以以工業建設的速度與動向作爲其他社會進步的領導中心。

更重要一層理由，因爲工業建設是個可以切實把握的樞紐。我們要改革。但社會政治等等舊的文物制度思想，一切的一切，像一把亂絲。若不能找到一個提綱挈領的地方，便無處着手。在農業社會內，家庭是經濟單位。自給自足。生產分配就在家庭中完成。小工業小商業亦是家庭化的組織。因爲如此，許多現代工業化國家能做的政事，能推行的改革，在中國便行不通。工業國家生產集中，運輸集中，分配集中，金融集中，政權集中。政府祇在集中的樞機地方着手推動，而人民及國家的經濟生活，知識生活及政治生活的改動，便可以鉅細無遺。尤其在經濟方面，生產事業的動向，資本流動的歸宿，什麼物品應當生產，生產若干，分配給何處使用，什麼物品應當限制，限制到如何，祇消在少數樞機地方着手。因此有計劃的發展成爲

可能而有效。在農業國家便不能如此簡單有效。政治設施，往往祇限於一紙命令，而命令往往不生效力。所以農業經濟社會是縱有千萬鈞氣力沒處着手的社會。

我說工業化要以工業建設為中心來同化其他文物制度思想，就因為工業建設，（一）有明確的方向與步調，（二）有方便着手的樞機。生產技術，生產關係，是一個社會的根本基礎。其他文物制度思想是建在這種基礎上的樓閣。基礎改動以後，上層的文物制度思想，自然隨之改變。所以工業化是中國革新運動最提綱挈領的辦法。

當然從其他文物制度方面也可以發動改革，也可以影響到工業。譬如說，廢科舉改學校這件事，對於後來民智之開發，自有很大功用。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所掀動的巨浪，無論革命本身成敗如何，總不能說沒有巨大影響。但各種文物制度思想，如其是獨立的自發的改革，則各種改革運動非但缺乏聯繫，不容易推動；更容易互相磨擦，意志力量互相抵消而致失敗。熱心於一種改革運動的人，竟可以成為別種改革運動的阻礙。而整個改革運動，成為混亂錯誤。過去八十年的維新運動，就是如此。因此我們有確定工業化為中心領導運動的必要。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自然要同時從各方面用力，但其中中心目標則為工業建設。其方向，其步調，要多少依照工業建設的領導。例如隨着工業建設之推進，人口職業及居處要移轉。其結果當然是家庭組織的變化與都市的興起。間接是人民社會意識增加與道德觀念改變。我們不要固執舊家庭制度舊道德觀念來反對革新。但我們亦不便先拆散了家庭關係，先建築了

新式都市，來等工業化，又如利用機器大量生產，使產業金融運輸集中在少數樞紐地方，市場原料的需要拓展到國外，因而發生國際競爭，國家意識，間接結果是促進政治機構之效能，激發人民世界意識與國家觀念。但我們很難生產散慢的時候求政治上的統制與計劃，亦很難在自給自足的農耕時候講國際競爭。又如工業化後，生產力提高，人民活動進取的機會增加，因之責任心與自信勇氣均增加，保守寬弛卑順消極之習慣改變，間接而生活方式人生哲學均有變更。這種種方面隨着工業化之進展，亦可以齊步進展。但很難脫離了工業建設，而企圖以宣傳命令訓練等等方式來改變人們之生活習慣與思想態度。

眼前中國三件工作：（一）提高生產力與公平分配。（二）擔當全體戰爭與民族獨立自決，（三）提高民智，全可以從工業化來發動而謀解決。工業化以工業建設為中心。提高生產力是第一直接結果，無待再說，一切生產事業充分應用新技術新機械新方法。財富增加，人民享用提高，分配自趨豐富，因而更易公平。工業的訓練，提高人民智識水準，改變人民生活觀念，使人生哲學道德價值完全改變。生產力的提高，物質財富之增加，使人民更有餘閒的時間，創造文明生活，提高理智。亦使人民更有餘閒時間，創造國防的武力。現代立體式的世界戰爭，與要求公平分配的政治經濟鬭爭。均需要人民的組織及理智，而參加和平統一民族自決的世界，尤非有高度組織高度理性不可。這些全是工業化的事。

工業化是整個文明的轉變，這種轉變在中國已看得出。

三 從不變到變

許多古代文明，經時代的推演，已經烟消雲散，只能在考古學者發掘的遺物中去推尋。而中國文明，經過至少二二千年，或四千餘年雖在停滯挫折的過程中，卻始終保存不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二千年近於停滯的古老文明，在近代不到一百年的東西文化刺激下，居然受到極大的震盪，而轉變的影響很為著明。此中消息，從不變到變，要從何處理解。

一種文明要能在停滯的狀態下保存，不發生根本變化，要有三種條件。一要做這種文明的根基的生產力及生產關係不變。二要做這種文明根基的階級關係不變。三要沒有超越於這種文明的外力來破壞。一種條件不具備，則此文明非毀滅即轉變。中國小農耕作自給制度二千年來無甚變化。農耕的技術不是沒有改良。鐵器犁牛灌溉施肥深耕等等的發明，曾經將西周時代封建農奴在「曾孫」田畝」等徭役勞動的關係下，解放成爲自由庸耕田主佃戶或莊家的關係。從西周到戰國，是銅器時代進達鐵器時代的文明。但從此以後農業生產力便停滯了二千餘年沒有大進展。工業與商業之進展更緩而又時有頓挫。唐宋以後，工人方從徭役工作逐漸轉變到自由工作，從宮府御用工業，轉變到私人作場及行會工業。前漢中葉。雖已進到貨幣經濟。已經有了少數爲市場而生產的特殊商品，如絹絲酒鹽鐵之類，並且發生了商業都市與交通。但經過五胡三國之亂，特別在華北，又重復回到實物經濟的地位。遠洋貿易，在唐宋以至元明，日有發

達。而好望角航路發達以後，中國商船竟逐漸退步到近海貿易。這種過程在二千年長時期中，屢進屢退。有時更受到外族侵略壓迫而有長時期的頓挫與退縮。有時更因為災荒，土地兼併，苛政，人口壓迫，而發生動亂。由於動亂而破壞生產力之發展。雖然中國也有工商業與交通。但在大體上，可說是始終不曾超越二千年傳統的農業文明。在二千年來任何一個時期，恐怕像現在一樣，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從事於自給自足的農耕。因而這種農業文明，也就經過二千年不變。政治上朝代之更迭，使一般研究中國史的人，以為中國文明在循環的過程中。像轉輪一樣繞回到原處。這是一種錯覺。中國文明，從初人到石器到銅器到鐵器到現今，是在進展的過程中。但其過程特別緩而又時刻受到頓挫。從戰國到五口通商，中國文明祇在一個時代內進兩步退一步的爬行。不能叫他周期循環，因為他並不是周而復始，而祇是遲緩頓挫。我們叫他停滯。因為從戰國到現在，二千餘年，中國文明，始終不曾有根本改變。二千年前的道德教育哲學，二千年前的生產方法，生產組織，二千年前的階級關係，二千年前的法律系統，政治制度，社會風化，在二千年後依舊支配着今日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們叫他停滯。二千年來中國生產力與生產技術，沒有根本改變。永久是小農耕作的自給自足制度。（這裏所說小農制度對於大地主土地分租給農人小塊耕作，也認為小農。因為我所說的小農制，是其耕作制度，而不是其田地所有制度。）所以中國文明，二千年來，也永久是這麼老樣不變更。生產技術決定生產組織社會關係的最大力量。生產技術不變，則其上層結構的文明自然也不會

變。

中國雖然累次經過外族的統治，但中國文明，非但不曾被統治民族所消滅。而統治民族，反爲中國文明所同化。在統治的過程中，在征戰壓迫的過程中，中國文明的進步，暫時受到挫折，有時竟開了倒車，如上面說五胡亂華時華北從貨幣經濟退化到實物經濟。但在較長久的時時以內，中國文明——記着這是農業耕作的文明——又燦爛發揚起來。統治民族在這種過程中沒落下去。我們的農業文化與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與近代工業國家的文化，各自建築在不同的生產技術與生產組織上，可以說是三種不同的文化，正表示三種不同的人類生活方式。我們的文化，原是爲了適應我們日常生活而發展出來的一套習慣，及固定化起來的組織與制度。任何文化祇是適應生活的方式。所以任何文化，祇要能夠適合於當時的生活方式，而能夠容許生活各方面豐富的發展，這種文化，即是適宜的文化。不適宜的文化，即不爲時代生活需要所容納，必然要改變要淘汰。因爲文化是抽象的名詞，而實質是生活。在生活與環境不適合的時候，人自然會改變其生活方式。同時改變其環境。因此同時改變其文化。誰也沒有切身的利益，一定要維持某一種定型的文化，而犧牲其自身生活的安適。中國文明是小農耕作自給自足的文明。我們祇要剴切承認這點。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累次同化統治異族者，即因爲中國人之農業文明。在上者以敬天法祖等等農業道德來統治，在下者以安分守己等等農業道德來事上。地主與農民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一向如此維持着。因此中國農民的文明，即會得留存發展起

來。游牧民族不能強迫中國四萬萬農民改變其生產技術與生產組織。因之他即不能改變這種經濟狀況下的中原文物制度。非但如此。統治的游牧民族，一經住定下來，在農民頭上去統治，他自己就失去游牧的生產方式，而寄生在農民身上。因之他還祇求中國農民之能夠增加生產——增加稅課徭役的負擔。爲統治民族的利益打算，祇有鼓勵農民繼續耕作。因而更不得不維持一切向來認爲適宜於這種耕作的文明。中國中古歷史上華北最黑暗時代是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統治華北的胡人，還是累次均田勸耕。結果弄出北魏孝文帝的改制改姓等等辦法。滿洲人在中國不到一百年，便連自己的文字言語風俗甚至姓氏多忘記了。我們看兒女英雄傳裏的旗人安老爺迂腐得多少可憐。一個寄生在農民身上失卻自己生產力量的民族，他除卻完全放棄自己的一切，而投降在農民們所造成的文明圈套裏以外，更有何種辦法？

中國社會中的階級關係，自然不是完全沒有變更。歷次朝代更迭，地方變亂。當此之時，地主或淪爲胥隸，奴僕平民或升爲顯官重鎮。但亂事平定下來，田地重墾起來，即重新發展了農業生活，亦即重新維持了農業社會的階級關係。有地的仍是地主，種地的仍是農民。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太薄弱，實際生產的農民，從不會有很多餘裕資本的蓄積，使他們在可憐的自耕自給以外，再發展一些高度的資本生產方式，一些較奢侈享用的生活，和其相應的商工業交易。中國階級關係不發生根本變化，亦即是中國文化繼續保存的一個原因。

歐洲中世紀的文明，跟海通以前的中國文明，可以說根本上沒有甚大差異。同樣是農業文

明。歐洲產業革命，將舊的生產技術生產組織一齊推翻了，建立起新的生產關係。所以歐洲文明隨之而變化，而中國則繼續維持着小農自給的制度，生產技術與組織既沒有內發的變化。外來的侵略，雖使他時刻頓挫，像又不能消滅他。階級關係時常緊張到潰決的程度，但馬上又補綴起來。二千年來老在這停頓中進退。若說中國文化「根深底固」，這真是榮幸的褒獎，是得天獨厚的異賦。但觀於中國文化屢次被外族統治而阻礙發展，長時期在「悉索敝賦」的分配制度下，有不能生活而反抗的表示，我覺得中國文化的根基實薄弱得可憐。文化是生活標準種種方面的結晶。中國人至於長期內岌岌乎危殆到不能維持其生活，而謂其生活結晶的種種方面「根深底固」，竟是常而嘲笑。自從東西文明接觸以後，不曾見西方人受中國影響而改變生活。中國自稱為根深底固的文明，卻七穿八洞，支撐不住。要說中國文明根深底固祇有一種意義。中國是積世農業國。中國人的生產技術，祇限於農業。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人。中國人的資本蓄積貧弱。其富源不曾開發，不能輕易發展工業生產。其面積雖大而可耕地不多，分配於耕農，尙嫌不足，不能充分利用作牧地（因為牧地生產的食料數量小於農場），當然也不會回頭去做游牧生活。因之中國的地理環境，人口分配，生產技術，最適於農耕，在游牧民族的統治下，不能改變其農耕之文明。在工業文明的侵略下，也不能改變其農業文明。因此說農業文明是中國根深底固的文明。如其從這種意義來讚美中國文明之根深底固，那簡直是說中國沒有改進的希望，那真是太不幸了。

三個維持中國文明的必要條件——生產力不變，階級關係不變，外力不來破壞——在五口通商以後完全變了。資本主義照着自己的模型到處捏塑。在中國也被捏塑出一個資本主義的雛形。無論是人們所咒咀的帝國主義，亦無論是人們所歡迎的民族資本，總之在二三十年小農自給的文明社會裏，移植了資本主義方式的工業生產。而且其勢力逐漸侵蝕到「根深底固」的農村裏去。本來以降低生活程度為惟一方法來勉強維持農業文明的中國農村，竟不像一般人所設想的堅固，而摧毀，而崩潰。新的資本家，在新的生產技術與生產組織中興起來。漸漸要代替地主的權威。新來的侵略的工業文明，不像從前游牧民族一樣，容忍並鼓勵農業文明的發展，甚至自身投降到農業文明中來。外來的工業文明，竟拆壞了農業生產關係，來適應其工業的需要。強迫農業生產成為工業的附庸。破壞了農業文明的根基，引起從清末到現在的擾亂——還沒有停止。將中國最現代化的都市，與內地農村社會對比一下。我們可以看出新的外來的工業文明如何影響到舊的古老停滯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尤其得力於現代交通，穿透了長城的任何一角。最初是物質生活的改變。價廉美麗精巧的機製品，輸入內地市鄉，使內地人的消費標準改變。洋紗代替了土紗，洋布代替了土布，紙煙代替了旱煙及水煙，煤油代替了菜油豆油，洋火代替了火刀火石，洋襪代替了布襪，洋麵代替了土麵，皮底鞋或皮鞋代替了布鞋，玻璃代替了雲母，洋紙代替了土紙，洋糖代替了土糖，洋車代替了轎子兜子滑竿，輪船代替了帆船，火車汽車代替了馱馬民夫，電燈代替了油燈。衣食住行各方面，漸漸均為工業文明的產品擴張

勢力的地盤。從都市到內地，其現代化工業化的程度雖然不同，但其趨勢卻無不同。不獨消費方面，人的生活工業化起來。生產方面，也同樣工業化起來。已經工業化的都市不用說了。工廠的煙囪改變了作場行會師傅傳授的工業關係，新的金融業交通業，隨之發生。新的建築，新的市政，新的港灣，倉庫，道路的設備，均為題中應有之事。非但都市是工業化了。西北許多鄉村，生產大量棉花的地方，十二三歲的青年姑娘，沒有褲穿，遠望見人，羞得蹲身下去。他們所種的棉花，不能自己紡紗織布，而要輸出到上海或大阪，供給工業生產之用。十幾年前陝西大荒，政府及慈善機關的救濟工作，不是放米麥，而是發棉種，誰都知道棉子不能充飢。然而爲了工業生產的利益——同時也是爲了被災農民的利益——爲市場而生產之棉花，其重要不得不超出自給自足的食糧生產以上。如此還能說中國農業文明是根深底固，可以頑抗工業化的侵掠嗎？我們古老停滯的農業文明。在工業化前，真如秋風落葉般地被掃除了！

文明是生活各方面的結晶。但人的生活主要不外乎其生產消費的活動，衣食住行的享受。這種種方面，既然被工業生產所變更了，則根據於這種生活而爲其上層建築的政治，社會，道德，哲學，教育，家庭，還能維持不變嗎？頗有人慨嘆，中國人對於現代物質儘量享受，而對於工業化不能有絲毫供獻。這種說法當作悲憤之辭，自然說得過去。但人的生活與其觀念，不能永久打成兩橛。一個耳目口鼻手足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儘量享受現代物質生活的人，而說會戴一個十八世紀的腦袋，會有十八世紀的人生哲學與道德觀念，是不可思議的事。中國有少數人

對物質生活能夠追隨上去，他不是沒有付代價；中國人所付的代價太大了。他將幾千年來的整個中國農業文明，來交換這些微物質生活。在兩種文化接觸的時候，一民族中幸運或優秀的份子，能夠吸受新的文明而同化，其代價是民族中其他落後或機會欠佳的份子所擔負的。現代都市工業化的興起，與內地農村之破產，互為因果。我們能夠在現代都市中生活，譬如說穿到美妙的織品，是因為遙遠的被忘記的甘肅大姑娘，犧牲了他最必需的褲子來供給的。在文化轉動過程中，這種慘酷的犧牲，真是更不絕書。美洲的紅人，澳洲的土人，印度土人，有多少同化在白種文化中，有多少消滅了。明史記俺答強盛，三娘子當政，雅慕華風，乞簪珥於邊吏，久而同化。三娘的簪珥，正如吾們的蔻丹高跟鞋，是整個民族整個文化付了巨大代價的東西。不獨如此，近代史之無量數的革命內亂及對外戰爭以至這幾年中日戰爭，盡是中華民族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接觸的代價。中西文明不能不接觸，不能不衝突，是已成事實。我們不能回到閉關時代去。在接觸的過程中，農業文明，破壞崩裂，而一部份轉移到工業文明上去，亦是已成事實。慘痛非人道的天演淘汰過程，在我們的自己身上，自己眼前進行。我們應當咬緊牙關忍痛來迅速完成這種過程，抑或當儘可能的力量來耽誤這一種過程。譬如患外症人，應當快割，抑應當緩消，這是永久苦惱我人的一個問題。非但因為這個問題是自覺的，所以對我成為苦痛，即在一般人間，這個問題，亦在不知不覺中，有兩種趨向。一種主張維新，一種主張保守。近百年來歷史上的動亂，如當作新舊之爭看，似乎無甚關係，如其當作民族文化動手

術割治的時期看，真夠重要。

四 中國文化之脫輻

改革的企圖，與復古的衝突，即表示中國文明之脫輻。有史以來，中國文明之脫輻，恐無如今日之甚者。作爲中國文明根基的農村是破壞了。而且日日在破壞着。但作爲中國新文明的工業根基，卻還沒有確立。現代中國農村所有的不是文明而是黑暗。生活的不安定，人口的敗亡，家庭鄉村的解體，田疇的荒廢，使許多樂天安命，知足和平的農人，成爲流浪搶劫殺人放火的匪徒，或委轉溝壑無力生存的弱者。節儉退讓服從和平的農業道德，幾乎轉爲無顧忌無恥辱的偷生，苟且殘暴與怨恨。農業舊道德禮義廉恥正在破壞。而工業新道德，獨立勇往精神，不曾建立。因而「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廉恥的鑽營欺騙，掠奪，哀告，破壞了政治道德，商業道德，與人倫關係。因爲道德的破壞，人生目的人生標準的喪失，而一切成爲空洞，一切成爲混亂。一切舊的成爲腐敗。一切新的成爲幼稚。而造成近三十年混亂之局面，自來一種文化之成爲典型，必有代表此文化之中心人物。更有製造此文化之大衆勞動。希臘文化有貴族與奴隸，工業文化有資本家與勞工，中國向來農業文化有地主及農人，但在現代中國轉變的過程中，則竟一無所有。向來支持文化中心的地主，及爲其代表之官僚士大夫，已走上沒落崩潰之路。他們經濟基礎的破壞，即是他們道德文化社會組織的破壞。二千年來作爲文化資料

之勞動大衆的農民，則流浪遷徙，而爲盜爲寇爲死爲病。他們生活的破壞，也就是大衆文化的破壞，文化本是生活標準的結晶。現在生活的各方面均支離破碎，則爲其結晶的文化，亦自落於空虛。

一種舊的文明，如其爲內發的新文明所破壞而替代，必是因爲舊的文明不適於生活，而發生新的生活方式與思想之故。這種文明的轉變，從舊的生活過渡到新的生活，總是向最適宜於生活的方面走。這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徵。新文明即在舊文明中孕育胎生而來，則新文明進一步，舊文明退一步。隨時是充實活力的表現，而沒有脫空的時候。因爲新文明如其尙不到破壞舊文明的程度，則舊文明不會破壞。而舊文明如竟破壞，則必是新文明已經充實。所以在社會中各個體附麗於舊文明的雖沒落，而附麗於新文明的，卻必然產生接替，作爲社會的主幹。歐洲工業革命時，農民的沒落，是伴着工業的興盛而來的，未嘗有脫空的日子。但就中國說，則舊文明的破壞，其最初因子，不是由於舊文明內孕育出新種子來。而是舊文明內由外力硬加入新分子進來。因此在一個時期，舊文明已經受外力的擾亂而開始動搖破壞，而作爲新文明的種子的未來人物，還在吸收新文明孕育懷胎的時候。這裏即是一個最危險最衝突最動亂的時候。因爲舊文明一經與新文明接觸，則舊文明之生產技術生產組織與生活方式即不免受外力的破壞。而新文明的孕育，從新的生產關係之建立到上面會社層之調整而結晶爲另一文明，即須要相當時候，如其新文明不能從內心誕生，則舊文明破壞消滅，而新文明不繼，即會成爲非澳

美各地土人一樣之消滅。或舊時生產技術方式所結晶的文明之破壞過速，而新文明之生產過遲，則這社會之文明會得暫時解體而成爲黑暗時代，如希臘羅馬滅亡以後之歐洲，如五胡亂華之中國北方。現在這種情形，又迫近中國。小農自給的生活，已經被外力所破壞，而且更在深刻破壞着。因而這種生活所結晶的文明，正在崩潰。同時新的生產方式，新的文明生活，卻正在孕育而尙未長成。因此中國文明，在這轉變期中，成爲一個脫輻。

這種脫輻的嚴重，從新舊思想事物道德的衝突中，可以看出。新的工業文明，是無遮蔽的營利，獨立勇往的貪得主義。這與農業文明傳統的節儉退讓禮義廉恥發生了衝突。在政治方面，工業文明，不是充分放任資本營利的政治制度，便是以國家力量扶掖資本生產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這又與傳統的敬天法祖無爲不擾的王道政治發生了衝突。人口向都市移動，朝出晚歸的工商業經營，破壞了農業社會的家庭及以家庭爲工作單位的制度，而建立了以生活結合的小家庭制度。新的事物，新的理想，拆散了孔孟老莊的哲學，改變了人生觀念。交通的發達，時間觀念，效率觀念，改變了生活的各種規律。新的事業組織，與舊的事業組織；從官署到商店，新舊方式，均發生了衝突。中國已經深深捲入工業文明中去了。其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雖仍舊墨守古老的農業耕作。但現在的農耕，與從前的不同。其自給自足的根基已被工業化打破了。代表農業文明的人，從地主舊官僚軍閥到不識不知的農民，殘散而日趨沒落。農業生產，日日陷作世界工業生產的附庸。這輩人也就天天被擠迫而脫離生產，還企圖苟延舊文化

的殘喘，而作殊死的掙扎，造成民國二十餘年來大小顯隱的軍閥割據與內亂。我們試一分析二十餘年來民國史上作爲無名英雄而被軍閥利用的兵與匪，便知其無非是農業文明崩潰後驅逐出後的游離勞動力。二十餘年來亦曾有紀律好的兵，與實心要奠定中國的舊式武人。但試分析其背景，又有多少不是代表沒落的農業文明與農村生活的人物。就是他們，與代表新興工商業利益的市民們，鬧着不斷的鬭爭。

在日常談話做事中，常常也可以注意到這種文化脫幅的衝突現象。例如在西洋人的眼光看來，總覺中國人之維新，效法西洋，只是皮毛，不得真義。中國號爲民主國，而二十餘年沒有憲法，有了憲法，也不十分執行。中國有了新式的官署與工廠，而所位置的人物，往往非親即故，非裙帶，即花瓶。中國人不講求時間觀念。更不講求效率觀念。而在中國老輩人眼光看來，又覺得世界反了，鬧得不成樣子。西洋人總覺中國人不愛國沒有國家民族思想，而老年人又以爲青年人們的愛國活動太要不得。不好好念書，什麼宣傳遊行，成羣結隊，演戲唱歌，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攪得家宅不安。這是國家民族思想的脫幅。作爲農業文明主要支柱的家庭制度，婦女問題，在這新舊文明交替時，更表現重大脫幅。受過新教育的女子，重新發現了他們的人格獨立與自由。從賢母良妻下解放出來。但社會沒有相當工作可做。許多人反入了放浪的一途，使家庭反受了損失。結婚的自由或至少徵求當事人意見，已經相當通行。而男女社交，在多數地方，仍未公開。因之錯誤的姻緣，或許比父母盲目作主從門戶關係上放定，不見

得減少。離婚已很通行，而再醮仍不免有心理上的芥蒂，夫婦之道更增加了痛苦。家庭對於兒女，特別在守舊的家庭下，還是一種壓迫，將青年人爲家庭而消磨犧牲。社會的新的鼓勵，在這種青年心中，種了反抗叛離的根苗，使他們只想脫離家庭的羈絆。但社會除卻空頭的鼓吹反抗外，不能在物質上精神上給予同情的指導與安身立命的出路。因而青年的煩悶徬徨，感覺自身國家社會前途的無目的，成爲中國文化脫輻的重要現象。更嚴重的是知識階級的煩悶，及智識階級與民衆之脫輻。中國文字，很早已經與民衆脫離關係。但知識階級之道德觀念人生哲學，卻一向在民衆的立場上出發。二千年來儒道兩家的教條，經過治家格言太上感應篇等等通俗化的勸善文獻，可以規範窮鄉僻壤的思潮，而賦予人生以一種道德的意義，至少使其覺得生活不是沒有標準的胡鬧。這是使時代文明與人生發生聯繫的最重要的紐帶。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或鄉長或縉紳，一切足爲大小人羣儀式典型的人們，無論其如何缺乏學問，但其道德觀念與人生觀，卻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人生道德觀念。亦即是最高學府與統治者的人生觀念與道德觀念。因此古代中國的學校教育雖然不發達，而其社會教育網的普遍，可以使山巔海涯偏僻地方的人民，能夠在同一個道德標準人理想下生活。他們相互之間，可以說得明白，因爲他們是在一個文化一個世界裏生活。這是中國文明的大骨幹，現在，在工業文明澎湃的過程中，這個壁壘也破壞了。現代智識階級所稗販得來的是工業文明的哲學觀念與道德思想。對於在崩潰的農村文明中掙扎的多數人——他們是不自覺地在工業革命下犧牲的人——非但沒有生活上的親切體

驗反而是叛亂不經，完全脫離實際生活的教條。他們可以體驗到三家村冬烘先生孝敬祖宗的生活理論，而不能了解現代大學教授所介紹的柏格森杜威的哲學。他們更不願意自己數十年生活體驗到天經地義的大道理，在鬚髮蒼白的暮年，反過來去接受小孩子們演戲唱歌的教訓。你告訴他要愛國，他告訴你日本人來了，一樣也可以種地。你告訴他要普及教育，他說鄉裏人只要搨得起鋤頭種地就是了。你告訴他婚姻要自由，他說你反抗父母要氣死父母了。你說人民要有集會言論的自由，他說你要造反了，鄉裏人只能種地不管這些。你說傳染病有微生蟲，要清潔消毒，他說是瘟神下界，要打醮求神賽會。你說水旱不調要種樹造林，他說這是天災，沒有辦法。你說要打破狹義的封建思想，要利用外國人力資力，他非但說外國人「非其族類，其心必異，」並且對於別省人別縣人，也以爲外路人，在所當排。這樣，現代道德與現代哲學，對於現代多數的中國人生活，非但是隔膜的，外來的，並且是擾亂他們生活安定，破壞他們傳統文明的因素——而且的確是如此。並且這種工業化的道德與哲學思想，非但爲擾亂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生活，農業文明的因子，並且即在民族優秀的智識階級，介紹這些思想道德的人們中間，亦缺乏確切的標準與一致的見解。政治主張，從極左到極右。道德觀念，從極新到極舊。在甲地可以男女同浴，在乙地且不許同學。他們自己沒有一致的標準，可以作爲人生的理想歸宿。他們自身就在徬徨回惑中生活。先知先覺尙然如此，更何能堅確獲得後知後覺的民衆的信仰？現在中國文化脫輻的嚴重到如此；即是百分之八十之人口——農人——仍舊在二千年來的生產

技術與生產組織下，一方面冒着生產資料生活程度一天一天下降的危險，來維持其生命。他方面其二千年來安身立命的農村組織家庭關係社會關係，卻又天天鬆弛破壞下去。他們在崩潰與沒落，空虛與貧窮，兩種過程中，勉強維持二千年來的生產技術。這種偉大悽慘的犧牲過程，不能不反映到社會的每一角落裏，而表現為智識階級青年份子的煩悶徬徨暴動衝突。若問現代中國文化是什麼，竟有些回答不上來。舊的文化是沒落着，而且必然要沒落。新的文化誠然要建設，而現在在動亂中，在衝突中，沒有一致正確的認識。有人以為中國是個真空。但新的雖然動亂，其動亂的程度，已足使舊的崩壞，既有動亂崩壞，決不是空。而且要是真空，倒可以將新的文明，自由建設起來，不愁阻力。惟其不空，所以難辦。

中國小農自給文明之不能不轉讓於現代工業文明，是實迫處此無可逃避的事勢。中國有三萬萬農業人口，不能立刻轉變為工業勞動，更不能立刻從工業勞動中得到福利，亦是預料的事。慘酷的淘汰，雖然在歷史上儘有前例。然而歷史是人事的紀錄，是人做的。人類最原本的目的先要求生存。一種文明如其結果是要淘汰多數人的生存，或多數人豐富的生存，以適應一小部份的人，則這種文明，決不是理想的文明。中國文明要從農業文明改變為工業文明，其理由豈不是要謀多數人生活之豐富切實。如其為了改成工業文明而要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權利，則這種改革，明明是買櫝還珠的辦法。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是任何有理智有人性的人所不能同意的辦法。即使這種改革為歷史的使命，甚至是決定的命運，而人類為了生存權利，亦只有

反抗着，而創造自己的生命。一百年來守舊反抗的動亂正是這樣。恢復閉關經濟與小農自給文明均爲必不可能之事。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之脫輻爲現代人類一大問題。如擁有四萬萬人口之中國，老在破壞崩裂的小農自給文明下掙扎；則世界爲人類之世界，我不自謀，必有人越俎代庖者。歷史上民族的同化過程，往往是強暴的侵略的征戰。統治與流血的過程，是同化的一種方法，往往不容許人們選擇，往往對於愈頑固的場化愈慘酷。自鴉片戰爭以迄現時之中日戰爭，正爲中國農業文明在工業文明世界中脫輻而引起之同化作用。這種過程沒有方法可以避免。同化是歷史的必然。我們要抗戰無非要爭得自由同化之權，使我們能夠用自己的意志來推行同化，而免被人征服後依他人之意志來進行奴化的同化。抗戰的意義亦只有作爲獲取同化自由的一種手段。因爲只有充分工業化的中國，纔可以奠定東亞。以至世界文明於安定，也只有充分工業化的中國，纔可以使四萬萬向來陶鎔於小農自給文明的人口，能踏上世界文明的水準，而得以繼續生存。也只有將中國充分工業化起來，纔可以使二三十年來停滯知足消極和平的舊文明，重新獲得新生命。而現代中國問題之最苦惱最艱巨的一個，亦只是如何可以迅速有效，而以最小的犧牲使中國從小農自給文明轉變爲工業文明。使中國文明內部自身的脫輻消泯，更與世界文明的脫輻消泯。

這樣轉變過來的中國新的工業文明，是如何一種文明？有人震於全盤西化一名詞之駭人，以爲放棄了中國本位。其實此事無須以口舌爭，所謂文明者其根基植於生活方式及生產關係。

其上層建築之大段輪廓，亦隨此生產關係而定。但並不是上層社會政治道德等等關係的細微節目，亦完全要被生產關係所決定。許多與根本生產關係衝突之舊社會遺物，必然要破壞。而且許多已經破壞了，例如科舉制度。許多正在破壞着，例如大家庭制度，舊道德觀念。許多尚待破壞，如地方觀念，閉關思想。但亦有許多與生產關係無根本衝突，或稍微轉變即可融洽的上層結構，即沒有改變放棄的必要。文明是永久轉變不息的川流。即以中國文明之停滯，長時期內，亦不乏轉變之迹，每次變化，總有許多舊文明的遺物可以承受改良，而容納下來。這種事實，不勝枚舉。耶穌教與工業文明沒有必然的關係。然而中世紀的教育改良後，在工業文明中，一樣有重要地位。羅馬文明早已消滅了，然而羅馬法在現代文明中一樣有地位。可知生產技術及關係的變更，并不需要剷除舊社會的一切，而只剷除其絕對不能融和的部份。舊社會組織，越是能夠改變適應新環境，越有保存的可能。越是頑固不化，越有消滅的可能。中國文化中所吸收容納的外國文化種子，不知多少。如果古代中國人也抱着頑固不化的態度，完全拒絕外來文化，則中國文化，恐怕連二三十年來停滯的成績還不能有。我們以土布土紗代表國產文明，而以洋布洋紗爲外來文明。但孰知棉花根本是從外國輸入的？我們常服長袍馬褂，林語堂先生所謂穿了心裏覺得舒適平安者，原是滿洲裝，人所共知。但幾人知道唐宋以來，一向稱爲古裝者，其中竟有許多是胡裝。椅子是胡床。樂器有胡琴。王瓜是胡瓜。葡萄苜宿是西域產。認爲中國法律權威的唐律，其中雜有鮮卑法系。認爲理學正宗的宋儒，其中雜有佛家思想。認

爲民族掃墓節的清明野祭，原來是胡俗（註）。甚至中國民族本身是許多種族雜糅的結果。如其一定要問純粹的中國文明，恐怕只能追溯到四十萬年前的北平猿人。正爲中國文明兼收並容許多外國文物，而且不會消滅中國文明之本身。我們更可以預料，中國吸收西洋工業文明後，仍有許多舊文明的遺物，可以承受而不變。雖然西洋工業文明，要根本改變中國小農自給文明，與歷史上許多游牧民族之被同化於中國者不同。但衛道愛國之士，亦無所用其杞憂。倒是頑固不化，不肯迅速轉變順應，而自甘向消滅之路，那纔是可憂的。我們要明白，所謂文明的轉變，不是機械公式的轉變。所謂文明，並不是一定不易的模式。並不是西洋工業文明，一定要用刀叉喫麵包牛油，亦不一定要父子分財分居。亦並不一定要抱腰接吻，亦並不一定與拜跪髮辮不相容，亦並不與長袍大褂不相容，亦並不與敬神祭祖不相容，甚至亦並不與挂名的皇帝及跪迎盡禮的婦女地位不相容。中國文明，只顧充分工業化，只顧大段上將小農自給的舊生產技術關係及其上層關係改變，而中國的新文明，必然仍是中國文明，不是西洋文明。他是工業文明而帶有中國作風的文明。正如美國英國德國是工業化文明，而各有其作風一樣。究竟中國文明中有幾許可以遺傳，有幾許必須更變，大部份雖受生產關係的決定，而一半還要看看中國人自己對此問題之認識。因爲文明究竟是人爲的東西。舊生產關係與新生產關係不能適合的文物，固然必須更變，但未嘗不可以人力有意識地遲延或加速其過程，亦可以使其早熟而先變。例如中國科舉之廢，在生產關係充分變化之前，亦可以使其成爲文明的盲腸，而遺留一些形跡。其

與新生產關係無何不合而可望遺留者，亦可因人們自己錯誤的攻擊或過度的狂熱而成爲不必要的犧牲。中國文明之必變，農村自給文明之必然變爲工業文明，可以無疑。新生活與舊生活不能並存，但其轉變過程之遲速，上層社會關係轉變之程度，卻有賴於中國人有理智的選擇與安排。一百年來只見盲目的狂亂破壞，與盲目的頑固保守，誰能對這一問題有澈底的了解。

（註）寒食掃墓這件事，很可以引來證明風俗如何同化。寒食禁烟本是中國成俗。但披髮而祭於野，卻是胡俗。不知何時混作一事。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五代會要曰，「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野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見通鑑後漢紀二，注。但歐陽修尙云「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國幾何其不爲夷狄矣。」可見當時雖已成俗，仍有人認爲來歷不正。胡人無墓，故祭於野，中國人采其野祭而不采其披髮。又改其野祭爲祭於墓。胡祭不知何時，中國又係之於寒食。後唐莊宗本胡人，其寒食破散，又沿用中國節令。一小事而同化時有如許變異，殊有趣。風俗之相互影響如此。今則寒食掃墓成爲民族禮典，罕有議其爲胡俗者矣。

第二篇 中國文明

一 進取文明與停滯文明

文化，文明，民族性，全是常用而意義含混的名詞。Clive Bell 曾說文明是「一時代一社會心理背景表現的風味。一種特殊而通行的觀念，在社會上表現的色彩。」此種說法我很同意。引申出來，「一時代一社會心理背景」，就是所謂民族性。這種風味色彩所憑藉以表現的制度與活動，即是文化。再將 Clive Bell 的話引中，則文明是抽象的，文化是實質的，而民族性是心理的。文化是生活結晶的標準，文明是生活的精神，而民族性是生活的心理背景。但文化與文明慣了往往互通，我亦不必一定嚴格分別。

因此，從我的解釋，文明與民族性，是一種根本東西之兩方面的表現。一民族之文明，必然反映其民族特性，而成爲民族心理經過生活方式所塗抹的粉彩。但反過來，文化是具體成爲制度的民族性。制度多有惰性，故文化反成爲改變心理規範心理的力量。文明是生活各方面的裝飾，是人生的精細化與裝飾化。所以文明一定是人爲的，任何民族均有文化。極原始的初民

民族，以采集果實或狩獵爲生，亦有其特殊之生活方式，卽有其特殊之文化，但精細裝飾的人生，卻非任何民族所有。初民可以說是沒有或沒有很多文明。其他民族各就其地理環境生產技術歷史傳統力量之影響，而發展較多或較少之文明。因爲每種文明各在特殊環境下產生，各有特殊的心理習慣做背景，所以每種文明，均有其特徵。這種特徵，通過生活各方面及各種制度而表現出來，可以從其心理狀態與生活方式作抽象的觀察。

文明是人生的閑暇活動，是維持簡單生命必需活動以外的餘暇創造。因此代表一民族之文明象徵者，恆爲民族中之有閑階級。有閑階級之生活及心理狀態，自與大衆平民不同。但他們究竟不能脫離此時代此社會而生活。所以他們的生活，雖然精緻化了風味化了，卻脫不了大衆生活的映射。但因爲此種色彩風味是抽象的觀感，所以能夠指出其明朗的作風，可以說爲文化的局勢，文化的中心。

將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對比，其最顯著的分別，爲力量與速率。吾們常說力敵萬夫，事實上無此人。但現代工業機器可以發生上萬匹馬力者並不稀罕。將來小小一粒原子能也抵過了幾萬人。中國人最大的力的單位不過牛馬。其利用風力水力處也不過代替二牛馬而已。蒸汽機電汽機內燃機等所發生的偉大動力，不是中國文明所固有。在速率方面其對比亦同樣顯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快不過傳驛，每小時不過二三十里爲最。十九世紀時美國紐約到波士頓三百四十英里要乘驛四天。貴陽到重慶里程約略相當於紐約到波士頓，以前通常要走半月餘，現在

坐飛機瞬息可達，速率的進步奚止百倍。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是強力與速率，而中國文明則細膩停滯。這是進取與停滯的分別，是中西文明大段不同處。

進取文明與停滯文明在心理上及在社會活動上的表現，可以貪得與知足作爲分別。西方文明之無限制的進取，與其心理上不知厭足的佔有欲相伴隨，表現於社會上大量財富的聚積。R. H. Tawney 教授用「貪得的社會」(Acquisitive Society)來表示現代西方文明，真貼切不過。占有加上創造是西方一切活動的根源。中國文明恰恰相反。退讓與知足，是中國社會的象徵。中國人誠然未嘗不貪得，但其貪得的手面，不如西洋人闊大，處處表示知足狹小的態度。容易自滿亦容易自得其樂。這兩種文明的差異，我們可簡單的看其走路。西洋人之走路，如 O. E. M. Joad 說，急於早五分鐘趕到，而趕到後竟不知做些什麼。中國人之走路，我們祇看跟在牛車背後的農人，他的步伐心弦全被牛車轆轤不規則的節奏與無思慮的調子磨細了。西洋人急於走路，好像趕到後有何事做而實未必定有所做，中國人不着急走路，好像趕不到趕到全無關係，祇是爲了走路而走路。這是進取與知足的大分別。外國人之進取在乎趕到。而中國人之知足，在於不想趕到，祇管走路。走路誠爲小事，而許多社會國家大事，其分別處正無二致。外國人祇要進，中國人祇不想進。外國人祇求到底，而中國人祇求過——所謂過日子，就是生活。

現在要問西方文明爲什麼會進取？最直接的答案就是有可進有可取的緣故。創造能力前進

能力，不是西方人所獨具。如其文明人不能在文化歷史上得到傳統知識，則文明人的創造能力不會得勝於野蠻人，而野蠻人前進的努力，更往往勝於文明人。中國古代人的創造能力震驚世界。蠶桑陶器指南針印刷之發明，不用說了。在中西交通史上張騫班超玄奘之西行，人所共知。高仙芝之軍隊踏世界之頂帕米爾高原達小亞細亞，是近代實地探測西域的發現。即在航海史上，中國人之進取精神，亦充分表現。三寶太監之寶船，在葡萄牙人發現好望角航路以前五十年，先到了非洲。何以現代的西方，如此進取，而歷史上的中國不免停滯？如其說文明是衰老的象徵，進取是少壯的象徵，而以中國爲衰老，我不能同意。不是代中國人護短，因爲說一民族衰老與少壯，將人生來比民族，是太抽象空泛的說法。居住長江以南的中華民族，因其所處地理環境氣溫雨量疾病之影響，而使其身長體重年齡體力持久性等，比之別的民族，或有不及，誠然不能諱。但在華北之中華民族，其身長體重年齡等等，比之其他民族，均不多讓。而中國人之智慧與腦量，尤不低於其他民族。從人種學的見地上，不能證明中華民族爲何缺乏創造進取的能力。尤其因爲古代中華民族極富於創造進取能力，更不能證明近代中華民族何以忽然會缺乏此種能力。有些人以爲中國人內分泌旺盛，早熟早衰，缺乏持久力，這或許是真的。但亦不能因此證明何以中國人缺乏創造力。

現在要問西洋人爲什麼會得以貪得進取爲生活，而中國人則否？我個人的答案就是西洋人之進取是爲了有可進有可取的緣故。澈底說，就是西洋人生產力擴張，生產技術改變，而中國

則停滯不進的緣故。現代西洋人之進取貪得，是產業革命機器使用的結果，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文明特徵。在初民時代，人類活動祇能勉強維持其生活，財富不能積儲，此時無奴隸，無國家，無階級，無統治。（見 F. Ojpenheim: *The State*）在中世紀時，農業生產，無機器作助力，無現代之財政金融資本市場作為財富積儲之場所，所以無資本主義，無近代國家，亦無近代進取貪得之文明與其社會組織。產業革命，發放了生產能力，改革了生產技術，如放虎出柙。人類開始認識了自己征服環境的力量。從前狹小的鄉村市場，現在擴大為國際市場。從前遲緩艱難之人力及畜力運輸，祇在小範圍內周轉，現在海陸空新的運輸多少迅速，其載量又多少偉大，從前的通訊不可靠而遲緩，現在通訊多少迅速，其範圍多少擴大。從前人口移動與行會制下工人之供給多少嚴格，現在有大量產業預備軍及熟練工人。從前生產者自備原料，現在有世界市場的原料。從前生產用手工用畜力，現在水力電力，煤與油的發動力，竟是無從比較。短短三四百年內，歐洲之經濟生活，如此變更過來。任何頑固的人，在這樣大時代中，不能不動。有創造力的人不能不為這樣無限鉅大的活動機會所引誘。有佔有慾的人不能不為這樣財富利益的機會所引誘。大家成為進取貪得的人。金融投資市場之完備，使財富得以更方便靈活的方式積聚起來，更助成了進取貪得社會的增殖。貪之為事，愈多愈貪，人類好勝爭名的心理沒有止境。巨大的生產力，生產巨大的財富。為了私產增殖，為了個人成功，經濟利益壓倒了一切，成為文明道德生活制度的中心，成為心理的主宰。英國人星期在教堂禮拜，其餘六天

在英格蘭銀行禮拜，這是時代文明的巨幟。

將歐洲比中國，使旅行者驚異，猶之將中古比近代，使歷史家驚異。產業革命直至近代方有餘波流入中國。以前中國的生產力停滯在農業社會上。農業耕作制度，在古代曾經有過多次改良，新作物亦時有輸入，但根本生產力並無變更。像產業革命那樣偉大的解放力，在中國不會出現。因之毫無奇怪，中國人決不會像西洋人一樣進取貪得。中國人未嘗不貪得。但在農業社會生產力限制下，最大貪得的結果，祇有造成田園之集中，與農奴之集中。這種貪得之成績，中國史上早已完成。而且並不比西洋差。西漢末年（西歷紀元前後），有三四萬畝農田的大地主，已經所在皆是。家僮萬人，牛羊數萬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地立錐，更是歷史上常有的呼籲。這樣就是農業社會上貪得積聚的頂點。他祇是循古老生產方法來積聚，而不是用新的生產方法來創造。他沒有產業革命無限巨大活動發財的機會，所以不需要創造能力，亦不容許貪得進取的文明。這是中國農業生產力停滯下必然的現象。並非西洋人與中國人種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亦並非中華民族衰老與否，亦並非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不同。中西文明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為生產力不同，生產技術不同。在產業革命後無限量擴張的時代，人似久閉之鳥，久餓之虎，放出來後，決無不振翼暢飛，跳踉大噉者。在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下，人似飽食之豬，白日之狗，若不是打瞌睡，即是無所事事，遣此生涯。人是受環境刺激適應環境的動物，不論中國人與西洋人，易地則皆然。

在以後我還打算將中世紀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多多比較，證明產業革命以前生產力停滯的歐洲，其文明特點與中國很多相同之處。現在我先要說明中國文明停滯的象徵。中國在農村社會下生產力停滯不能再進步。交通不便，社會關係緊窄，不能有新的發展。財富不能無限制積聚，所以很自然的，祇能安於現狀。或者竟可以說，在中國人沒有外誘的眼中看來，現狀就是永久，不發生改革創造的刺激。中國人對於現狀是滿足。或有不滿足處，至多祇要求分配的改革（如歷代農民暴動），在現行生產狀態下的改革，而絕想不到開闢新的園地，征服新的環境。因為這種新的東西，根本不在中國人思想中。中國文明，不是前進貪取，因為生產力已經停滯了，其意識中無可進無可取。反過來，中國文明常認現狀為滿足，或縱非完全滿足，亦太息以為即此已是最大的和諧，不能要改。中國文明因為停滯而有無可奈何的滿足，因為滿足而有得過且過的欣賞。中國文明務將現狀自認為和諧滿意，作為樂天安命的準繩。而西方文明則務將現狀求其罅漏矛盾，作為進取貪得的階梯。中國文明認為生活是為生活，猶之走路是為走路。知足和諧的生活，是中國文明理想的最高度。西方文明認為走路是趕到，生活在於進取。竟可以說推其極祇有進取，沒有生活。因之將人作為機器活動的一部分是西洋文明的高度。中國人為了生活優游，不恤名譽，道德，國家。西洋人為了累積與偉大，不恤犧牲生命。中國文明是知足欣賞的 *Appreciative* 文明，而西方文明則為貪得進取的 *Acquisitive* 文明。

中國生產力二千多年來沒有大進步。所以二千年來的中國文明，中國人的生活風味，亦沒

有大進步。我們常常覺得商彝周鼎，范銅雕刻的技術勝於現代。唐磁宋窰，色彩神情勝於現代。景泰藍，宣德銅，康熙磁，宋元明的書畫，六朝隋唐之佛寺，壁畫，石刻，雕塑，古代建築，紡織，工藝產品，似乎均比現代好，比現代偉大。從歷史上的文物記載看來，我們也有這種感覺。試讀兩都賦兩京賦，知覺得煊赫鼎盛，勝於今日。古人所記鬪雞，蹴毬，舞馬，劍器，歌樂，搏蒲，平康北里，飲燕酬酢的生活；貴家園亭，山林，別墅，府第，莊院的布置；僮僕侍從，奴婢供奉，肉屏風，玉唾壺，這種奢侈的享用；比之現代富人之享用定不多讓。所以中國人永遠覺得古代是黃金時代。班固贊漢宣帝謂其「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顏氏家訓說「梁朝全盛之日，貴游子弟，薰衣剃面，傅粉施朱，望若神仙。」時代相去二千年，這二千年對於中國人的文明生活，幾無影響。以今視昔，可證中國文明永久在停滯狀態中。

若比之歐美各國一次一次的工藝科學博覽會，就知道進與不進是大分別。

二 欣賞與知足

停滯文明對於財富的態度，特可注意。這種文明型式，對於財富，似乎視為固定永久，視為人生以外的客觀的存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普通頗看重積蓄而獎勵勤儉。經濟學者以 *Marginal Utility* 的學理來說明經濟活動的原理。以為財富愈多，則對於所有人之用途愈小。照

此說，財富愈多之人，愈沒有積蓄的興趣，實在將問題看得太簡單了。財富的積聚，一方面固然可以用 *Marginal utility* 的原理來說。但同時對於財富增殖的速率，很有關係。生產力發展，利潤豐厚，生財容易，乃是刺激財富積聚的主要原因。而生產力停滯，財富增殖艱難，又為保留財富而吝嗇的重要原因。在生產力迅速變遷的社會下，在財富的變遷可用股票價格表示的情形下，財富之流轉極速。得之易失之亦易，所以人們對於財富極能增殖，而亦極能揮霍。往往一個人從赤貧而豪富而再貧再富，不足為奇。美國人便是如此。恰巧相反的典型，便是中國。農業社會之生產力停滯不進。財富之形式只是土地屋宇牛羊穀類。不獨增殖遲緩，儲藏多費，流轉困難；即浪費消耗，亦需較長時間。財富從積聚到消耗之循環，往往要幾代。一個人之壽命，大多不能親見財富周流之一循環。諸筆記小說中輒致嘆於財產敗亡之速，這是相當抽象的理解。這種守財的慨嘆，西洋思想中似少見。所以普通中國人意識中，以財富為常住固定之基業，大於個人之生命。一個有某種財產購買力的中國人，與一個同量購買力的美國人，其財產的客觀價值，將生活程度物價等等關係一齊考慮到，雖然相等，而其個人的 *Marginal utility* 觀念，決不會相等。因為財富在美國人觀念中，是很急速的湍流。而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是很平穩而幾乎近於停滯的滿足狀態。

這種滿足狀態，從中國歷史上看，很有興味的，可以指明其為春秋戰國以後的情形。自春秋以迄戰國兩漢，為農業生產力大大發展之時代。鐵耕犁牛灌溉施肥之法，逐一發明而推行。

深耕區種，均使農產量大大增加。隨着生產力之發展，而西周金文及詩經中所遺留之領主與農奴對立的制度，遂漸解放而為地主與佃戶對立的關係。當時農業生產為大利所在，故土地兼併侵奪之劇，甚異於後世。周初諸侯凡一千八百餘國，即係一千八百餘領主。經過春秋而戰國，僅剩十餘國。春秋書侵者五十八，書伐者二百十三，均為領主間彼此掠奪土地與農業人口之紀錄。當時的土地領主，可用政治力量來掠奪財富。而農奴制度崩解以後，當時的士民，亦可以自己的力量來謀個人權力財富之進步，如商人與游士之徒。故反映此種生產力發展社會變遷的中國文明，完全不是後世的中國文明，而倒有些像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非但當時人的心理狀態，看重光榮名譽，不似後世中國人之消極退讓。並且當時人之價值標準，亦以富強權力為先，與後世中國人之以優游享福或安貧樂道為事者完全異趣。現代西方人之衡量國富民力，往往以國家資源，國民收益互相比較。這是十足的拜金主義文明。但試讀蘇秦張儀之流，當時合縱連橫如何說法。他們原祇是比較帶甲之士多少萬，土地廣袤若干里，有什麼金竹美材，可製兵器，可作交通工具。戰國時人的價值觀念，就是資源強權。作為後世中國人迂迴曲折的人生觀的至聖先師孔孟理論，在當時非但不通行，並且其人很窮。當時的中國是生產力膨漲的中國。當時的中國人，是具有富強功利頭腦的中國人。

政治上之統一，與生產力之停滯，不一定要發生連帶關係。自兩漢以後，諸侯領土間的掠奪，已經絕跡。而地主豪強間之土地兼併始終未息。地主豪強的人生觀，決不是孔孟之徒孳孳

爲仁媿媿爲義的人生觀。祇看古代史家將豪強二字來形容他們便可明白。這些人爲了增殖自己的田產，決不講道德廉恥。他們什麼事多做，掠賣人口，把持交通，強奪民田民業，栽贓陷害，甚至假扮強盜，巧取豪奪。數年數十年之間，他們可以包辦瓜分了全國的良田美宅。他們是充分貪得進取而又充分揮霍奢侈的。直到土地瓜分完了，人口掠奪完了，豪強之間，不歸於此，則歸於彼。或者當時當地，已成獨霸。或者勢均力敵，不能再併。然後財富的增殖已到限度。後代子孫，已經沒有這種貪得進取的刺激。聰明才智無消磨之機會，一天一天頹唐下去，組織細下去。憂世之士不禁慨嘆說世風世風。一些也不差，試將南北朝的老莊清談薰衣傅粉的風俗與戰國時人之貴進取崇拜強權對看，顯見得生產力之變更，對於當時人之人生觀有何影響。要在戰國而退讓安貧，是時代落伍的愚人。要在兩晉南北朝以後而貪得進取，是看不見時代的妄人。

知足是後世中國人徹上徹下普遍同具的文化象徵。但是仔細分別起來，卻有兩種不同的知足型態。一種是不自覺的滿足。生產力停滯，人們祇能在現狀下求生活。他們既看不見普遍發展財富的機會；亦不覺得普遍墮落壓迫之痛苦。所以他們的下意識中，混混沌沌，以爲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謂滿意，亦無所謂不滿意。普通所云過日子，就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生活。即使人們對於分配的不平，政治的壓力，常有不滿足的心理，在無組織無團結的社會弱者中間，亦往往自己麻醉自己，認爲這是個人力

量所不能改變的環境，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是天命。「實命不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俱表示這種無可奈何的知足狀態。這是自欺的滿足。

祇有極少數有閑階級，因爲生活之滿足，而能對於生活發生欣賞的興趣。這是中國有閑文化所產生的高度文明。欣賞的人生是流連徘徊的人生，所以對於小事物極爲精緻。一個人習慣於小範圍的境地，乏於變化，乏於新奇的社會。人與人間所見所聞，所接所爲，今日與明日，明日與昨日，竟分不出多大區別。人之心思才力，老在這一丘一壑一飲一啄之間。這種文明的方向，就不免對於眼前的小事物，細膩考究起來。反正環境是停滯的。人之對於環境，認爲無可變更，無可進取的東西。則除却在此一成不變的境遇中，刺取其一點二點，以遣永日，以發展其心思才力外。更有何法？過這種生活的人，所謂文明人，對於聲伎，婦女，容貌，衣飾，飲食，起居，種種小事物，均精緻細膩，自有一種標準的風氣。他們不一定如近代小資產階級文明之祇求物質享用之奢華與舒適，而卻以精美考究爲務。十八世紀的法國，過此種文明生活，家家主婦，以能烹調精美之飲食爲榮。咖啡要向某街某店買。熏腿要向某街某處買。並非因此店最有名最好或最大，而是因爲其所賣咖啡熏腿恰爲此家所最嗜。蘇州飲食之精緻向有名。記得老輩熏魚，求其香，必用木屑；甚至不惜窮竟日之力，守候爐火，隨乾隨將湯汁塗抹；不似現時將魚入鍋一炸卽了。買食物亦有定處，買湯團必至金獅子橋一小店，買瓜子必須采芝齋，買熟肉必須陸稿荐非三珍齋，而買醬鴨必須三珍齋非陸稿荐。此種典型，中國各地都

市均有存者。往往有極賤之物極小之店，爲一般平民所能享受之文明。不似現時大都市人，自己全無好惡標準。住公寓沒有廚房，吃食必上館子，聽憑侍者照菜單拿來。此是水滸傳魯智深的辦法，揀大盤魚大塊肉來全沒有絲毫文明人風度。合理化標準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決定了社會的生活標準。現代大都會的人，已經不再是自有主張的人，而是消耗資本主義商品的機器。非但一般人如此，甚至知識階級對於文化的食糧，書籍與刊物，亦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決定。多數報紙久在控制下，固毋待言。而近來盛行的各種讀書會，從左的讀會到右的讀會，竟將讀者選擇書籍的自由與好惡的標準，也包辦去了。

中國人的衣服，是階級的象徵，亦是節令的象徵。什麼季節應當穿什麼皮毛，什麼月份應當穿單或夾。這是固定的標準。現在老年人經過京朝生活者，都能夠記憶。婦女不大出門交際，其服裝不以新奇怪誕爲誇，而自有一種典常。歷代以奇裝豔服爲服妖，卽至現代，短袖燙髮亦時時懸爲禁令。中國人之豪富貴族，對於伎樂聲色，雖儘多放誕處，然大體上卻自細膩熨貼，而富於陶醉的詩意。六朝以來無不如此。謝安東山絲竹，有妓有基。白香山罷刑部，得臧獲之習篋磬弦歌者指百以歸。韓昌黎會賓客，輒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唐宋以來，官伎營伎，與詩人詞客，飲燕唱歌，風流甚盛。觀於旗亭競唱，及宋人之當筵賦詞，可知當時伎人，多解文墨。明清以來，前輩風流，猶可見之於黎園子弟之藝材。觀張宗子陶菴夢憶所記朱雲暎教女戲是何等磨細工夫。正如希臘文明之有 *hetaira*。清麗的婦女，是文明生活不可缺乏之點

綴。不獨達官貴人如此，卽一般平民，亦極能欣賞曲樂。清末北京之戲園，其坐位光綫之劣，比之現時劇院，寧止霄壤。但皮簧之盛，超前絕後。市井肩販，無不能擊節哼一腔。蘇州舊時說評話彈詞之書場，其污陋亦如此。清茶一甌，環坐聽者，并非文人墨士。然而醇精會神，至於不容聲效。各地都市，大多均有此類平民藝術之場所。戰時避地昆明。其說評話場面之簡陋，與聽衆之陶醉，竟使人回憶兒時之蘇州。雅典在西歷紀元前四〇四年 Syracuse 大敗之後，國家戲院卻排演 *Lysistrata* 一齣反對愛國思想而主張非戰的戲劇。在文明人的觀念中，藝術之目的是藝術，生活之目的是生活。時代是虛妄的，而生活方是真實的。

這種欣賞陶醉的生活，一定要有閑適和平的心境。欣賞陶醉是心理現象，故非有和平閑適之心境，不能領會。產業革命以後之人生，以掠奪累積爲根本出發點。貪得務多之一念，出於競爭排擠之一途，破壞其和平無事之心境。從中國人眼中看來，西洋人十之七八，多少帶一些 Sammy Click 作風，此君的哲學是「拚命巴結做。知不能拚命巴結做，至少要漂亮。如不能漂亮，至少要吹牛說得大話。」西洋人自己亦覺得，這種人生，成功之後，繼以空虛，空虛之後，繼以恐怖，是心理病態，永遠不得滿意。（Budd Schuberger: *What Makes Sammy Run?*, New York, 1941）近代人在時間上儘有閑暇，而心理上卻毫無安靜。享用上儘能揮霍，而生活上極少欣賞。他們只能以肉體上低劣的不斷的新的刺激，來補償其心理上粗魯匆促的退化。將洗澡缸砌在房子中間的美國文化，正是小資產階級物質享用的表示。比之維多利亞時

代，英國女太太之終年不洗澡，將穿污的羊毛衫收藏在箱子裏，是何等不考究物質享用。中國人之注重心理閑適，不考究物質享用，在詩人哲學家間尤精細。他們很明白，一有伎求之心，則和平細膩安閑的心境即刻消失。所以他們往往鄙夷俗富及一切家人生產瑣事，而講求如何保持心地如明鏡，映萬物而不留纖迹。極細膩微妙的心境，往往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闌干，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是一種微妙而細膩的領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是一種平淡而神往的領會。財富的多寡，物質的豐澀，全不在這種心境之內。非但貪得鄙俗的人不能領會，即豪快匆忙的人，亦不能領會。祇有長時期在閑適和平的環境裏，磨細了心，磨平了氣的人纔能了解。

這種細膩閑適的心境，在詩詞中似乎登峯造極。西洋文明如雅典，文藝復興及法國大革命等時代，似乎均不曾造此境詣。或許因為西洋文明從不曾像中國一樣長時期停滯不動的緣故。西洋人欣羨中國文明，亦大多祇在表面上看到其生活之閑適優游，而很少能領會到其心地之微妙細膩。西方文明，誠如羅素的批評，「把做工當作生活目的，而不當他作為達到不須工作的境地的手段。……這是奴隸國家的道德。」(B.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p. 23 and p. 16) 西方人一生祇做了機器的調節器，誠然是做了一生奴隸。但西洋人如能一反而採用中國人自欺自慰的心理，以為奴隸自有樂趣，他們即能完全中國化。儘管機器如何轉動，如何急促，他們不妨暫停片刻，抽枝紙煙，將油污的手泡杯清茶，蹲在鍋爐邊談談天。祇看 *Falimo* 人，為

了。在途中想烹茶的緣故，不惜臨時造起雪窖過宿，或耽誤一天行程。喝茶難道不是人生中重要部分？難道不比趕路更有興趣？以這種生活，比中國人，覺得中國人還不免有些買櫝還珠。

中國人的生活雖重欣賞，實在說欣賞是偶發的，而不是持續的。祇看諸筆記詩文，對於神會的欣賞，如何讚嘆，便知這是難能可貴的事，很少人能夠自始至終抱這種詩意的態度。多數人祇是混沌沌，無所謂欣賞與不欣賞。他們祇是不計較不思量，日子就是這們過下去。下力的時候就下力，吃飯的時候就吃飯。人有千算，天有一算，所以不如不算最好。偶然有快活的事情，或喝兩三杯酒，得到生理上的興奮。或聽一齣戲，喝一碗茶，與理解同樣聰明或同樣愚塞的朋友談談天。亦偶然感到不平，覺到無可奈何的命運。糊糊塗塗的表示不滿意，或糊糊塗塗了結。中國人知足不辱的生活，就是這種不自覺的和平，與偶然刺激的更迭生活。如其叫 Russell 與 Jord 到中國農村去住十年，恐怕他們也要感覺東方阿 Q 文化之無聊。如其一個月從初三到二十三，每夜祇是賞月。從清早到傍晚，祇是看花，或夜裏秉燭再看。或祇是聽鳥鳴，聽流泉。或祇是在近處山巔水涯散步。或祇是飲酒，垂釣，品茗，彈琴。是不是最清閑最豫的生活？如其日日如此，年年如此，要腦子與手足何用？有腦有手足有智慧力量的中國人，均不能長久安於這種閑暇和平的生活。袁中郎所謂「若祇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為訓。」在實際經驗中，這種停滯呆板的生活，心思才力無所發展，而至於不得不將無所事事的日子混過去，真是一種苦痛的生活。袁中郎所云「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

子。」「項蓮生所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正是無可奈何的生活。劉玄德之俾肉復生，張循王老軍之飽食打盹，須知不是享福，是苦痛。阮籍李白這一輩游手好閑的名士，幾乎無不可憐地沒在酒裏。」「世無英雄，遂使孺子成名」；抱這種胸懷的人，不是毫無活動希望的人。他們貪杯，正因爲酒是消遣日子興奮神經的東西。可以暫時彌補他們心靈上徬徨無事的創傷。他們是無以爲生的人生，是無目的的人生，是借外物來消遣自己排除自己的人生，再進一步，就是自殺的人生。驚世絕俗的放浪以及求仙的幻想，就是人生痛苦想超脫的反抗。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爲夭。」「李白云「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這是聰明才智在已死的環境裏無可奈何的狂憤。

若將這些有閑階級消磨自己的生活，認爲中國文明，真以爲人生欣賞，真有不得了的價值，非但誤了西洋人，亦誤了自己。要知這一些些自欺自慰的欣賞生活。非但多數被迫享受這種生活的人，感覺心思才力無用處的苦痛。而在他方面，還有勞動大眾的痛苦。歷史上任何文明，祇是階級文明，因爲文明必須衣食具足，有餘閑時間，可使身心精緻化的時候纔能產生。甚至最不講物質生活的印度文化，也要具足五緣，纔能修行。所以文明人必須不親勞動，不愁衣食，可以無條件享用社會下層階級的勞動結晶。文明的特徵，必是一小部份優游享樂的人，依賴政治上經濟上壓伏專制的威力，與大多數勞動階級對立。文明之成立上面爲閑暇與權力的結合，下面爲勞動與貢獻的結合。雅典文明是奴隸造出來的。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是勞動階級造

出來的。同樣，歷史上從古的中國文明，不能不建築在終年辛苦的農民身上。農民的剩餘生產力用貢賦的方式供地主享用，使地主有閑暇時間，發展精緻細膩的生活，創造中國文明燦爛之花。勞動農民祇是生活欣賞的作料，其自身是被他人的欣賞生活消耗了的。農民對於生活不是欣賞，而是安命。農人對於現狀，是無可奈何的滿足。這與有閑階級對於生活無可奈何之消遣，恰恰對照。同樣是生產力停滯的反映。

滿足與安命，是中國文化上下相通的特徵。農民與有閑階級，在政治經濟關係上，或處於對立地位，而在道德心理上，卻站在同一陣線上。這是中國文化中重要的一點。尤其因為小農自耕自給的制度，使自耕農的社會意識，與地主相同。同時又沒有工業勞動。佃農與農業雇工，與地主及自耕農同樣，被和平孤獨自好節儉等傳統的農業民族性與道德教育所統治。他們同樣在地狹民貧與生產力停滯的土地生產狀態中，同樣不自覺的以現狀所得為最可能的滿意。而不覺得有創造生產擴大占有的可能。在一村一鄉之間，土地的數量有限，人口的數量也是人周知之事。如其沒有甚不平的分配，大家多少可以維持生活，則農人的希望，即在於天時之豐調，租徭之輕減。積世傳統的耕種技術與生活方式使他們麻痺了。不見可欲，亦不見辛苦。祇如此一年一年長在無意識中生活下去，荒年水旱，是天命，無可奈何的事。如逢熟年，新穀既登，租糧已完，國恩家慶，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種靠天吃飯的生活，在積世傳統的生活標準下，農人自有其享樂欣賞的標準。一切淫靡奢侈之事，認為本分以外，不合農人欣賞之

標準，而爲老成人之所不取。此種勤儉的標準，一經確立，更造成一種社會勢力，使占有貪得之欲更不致發生。農民對於生活之滿足與安命，爲中國文明普及大眾，及歷久不變之根本。因爲外族之侵略與統治，縱能在政治社會表面上造出變更，而芸芸農民，祇要仍舊牢守此種樂天安命的標準，則中國文明，即不致於改變。

此種知足安命之文明，根本爲生產力呆滯固定的反映，前已說過。在一個社會生產力發展迅速之時，社會的生產技術與生產組織，變動不居。社會上多數人的地位與生活，在日日變動或變動的恐懼與希望中。此時如有人要求滿足與安命，即無異要求生產之停滯，或從生活中脫逃出去，決不會發生效力。不論羅素如何 *In Praise of Idleness*，不論 *Live Bell* 如何批評近代文化而推崇欣賞與理性，近代人業已騎上快馬，決不能停步看花。反過來，一個社會，如其生產力正在衰頹崩潰中，則社會的富力與生活，亦要變動不居，不能長久維持。即使有一部份人憑藉過去的傳統與積蔭，暫時還可以放縱於生活之優游與欣賞。但作爲社會根基的生活，既然日漸衰頹，表面上的文明生活，不能不依賴社會勞動之接濟，因之亦不能不因社會勞動力之日衰而衰落。歷史上中國文明之停滯不變，正所以反映中國社會生產力之固定不變。而現在中國文明之變，亦正是反映現代中國生產力之變。

三 兵與武功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既沒有餘裕生產力創造豐富的文明，自然也無力創造偉大的武功。中國兵制有幾點特色：第一歷代均養不起大量職業軍隊。往往因為養兵而鬧到民窮財盡。第二歷史上許多時代，國家無力養兵而由私人養奴隸部曲，作為私家軍隊。第三歷代養兵往往不給餉精，而教之耕種自給，弄到兵不像兵，農不像農。第四歷代所養之兵，往往窮困不能生活而淪為奴隸；當兵成為最卑賤的職業。第五軍隊往往不給衣裝，不備運輸工具，臨時征發雜湊。第六有戰事時候，往往拉扯各色階級人民及外國人充兵。一部分理由或者因為農民的職業不宜於遠征耀武，而主要的理由還是因為生產力有限，沒有餘剩的力量來整頓武備。

春秋時代祇有貴族纔當兵，一軍即一宗族。宗指同一廟下祭祀。族指同一旗下作戰。農民不當兵。遇戰事則征其車牛夫力，以供運輸，謂之賦。戰國時出兵往往數十萬，坑卒亦往往數十萬。故近人多謂戰國時行徵兵制全民皆兵。但觀荀卿與臨武君議兵之語，似當時有傭兵，選兵，卻無練兵。後來秦漢屢次徵發里閭人民為兵。五胡南北朝均大量抽丁，至於五丁抽三，戶留一丁。以此推想戰國時出兵之多，無非比秦漢徵發得更為廣泛。就所徵壯丁中考選勇武，獎以功勳，並不是國家長期豢養多數職業兵，亦不是近代徵兵一樣，使人民定期番上受戰術訓練。以此而論，戰國兵之烏合雜湊，恐比五胡好不了多少。不然豈能一坑數十萬。

漢朝有正規的職業兵：南北軍及八校尉等皆是。其數似乎不多。遠不敷對外戰爭之用。兵源似乎是游牧子弟。當時關西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均在半農半牧地方，不是純

粹農民武力。大量長期兼養職業兵的有唐宋諸代。唐朝內有禁軍，外有節度，竭天下之財以養兵。財賞不繼，餽以官賞。至於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唐朝竟亡在這種兵制上。北宋聚甲兵於汴京。太祖開國時三十萬。至皇祐初（其間約九十年）增至一百四十萬。英宗治平二年（西歷一〇六五年）統計廂禁軍共一百二十萬人。錢糧賜予歲費五千萬。當時天下財用所入祇六千萬，養兵所費占六之五。南宋以半個中國而養兵之數常一百六十萬。馬端臨謂其「募兵之數日多，供養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明養兵常一百三四十萬。末年剿流寇，至於無兵可調。而餉糈艱難，芻秣城防，均賴招募。明史張寧傳謂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兩，米三十六萬石，並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這種情形至清未改。清朝的綠營亦是職業兵並且是世襲的，嘉慶時綠營兵額六十萬，八旗約二十萬。合共八十萬。官兵俸餉祇銀數一項共需銀一千四百零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一兩，占歲入三分之一有奇，歲出總數二分之一弱。這些兵有些什麼武功戰績，許多老輩人親眼看見，無須說得。

東漢以來，中央政府自己不大量供養職業兵，有事專靠外族兵，地方豪族遂有自己的私兵。私兵自古有之：項羽有子弟兵八千，衛霍出塞各將騎五萬，而私負從馬竟達四萬匹。經過三國兩晉，民歸豪強，國家正兵無着。刁協戴淵庾翼宋武帝等均不得不發奴爲兵。並須得豪族同意。宋武帝詔云「先因軍事所發僮奴，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勳勞破免，亦依限還直。」正爲奴

是豪族私產，故不得不給予報酬。東漢末年以至五胡亂華是生產力極度衰落的時期，這時期的政府，便養不起正規兵隊，索性也不再養兵，

養職業兵不能不給餉。政府養不起便想法叫軍士自己種地，於是成爲屯田兵弓箭手等。東漢三國南北朝唐宋以迄明清，各地均有此種辦法。結果是兩種。如其兵事多而田功不足，則如傅玄所說「日增田畝之課而田兵日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償種。」否則屯戍久而操練廢，兵士或逃亡或充他用，至於兵田兩亡。以言兵則「衛所漸空，無軍可交。」以言田則「民荒十三，軍荒十七，州縣有司不敢問。」

屯田之外北魏初唐之府兵，宋之弓箭手，明之衛兵，均是寓兵於農。這種制度常爲歷史上所稱道，以爲他不致完全荒廢農事。明太祖很自誇說「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其制大概係選精壯丁男每年教以武事，更番受教，其弊亦與屯田相近。督教認真，則如司馬光所說「無間四時，五日一教，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若不認真，則「番上者皆係貧羸受雇而來。」且「一丁教關，一丁供送，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邊鎮長年戍防又不得不另有召募屯墾之軍。因爲耕與戰是不相容的兩種職業。府兵衛兵之制，平時以之訓練民丁防守鄉里作爲地方軍則可。以之東調西遣，戍邊征伐則不能不有常規的軍隊。所以顧念生產力薄弱要想使軍隊不廢生產的努力，常常不久便失敗，失去了武備的意義。

國家無力養兵而又不能不養兵，沒奈何只能將兵餉定得很薄。因此兵士不得不於吃糧之

外，另尋一些別種職業。結果兵士成爲奴隸差役，與私家部曲相同。「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贖。」三國時就是這樣說法。本來兵世襲有籍，號爲兵家，役亦世襲有籍，往往混起來。官兵多給役方鎮「既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宋書劉敬宣傳）。「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甚者夫守墩，妻坐舖。」（明史翟鵬傳）。算是有一兼差，可以調劑生活。清朝的綠營兵亦係世襲兵，亦是兵事與差役不分。借了一些事故，魚肉百姓，敲詐良善，往往有之。並且軍餉素來歸主將經手，軍需並不獨立，所以扣剋軍餉，浮報名額，乃至蹄鐵馬轡衣裝旗幟盡成爲營私舞弊的法門。這樣歷史上無力供養而勉強維持的軍隊，到底不成爲軍隊。

春秋時作戰，賦庶人出車牛夫力，是拉夫之事，自古有之。漢武帝伐匈奴，私負從甚多，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顏師古注謂轉是轉運輜重之人，私負從是私負衣裝之人。這些全不是正規軍隊，而是拉夫徵發的民役，自備衣裝。有一次出兵，史稱「牛十萬，馬三萬匹，驢羸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騷動見得不是平時供養這些牛馬羸駝，而是臨時徵發。明成化時余子俊奏土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每人運米豆六斗，革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見明史）。從木蘭詩及杜詩兵車行出塞等篇，可見從軍之人衣裝全要自備，甚至得手的軍器亦要自備。東漢征叛羌，虞詡說任尙，令諸郡兵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西魏宇文泰籍民之有財力者爲府兵。「馬畜糧糗，六家供之。」宋之弓箭手一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

匹。」「自備戎械，就鄉間習武技。無事放營農，月給鹽茗。有警召集防守，卽廩給之。無出本路。」所以說「官無資糧戎械之費」。如此安得有好兵。其甚者如李泌云「山東戍卒多齋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至於「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非但國家養不起軍隊，竟是叫軍隊來養將吏。

因此國家沒有長期精練的軍隊可言。從春秋車戰改步戰以後，中國武備問題，始終沒有完善解決過。有大征伐的事情，不得不臨時拉扯各色人等雜湊成軍。秦始皇發嘗逋亡人贅墾賈人。後來更發徒人奴產子爲兵。漢武帝發罪人亡命惡少年囚徒七科譴爲兵。從其所發可知盡是不耕不稼的人。他們不發到農民，想是因爲農民要在後方生產，不能遠征之故。漢武帝就用這種雜牌隊伍，加上降胡及屬國兵，造成空前的漢族武功。東漢之伐匈奴叛羌，更全用的羌胡南匈奴鮮卑之兵。唐時所用爲吐番回紇鮮卑高麗之兵。如其這些屬國兵與雜牌兵可以建立戰績，則國內農民便可以安定生產供給軍需。中華民族的武功，就是這樣建立起來。這種臨時拉湊的雜牌兵，是最現成而最便宜的武功。平時不需餉糈供養，出戰之時恐怕頂多只要供給糧食。胡兵屬國游牧兵，飲食與漢人不同。恐怕食糧也歸自備，政府祇要費些犒賞，滑稽些也可以說是通國皆兵。因爲一有戰爭，任何人皆可拉來上陣，任何物皆可自由徵發。竟可說總動員法無時無地不實施。困學紀聞引桓譚新論謂「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供宮室供養諸賞賜。」晉書索琳傳云「漢

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後代鬧到民窮財盡的兵餉，竟不提到，似乎沒有這問題。這件事不足為奇。歐洲中古的軍隊，也是這樣雜湊。拿破崙乃至打敗拿破崙的惠靈頓，其軍隊原均是狠健亡命，所謂『*Offscourings of the streets and Gaols*』與韓信所謂「驅市人為戰」差不多。

這種情形一大部分係為農業生產的地方性所決定。強悍的游牧民族，一落到這個圈套內，漸漸亦會得同化。例如北魏，府兵最初均為胡族，勇悍善戰。到後來「太和在歷，豐沛舊門，俱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伍。」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宜憤然。」金代的猛安謀克，其命運亦大致相同。農業中國似是一個洪爐，任何鋼一般的戰士，落下去不久便鎔化了。

事實既然如此，中華民族自然成為和平不侵掠的民族。歷史上中國有過幾次赫奕遠征的武功。漢唐兩代尤盛。但這種遠征武功，根基上是為了保存中國人的農業「生存空間」之故，仍是防禦性質的攻擊。漢時的匈奴，唐時的突厥，是威脅中國農業生存的兩大游牧民族。他們「以殺戮為耕作」，而中國則以此離南畝。所以漢唐兩代不得不出塞遠征，驅之他去。漢武帝說得最明白。他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法制，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太子每諫征伐四夷。帝笑曰「我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通鑑漢紀十四）。歷史的事實，證明漢武帝唐太宗這種積極防禦，是保衛中原農人「生存空間」的最有

效辦法。漢代武功衰歇以後，接着就是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之亂。唐代武功衰歇以後兩河南北復淪爲胡人牧馬之場數百年。可知若不是當初遠征，便沒法保障中原農耕生活。歷史事實更證明漢唐兩代的武功，均是防禦性質，而不是侵略。漢時處降王單于於幕南，有急保漢光祿城，爲漢屏藩。漢朝反資送以士馬米糒，唐太宗處突厥頡利可汗之衆自幽州迄靈州，降衆蕃息，唐朝反而供給不遑。後來漢唐均許匈奴突厥仍回舊部。漢唐之於匈奴突厥可說是打到他們屈膝了。但並沒有想殲滅他們，並沒有強制他們爲中國供應，並沒有妨礙他們的生計本業。可知中國人是真正和平不侵略。

農業係固定之職業，農人爲土地之囚人，不能離田地而生活。農產品非至相當時期不能收穫，其財富爲田地廬舍，不能移動。故農業生產最要是秩序安定，最怕是內戰與被侵掠，農地淪爲戰場，則一切生產俱歸烏有。其次是不願意侵掠他國，因爲這樣土地雖好好還在，而農民的身體卻沒有閒了。農業文明的中國，自然是尙德不尙力的民族。

四 家庭倫理學術宗教

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往往以家庭組織之特重，倫理觀念之發達及宗教信仰之缺乏，爲中國文化與外國特殊的根本原因。

以中國家庭與外國家庭比，誠覺其特殊。中國社會國家一切組織均鬆泛。中國人之集團生

活，似乎祇以家庭爲主。家庭之中，又似乎祇以倫理爲本位，以別於西洋人之社會集團生活，法律及權利義務之觀念。中國人將社會國家家庭化起來，故缺乏現代政治，現代國家及現代經濟。梁漱溟先生說「中國總是身家念重，因他並沒有一超乎身家之上的範圍，爲他生活之所依，而事實上親切的原祇有身家。」說得最剴切著明。

但各國各民族均有家庭，何以中國獨重？各國均有家庭關係，何以中國獨將社會國家家庭化起來，而使社會不像社會，國家不像國家？此問題要分作數段解答。

從歷史的進化過程看，家庭組織的功用，一部份向來是一個工作單位，是一個生產互助團體，他表示一種使役關係，亦表示一種財產組織。在父權家長制下，妻女與兒子，幾乎與奴隸一樣，祇是工作的機器，而不是有自由意志的人類。小農耕作制度，雖用不着大規模的分工組織，但終不能不有相當伙伴，相當範圍的分工合作。農人不能自耕自炊自績自牧。「蒸蒸日上」的伙伴，是工作上需要的助手。農業極富季節性，田忙時老弱婦孺一齊下田。許多內地市鎮，像中古歐洲一樣，收麥時店舖罷市，商人亦下田。所以一夫一妻再加若干兒女，在平時放牧執炊，在忙時下田助力，幾乎是小農耕作的一種最小單位。試讀 Eileen Power 著 Medieval People 所述 Peasant Bodo 的生活狀況，和他的妻兒通力合作的情形，就知中世紀歐洲之農村家庭狀況，和我們歷史上的農村家庭狀態竟差不多。中國雖稱爲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制度，但農業家庭中之耕作分工，則往往仍爲小農，仍係一小房一小房之分別耕作。往往各自

收得其作物（已分家），很少將作物共同收穫由族長分配（不分家）。故家族雖大，而工作單位（所謂幾房幾房）則不大，正因為農村家庭是耕作單位，私產單位，故不能過大。

農業社會內的家庭非但注重其為工作組織，並且一部分兼為政治，行政，司法，警察，教育及社會救濟組織。未來工作人員之陶養鑄鑄，不良工作人員之懲處，社會秩序之維持，在現代國家下，應由司法教育等機關執行之職務，一部分均委之於家庭。此種情形，原為古代社會之傳統法則，初民民族與中世歐洲，亦有此種現象，我們祇看羅馬時父權之重，即可知道。中國在維新以前無警察無民法。為政之道，亦以政清訟簡為標準。社會秩序多半委之家庭維持。族長對於族人，有時有審訊判決生殺之權。而鰥寡孤獨失業殘廢之人，家庭對之，便有救濟給養的義務。教育不普及，學校不發展，更不得不使幼輩之薰陶全仗家庭。因為家庭伙伴兼為工作伙伴，尤其因為農產物不能指定為何人工作所得，祇能說是此一組工作之共同產物，以別於他一組之收穫物。故人家與我家間，有明確之私產觀念，而一家之內，則毫無權利，義務，法律，自由之觀念。

中國農業人口占百分之八十。故農村家庭型態自為中國家庭型態之最多數代表，舊式手工業亦為家庭工業，亦以家庭為工作單位。已經脫離農業手工業之家庭，在生產技術及生產關係上言，已不復為工作單位，原無必須特重之理由。但在交通不便時代，人類往還之範圍極小。日夕相處的社團組織，祇有家庭中。故家庭之關係，比之現代家庭當然密切。不獨中國如

此，十五六世紀之歐洲家庭，亦是如此。當時歐洲對於結婚送葬儀式的隆重熱鬧，與中國同。當時家塾親友居處相近，歷三四世而互通慶弔往來，亦與中國同。當時富有人家所造之房屋，歷傳子孫，世世居守，亦與中國同。甚至當時人生平珍貴之衣服飾物，歷久保護，亦貽之子孫，與中國同。由此並可推知，房屋，衣物，式樣好尚，必然不如現代之旦暮更變。而當時歐洲人對於家庭之親切及其休戚相關之情緒，亦正與中國相同。婦人對於丈夫的委婉順從，表示婦道之卑下，正與中國同。父親對於妻子兒女有自由處罰使役甚至生殺之權。對於女兒有自由送入教會當尼姑之權。對於兒子有自由代娶媳婦之權。則父權之重可知。甚至伊利薩白朝以前英國之房屋，其建築式樣，亦係四合院，中圍天井，不知此點是否特別有關。其時英國之紡織業已進而為工場工業，但蒸汽機尚未發明。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特重家庭，倒不如說沒有工業化以前的農業民族特重家庭，比較確切。

在現代組織下，社會，國家，學校，法律應做之初步事情，在中國，在中世歐洲，一齊溶化在家庭制度內。因此社會無組織，國家無組織，一切行政，司法，教育均無組織，而祇有一家庭組織，掩蓋一切，代表一切。家庭組織亦社會組織之一端，故不能謂中國無組織。但他祇有此一小組織，更無超於家庭之組織。所以然者，在現代國家內，家庭是消費的結合，是情感的結合，是生物的結合，傳種的性生活的組織。而在中國，在古代歐洲，則家庭兼為勞動的結合，是工作生產分配的組織。是小農制度下生存發展的基本組織。

將中世紀歐洲的家庭，比中國家庭，其相似之點，似乎比之以現代歐洲家庭與中世歐洲家庭相比，還要多些。這表示現代中西家庭之不同。不是中國人天生特性注重家庭，而祇是現代中西家庭所反映的時代文明不同。我們祇問歐洲產業革命以來，發生些什麼變動？資本主義生產下的生產分配工作，是不是仍在家庭手內？家庭人員是不是再在家庭內工作？人與人相處的社會關係，是不是再限於家庭或村落之內？根據於家庭單位的工作制度崩壞了，家庭不能不崩壞。以前歐洲的生產組織家庭化的。Kileen Power 所述 Thomas Paycooke 的紡織工場，便是家庭化的工業。正為當時的歐洲，與中國一樣，其親切有味的社團，祇有家庭。所以一切家庭化起來，是很自然的趨勢。中國家庭工作的小農經濟，至今還是維持着。生產力老是停滯不進。故家庭制度便不能不繼續維持。而現代化的社會國家，那是生產分配的新機構，便無法產生。從家庭化轉為工業化，便是現在進行的過程。

中國的倫理觀念，誠為維持家庭制度之絕大力量。但如以中國家庭制度之特重，歸咎或歸功於中國的特殊倫理，彷彿倫理觀念為因，家庭制度為果，則似屬倒因為果。倫理觀念是家庭制度之產物。中國的生產技術生產組織既停留在家庭工作的境地，則傳統的家庭有維持之必要，而倫常觀念，就不得不以維持這種制度為主。所以中國倫常觀念之發展，在中國家庭制度具體化之後，孝道為中國倫理觀念中最主要之一端。但孝道之詳備，實在兩漢之世，中國農業生產力開始從粗放擴展轉入停頓固定的時代。父權家長制之由來，似在殷周之前。但不獨殷墟

文契不談孝，卽詩經所云孝子，亦祇是指奉祀祖先的貴族子孫的意思，與後世所云事親養志之孝有不同處。論語中教孝矣，但還是很粗放。歷春秋戰國諸子學說，有絕不講孝者。當時人父子間的關係從國語國策左傳等書中所述，往往將老人家作爲權利的犧牲品，似乎也不像後世儒家所教那麼「孝」。到了孝經禮記家語這類書，方纔託名於孔子曾子，而將孝道說得很精緻。春秋戰國是生產力擴充，領土消滅，農奴耕作解體爲田主佃戶關係的樞機時代，當時的倫理思想，正反映這一轉變。詩經中奉祭祀的「孝子」「曾孫」消滅了。而「身體膚髮不敢毀傷」的孝道，直要待生產力固定以後纔建立得起來。事君事親許多繁瑣的禮制，與先意承歡那些細微曲折的理解，盡是後世人的追加物。

同樣，夫婦關係中對於女子的貞節與寡婦守節等等限制，亦是後世的創作。女子地位雖然從古就低於男子，但在東周時代，夫婦關係，似乎還保持相當平等。祇有作妾媵而被贈送與人的纔認爲奴隸，那是階級身分的貴賤，不是男女兩性的尊卑。貞節的觀念，到宋儒手內纔完成。原來的家庭工作制度，需要婦女作爲耕作的伙伴，需要婦女子孫順從工作紀律，祇此已足，守節與再醮，原不相干。那是家庭制度僵化，父家長權力充分建立而至於神化的地位時的倫理觀念，

事實上，這些倫理觀念，不管他是五倫六行，不管他在書本子上說得如何精緻，卻不見得在多數人實際生活上，發生很多影響。古人對於日常生活的紀載太少。書本子上話，是當時

所謂聖賢宣傳教化的聖經，是理想的教義，而不是事實的記載。在沒有適當材料以前，要觀察一般古代平民的實際生活很難。但從現代的一般人民生活中，卻很可以推見向來倫理教化以及其他教育——的真實力量。現代一般人的倫理觀念，尤其在內地，還是二三千年以來的情性倫理。他們還是默認父慈子孝夫倡婦隨兄弟友愛這些好聽的教條。如有人告訴他們非孝公妻，他們一定大嘩反對。但請調查他們實際生活。有幾家兒子事父母竭其力。有幾家姑娘不口角。有幾家兒女無私貨私蓄。有幾家夫婦相敬如賓。祇有不再醮一層，比較嚴格。然在農戶人家，夫死而招贅夫卻是極平常的事，為的是田地不能無人工作。「禮失而求之野」，在野的禮是不容易求得的。我們讀書真不要被書誤了。

自然數千年的倫理的教化，不是完全白廢了。家庭制度僵化，則倫理觀念隨而僵化。二三千年以來，孝經禮記大學小學，雖然永久不得實行，卻永久成爲訓練道德教育的標準。未嘗沒有支配一部分人倫關係——尤其在統治階級間——的效力。君臣之義，不用說了，是專制君主所盡力執行的。因此在統治階級間，父子之倫，夫婦之倫，兄弟長幼之序，也被皇上的權力維持着。行之日久，也當然成爲社會的勢力。丁憂必需去官。帷薄不修要彈劾。所以追隨於統治階級的人們，對於倫理關係，不能不相當遵守。

一種道德律的發展，是社會需要的反映。有許多行爲，公共認爲對於生存發展上有益的，日積月累，即認爲道德，反之無益有害的行爲即爲不道德。推而至於未發爲行動的思想，亦是

如此。道德思想或教化哲學亦無非只是將現實的需要抽象化起來，而表示施教者更進一步的期望。因此我們可以說家庭倫常孝友和平，並不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亦不是中華民族的劣性。這是中華民族一個小農民族，維持生活維持心靈所必需的條件，或說是公共法則。道德既是一民族求生必需的公共法則公共規條，故有了自耕自織克勤克儉以維持小農生計的必要，就不得不產生一套以和平退讓勤儉爲美德的道德解釋。有了地主政治，就不得不產生一套在下盡忠竭力在上敬天法祖以維持秩序的道德律。而希望人們在散漫和平勤儉柔順的環境下，達到一種完善的人生關係。自孔孟以來，儒家教人無不崇儉戒奢，亦無不崇讓戒爭，亦無不教忠教孝。孔子說的是「當仁不讓」。「君子無爭，必也射乎」。並且「君子不黨」。君子小人之分，也在「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上邊。朋黨標榜攻訐是歷代大禁。老莊思想之葛天氏無懷氏，更是消極散漫之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好勇鬪狠危及父母」是不孝。穴居岩處孤獨無羣的退隱生活，自古以爲清高。充其極將以脫離社會爲美談。勤遠略，崇武功，均爲老成謀國所不取。在人與人間及家庭間，亦一以和平雍睦爲美德。退讓之至，乃有張公藝之百忍。一切不堪的事情，不滿的感覺，以一忍了之。這是一種長時期內心衝動的創傷的抑制。所以孔孟哲學，又一以克己復禮修身齊家爲本。這就是說要養成一種忍耐和平的習慣與心理。作事待人，處處要講人情。儒家哲學是自覺地要養成一個和平忍耐退讓的民族特性。而道家哲學則要自覺地養成一個散漫消極的民族特性。後來的佛家哲學，在哲理上很合中國人散漫和平消極的特

性，而在普通民衆間，則又彌補了超生懺悔解除痛苦的宗教需要。這種哲理既與小農民族的事實需要切合，所以幾千年來，就支配了中國人的人生觀念，道德標準與教育目的。這並不是說三教的微言大義舉國具化。儒家比較切近人生，但除了希望在兩廡食特豚的先生們以外，恐怕很少人能夠實行。民衆爲了事實所迫，不得不散漫和平勤儉自好，卻并不能欣賞這一套一以貫之濂洛關閩的大道理。黃老與佛陀的哲理部分，與人生更遠，更少實行之可能。這一套哲學，祇是哲學，是古人教訓，是古人希望人人如此做的話，卻並非人人的確如此做。自然我並不否認這些學說對於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及其文化有重要影響。民族性與文化係爲物質環境造成，這些哲學解釋，將民族習慣，心理，與文化傳統，理論化起來，儀式化起來，使其固定，使其傳習。他自身成爲物質環境的一部分。中國的小農社會幾千年不變，所以這一套儒釋道雜糅所謂三教同源的人生觀念，道德標準，與教育目的，也數千年不變。

這種人生哲學，是小農制度地少人多，地力不敷下必然的結果。地力不敷而希望人人能相維共存，則不得不教以知足，教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教以「共食不飽」，因爲有人共飯而饜飮爲飽，不是讓道。「無故不殺牛羊犬豕」。在先王之制下的人生享用，只限於「老者衣帛食肉」。從來施政，均教人自足，不許兼併。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教人祇顧窮祇要大家窮。近人有借此以鳴中國古代之社會主義者，便說是社會主義，亦是很可憐。（其實孔子庶之富之教之倒並不廢富。）因爲地少人多，則唯有教人巴結些省儉些。否則「率獸食人」，

天下大亂。所以淫侈爲大亂之本。

中國倫理哲學就是這種環境的產物。哲學一名詞，很難得適切定義。如其容許我胡亂下一界說，我要說哲學乃係過去人生經驗思想之極端抽象化而又擴充之以適於永久世界之妄測。中國哲學只談人生倫理。他所謂哲學不是西洋之哲學，是已有人指明過的，而中國哲學之定於一尊，卻亦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支配中國之儒家哲學，只是教人盡倫常守本分。「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自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推至治國平天下。很明白平天下要自正心始，即平天下要自各守本分始，連不安本分之心理都要剷除。如其人人正心，自然人人守分，自然人與人間無所爭，無所爭自然天下太平。故儒家哲學，只教人倫理。倫理始於家庭，而家庭爲最基本的工作單位。故一倫理教化而儒家之政治經濟理論俱在其中。他是當時生產組織抽象化的哲理，亦是當時政治方式抽象化的哲理。

西洋哲學中宇宙生物起源物質心力等問題，在中國儒家哲學中均不大談到。中國人所談之人生哲學與人生依歸之天理，卻非西洋所謂真理。中國人之清談，亦非西洋人之論辯。儒家雖有格物之說，而歸根結底，弄成一「正心誠意而萬物格」。西洋人所講之理是物理，中國人所講之理是情理。不獨儒家所講是情理，老莊所講亦是情理。物理是在外的客觀的，所以西洋人以爲真理愈辯愈明。情理是在內的是主觀的，所以只要返求諸己。盡吾心自能盡天下之心。能盡天下之心，即能理天下之事。西洋哲學是希臘文明與後來產業革命前後的產物。中間生產力停

頗的黑暗時代毫無可稱，中國在戰國時亦有格物的哲學。兩漢以來，生產力停滯。這種哲學也消滅了。

許多人將中國學術之定於一尊，歸咎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及漢武帝之罷黜百家。秦雖焚書坑儒，不曾禁絕百家。諸子之書，雖經項羽咸陽一炬，而外間仍有流傳口授。前人均已辯明過。獨漢武之黜百家，則一向認為中國思想定於儒家之原因。漢武帝之崇儒術，自因為儒術可以作為治國治民工具的緣故。但我人獨不想漢武以後，會有多少非儒術的思潮，曾經盛極一時，何以終不能將儒教的一宗推倒。晉時黃老之學極盛。北朝與唐均曾數度興道教。佛教更長久盛行。他們均得到帝王的崇拜。但只能滲在儒教裏而去，而終不能推翻儒教。再進一步說。則中國人之慙不畏死敢於作亂反叛者歷史上更不絕書。何以對於政治威權敢於以身試法，而獨對於儒教不能倡為異說。可知二千年來不是人怕死而不敢非議儒術，實是想不到要非議他。這種情形，不能歸咎於已死的漢武帝。如其我們認識儒家政治經濟哲學，從其倫理教化中表示出來，確實適合當時以家庭為工作單位的小農自給生活方式，則儒家倫理之不可廢棄，亦無人想到廢棄，自為極當然事。生產力不變，家庭工作單位不變，人之生活方式不變，則反映此生活制度而抽象化之道德與哲學，亦安得變？反之如生產力變，一切俱變，則此諸哲學道德亦安得不變。如此說來，主張復古讀經，或主張非孝公妻，跑在時代前，或跑在時代後，全是隔靴搔癢。

大體說來，中國之學術文藝，亦與生產力之停滯與轉變相表裏。春秋戰國，是生產力發展時代。當時學術界參錯豐富向多方面發展。文學亦從簡短的記事（如殷墟卜辭金文等）與歌謠（如詩經），發展到孟荀莊墨這樣洋洋灑灑的大論辯。只將論語與孟子比觀，便知從春秋之末到戰國之中，相當於鐵器發明的時代，文學之發展如何迅速。自此以後，生產力停滯，哲學思想定於一宗。文學發展，亦極有限。詩賦詞曲，其格式雖儘有變更，而其內容只是一套。戰國諸子的文章是思想，是議論。後代的文章是生活，是感情，是欣賞，是牢騷。甚至在生產力極端停頓的時候，其文學只有格式而全無思想，只有感覺而沒有感情，如齊梁體詩與駢文。唐詩宋詞元明之曲均是好文學。他們能夠將各色不和諧的生活調和起來發生情感。但他們往往表現一種頹唐的時代情調。或者將詩當作美麗的夢境，逃避現實的渡航。唐詩還是人生，好的醜的多有。宋詞只是夢幻的美與和平。這些，在充實力量的戰國候人是不值一笑的。海通以後，西洋哲理與思想，與西洋生產方法，同時傳入中國。文體不變，文學所介紹之思想與問題亦不變。從梁任公的新體文到白話文白話詩與戲劇，開闢了文學界上的新園地。直到現在新文學新詩之無格律，亦正與新生產力之無道德無規範一樣，在轉變在解放在創造的過程中。

再說宗教在中國何以特別不發達。此點須先分析外國之宗教，究係何物。即以基督教為例。基督教在中世紀被采為國教。教權與政權結合為一。而教會本身則為大地主，為農奴之主人，為上帝之意旨，為天命之所歸。簡單言之，則中世紀之基督教，乃是以大地主之資格，冒

天命之威嚴，執掌政治經濟道德教育之大權。凡此數端，中國之儒家，均已辦到。中國之士大夫，只是地主豪族出身。政治經濟道德教育之權，直至最近，尚不出此輩之手，敬天法古，代天司命，亦是儒家信條。故從外國宗教之政權言，實在與中國之儒家之掌握政權並無異致。兩者之不同，只在一個成爲宗教，而一個不成爲宗教，其關鍵在於神的觀念一點上。外國宗教神之氣味極重。而儒家則幾於無神。其所謂天，實不是神。故儒家不成爲宗教。宗教因爲有神的維繫，所以不能不有禮拜集會之所，因而發生教堂寺院與專職之僧侶，流演成爲另一系統。儒家因爲無神，故雖然聚徒講學，卻隨講隨散。若說儒家與其他宗教之處理人倫事物，原無不同。只是其他宗教有一禮神儀式之組織系統，故儒國家之經濟政治道德教育等權，拉到寺院內來辦。而儒家卻不用此寺院組織，只訓導出學人來，放他到社會去包攬政治經濟道德教育等權也。

中國儒家何以不會得像西洋教會一樣，發展成爲寺院式的系統，而偏將訓育出來的學人，分散到社會中去，尚有一重歷史的關係。儒家之興，在中國生產力開始停滯穩定的時候，在政治上則爲大統一的時候。繼此以後，中國生產力即無根本大變動。政治上的統一雖有時瓦解，而統治階級需要利用儒家哲理以維持權力卻無時不相同。所以儒家一與統治階級結合，即沆瀣不可再分。統治階級即是信奉儒術的地主階級，而地主階級，本身即是研習儒術的學人。所以在中國這種情形下，儒家沒有另成一系統以攬奪統治權而與君主對立的必要。有之，即爲歷代

君權與相權的衝突。這可以比之歐洲教會與國王的衝突。假如中國史上連續有五胡異族之亂，假如政治權力之興替甚暫，假如新統治權力不能順利歸化到儒家的教理中來，則中國的地主階級，說不定會得創立儒教寺院，如西洋寺院一樣，將統治權從國家手中奪到「儒教寺院」中來。

宗教中禮拜儀式，往往為創教人就當時民間拜神儀式，采編而入。並非創教人自創一神。中國人非無宗教信仰，亦非無宗教需要。在佛道兩教未興前，拜物之風即已遍行。近人考據謂殷周之世猶行罔騰之制。降及後世，兩教並興。信佛之徒，尤多且勝。信鬼神敬祖先均為先民宗教之遺風，至今罔替。佛陀之興，藉帝王之力，風靡一時。然人之信佛，僅為滿足其宗教上超生懺罪之需要。國家政治經濟道德教育之大權，已在代表大地主之儒家手中，終奪不去。神權與政治分立，因而神權之發展，受其限制。中國寺院曾屢次企圖爭奪土地爭奪人民，曾有短時期的成功，而終被大地主打倒。

中世紀的基督教，集政權與經濟於一身，故鄉僻農村亦有禮拜堂。非但為拜神佈道之所，亦為一切政令消息之總機關，如村長之公所，頭目之家庭，故能普及各地。其在中國，基督教會及釋道寺觀雖普及全國，而其中心點大致只在城市，其生活所依，亦賴城市。大多數寺院，雖設在窮僻山林幽僻之地，而其主旨仍在招攬遠近城市的善男信女。佛力雖廣，如純賴當地農人之施捨，恐怕善知識要盡墮餓鬼道。（近代基督教天主教會之致力農村福利事業而駐於鄉村者，自當別論，但其經費之來源，亦從外邊輸入。）中國之宗教不能將土地財產奪在手內，又

不能將政治經濟教育等權奪在手內。故始終不能像外國宗教一樣有勢力。

中國人之缺乏團體，不能說係從缺乏宗教來。外國的團體組織——近代國家，近代社會其來源均不是從宗教化出來，卻反是打破宗教之束縛而解放出來。中世紀之教會，雖含有社會集團意義，使當時歐洲農人，或比當時中國農人更多社交的意思。但產業革命的轉變，並不從此種社會中發生出來。反過來，教會在長時期內，處處成爲產業革命的桎梏。直待打破了他，近代資本主義才得暢快無廉恥地掠奪。外國的近代團體組織，不是從教會中蛻化而來，則顯然不能說中國缺乏團體，係因缺乏宗教之故。反過來，如說中國因爲缺乏團體，所以缺乏宗教，或許還含有一部分理由。

綜括說來：家庭在中國並非特重。在海通以前，誰也不覺得中國家庭之特重。只是外國家庭解放了，從工作組合變爲消費組合，而中國家庭仍爲工作組合，所以對比起來，覺得特重。中國人的倫理觀念，是家庭工作組合的紀律信條。他有二三千年的惰性。而中國哲學又只是倫理關係的抽象化與理解化。生產組織不變，家庭不變，倫理與哲學亦不變。而主持倡導這種哲學倫理的儒家，卻很巧妙地與統治階級合在一起，擔任政治經濟道德教育等使命。所以西洋中世紀教會所擔負的使命，在中國是移在儒家與其代表的統治階級手中。因而中國的宗教，只剩下得祈神求福這一點子些微的連繫，自然不會得像西洋教會這樣煥赫燦爛。這些中西社會組織與文化的異同，根本上均反映中國生產組織與西洋生產組織之異同。中國小農制度的組織是家

庭，所以一切家庭化了。西洋生產組織是工業，所以一切工業化了。中國小農制度生產不變，中國文化不會變。中國文化要與小農自給制度相終始。他是小農自給制度的影子。小農自給制度變更，這種文化一定跟着要變更。

第三篇 民族性

一 農業組織與社會意識

現在我們來討論民族性。

何謂民族性？我因為沒有適當名詞所以用了他。性之一詞，似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的神祕意味。其實我所謂民族性僅指一民族順應環境之習慣與其心理背景，從積世的經驗陶鎔而成，為平常應付事理之準則。普通如遇一事一物，便根據此種心理習慣去應付，不用臨時遇事考慮試探。民族性既是習慣，所以有惰性。在新事理不能適合時，人們亦往往仍依舊習慣去做，因而會得發生抵牾枘鑿的現象。

中華民族性是什麼？中外觀察者均有得說，列舉甚多。我想如其只注意於民族行為之任何一方面，從而推測其內在之習性，舉以為中華民族之特性，則用筷子喫飯，寫直行字，穿長袍馬褂，好豬肉不好牛奶，似乎均可算作特性，而中華民族將成爲無所不有，備具各種性（即是沒有一種特性，而只有普遍性）的一個奇怪民族。譬如說：和平爲中華民族特性，但中國人

相聚，幾乎最好爭論鬪意氣，甚至往往聚衆械鬪。二千年前已有人說秦人勇於私鬪。近一世紀，中國恐怕是世界上對內對外作戰次數最多的國家，明明與和平特性抵觸。又如中國人最渙散，但家庭團結之堅，人所共知。即舊式商店工廠之組織，在某種關係上，亦比現代之工廠公司爲團結。又如消極無爲及懶惰云係中國人特性，但中華民族素以勤勉著稱，自唐風蟋蟀之世已然。決不能勤勉而又無爲。如憑主觀任舉一點以爲中華民族之特性，而不求此特性形成之來源，則必致自己抵牾。

我以爲任何民族只有一種特性，一種適應環境的心理習慣。這一習慣形成以後，適應各種事物，可以向各方面表現爲種種矛盾之現像，而根本卻是一以貫之。

民族特性并非一民族自由選定或公共商定，亦非適逢其會偶然形成。而爲此民族物質的社會的環境及歷史所養成。從大體上說，中華民族過着小農自給生活。這種經濟生活，即爲決定中華民族特性之根本原因。許多重要的中華民族特性，直接間接，大致可從此一點求解釋。

中華民族最顯著之特性爲渙散無組織，所謂一盤散沙，此一特性，即從小農自給制度上來。

小農民族之不易有團結組織者，其理由有二：一是其生產技術不需要亦不容許大規模之團結組織，此爲一切農業之共通性。二是其社會組織不容許亦不需要大規模之團結組織，此爲小農經營獨具之特性。

組織之起，由於分工。分工之起，由於各個體本身及工作性質之不同。有守門，有中堅，有前鋒，然後成一球隊。所謂組織者，即係選擇最適宜的個人，擔任最適合的工作，而使各分子的工作，能夠進行像一個個體一樣。英文之 *Organize* 一字，其意義，是「賦予一個有機體結構」。那即是說，將不同的分子，分配搭置成爲一個機構而給予生命。中文譯爲「組織」，只表示了死的結構意思，而沒有表示活的動作意思。沒有分工，即沒有組織。個體才能無差別，工作性質無差別，即無法組織。如人人只能守門，不能衝鋒，則球隊組織不成。組織以後，各個分子，自己沒有生命，而成爲新生命之一部分。他的存在是爲了新生命的緣故。守門是爲了球隊守門，不是爲了自己守門。所以組織有四條件。一是分子本身有同異。二是工作性質有同異。三是分配得當。四是被組織的分子能夠將自己個體溶化在新組織內，只有組織，沒有自己。這末一點便是團結。

農業耕作，即在近代使用動力機以後，比較尚以單獨工作爲宜。不能如工業生產之分工。在工廠生產過程中，每一工人只管機器中一小部分。他只是整個生產過程中之一小節。而在農業中則每一農人從犁地以至收割，甚至出糶借貸，集金融，商業，農業，組織工作於一手。農人生產，可以說是時間上縱的繼續。而工人生產，則可以說是空間上橫的分配。并且工業生產不受氣候雨量等自然環境之限制，終年可以進行。而農業生產，則必依季節爲定。不在農業季節時候，農業耕作無法進行。而季節一到，即須趕緊耕作。在工廠內，工作之性質，任務之分

配，各工作階段之聯絡，其時間，其地位，工作之速度及秩序，均爲所用的機器所決定。每個工作者只照顧到整個工作生產之一節。自然不能不有一個超越局部利益而組織整個工廠的機構。農業則不同。春耕夏耘是時間的分別。決不能分工使一人春耕，一人秋收。即使可以分工的事如出售穀物，亦往往因爲工作太少而不值得分。所以工業生產不能不有組織。組織是工業生產的必要條件。而農人則不然。如農業經營而亦照工業之分工組織，恐怕無法進行。現代之農業合作組織如集體農場及工業式之大農場，雖爲應用工業原理之產物，甚至亦能採用科學管理，亦能分工耕作；但其分工組織之程度，無論如何，不能與工業組織相提并論。農業耕作之分工組織，在超過一定限度以後，恐怕反而無利。所以向來傳統的農業生產，因爲技術上的需要，每個農人只能一個一個單獨工作，不能有團結與組織。

小農經營之不能團結與組織尙有社會的原因。在大農場內各個農人在技術上縱不能如工業之團結組織，而多數農業勞動者，聚居一處，在社會關係上，自有同感。其對於雇主及其彼此間之關係相同，亦尙有團結組織之可能。但在小農經營下，則農民分布無數鄉村。每村少則數家，多則百十家。村與村間之距離，少則三四里，多則數十百里。荒瘠各區，分布尤散。蓋聚居密則地力不足養，故不得不散。且農人屋廬不能距離農場過遠。過遠則出入往返不便，耗時太多，經營太不經濟。故農人之居處，必依田場而分布。在廣大平原上，爲生命居住之安全，雖不能離羣獨宿，全無隣人互助。但村之範圍不能過大而妨害工作之便利，北方種麥，比較粗

放，農場面積較大，故村落人口較多而相距較遠，恆築堡壘自衛。日出則驅牛羊而耕作，日入則收衆歸壘。一堡之內，生活所需，醫藥雜貨，往往具給。其餘則於集日互市。其社交範圍平時幾限於堡內。南方種稻，經營集約，近於園藝，故尤不便聚多數農戶於一村，往往三數家或數十家一村，而村與村間距離較近。一村之內不能自給，於是較大之鎮，商販往來，具給各種用品。而衆小村落，三數家，十餘家，環拱以居。或并無集日，常年互市。凡此情態，自爲農地利用狀態所決定。故農人不得不於極小範圍內有社交活動，有社會組織。且農業必須就地經營，農人不能遠行，愈使農人無廣大社交之可能。故農人對於大範圍之社會集團，如現代國家以至大帝國，在其職業上爲不能相容，因之亦不感興趣之問題。

凡社會組織必以社交往來爲前提。有社會交際，彼此有心靈上之溝通，思想感情上之接觸，或相同相應，或相異相拒，於是方談得到分彼此有組織。而社會上欲有交際，則必先有交通。如交通未開，彼此互相往來，自無集團組織之可能。故文化組織乃社會生活之表現，人類心靈互感之結晶。在初民社會中，社交之時期，往往爲工作季節所限。我國古時於冬令農隙，聚衆講武事，修城郭。農人於秋收後上集赴城，始有互易，會親友，賽會酬神等事。始有比較閒暇廣泛之社交活動。與城市生活之終年在社交中活動者大異其趣。工業文化中的城市生活，可以有種種集團，有岳母會，有禿頭會，有畸人會，醜漢會，而中國人則祇有同鄉會。交通不便是社會意識不能發達的原因。農業耕作，即在工業化十分發達之美國，往往亦僅以一個家庭

爲單位，仍是小農場。但他們自己有汽車，鐵路亦方便，隨時可出外旅行。公路發達，鄉村中亦常有外來旅客。平時更可從收音機及日報上得到各種世界知識。他們的興趣，他們的心理，是已經工業化了的，並不限於自己家庭的農場。但這些交通媒介，在中國農村中幾於完全沒有。一個中國農人，自生至死，沒有見過本村隣村以外的人物，沒有關心過世界國家大事，恐怕很多。至於一生不曾見過火車，坐過輪船，架過飛機汽車，看過報，收過無線電播音，更是十人而九。這樣，那裏會有社會意識。

缺乏社會意識的反面，即係個人意識相對的抬頭。農人自己單獨耕作，不與旁人互助。其意識中自以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他人既無助於我，我亦何必助人。則人人孤獨而無社會關係，主觀上亦不發生社會意識。主張小國寡民的老莊，其理想中的社會組織是隣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與美國農民之有汽車有無線電收音機正好相反。並且自耕自給的小農，其私產觀念特別重。狩獵與游牧均爲全民族之集團生活。單個人不能過畋獵生活，亦不能飼養大羣牲畜。其生活不能離開團體，其產品不能認明爲自己勞力的收穫。狩獵民族僅認個人用品爲私產。游牧民族雖有個人之畜羣，但農民則確切認識其農作物爲自己及家庭共同勞力耕種之結果，決與旁人無涉。朝夜不離的土地是祖宗傳下來的遺產。青綠的嫩苗，耐心養他一寸一寸長大起來，若說是別人的幫助吧，那就是靠天。所以農人的私產觀念特別明確。人與人之間分得很清。因此人與人之間往往冷淡自顧自。自己小團體（家庭）的利益

往往看得特別重。而別人的利益，則爲秦人視越人的肥瘠。這種自利的意識態度，與缺乏社會意識，是一種根本態度的兩面。同樣是小農自給制度的產物。

明恩溥牧師 (A. H. Smith) 著「中國人的特性」，以自私自利作爲特性之一。羅斯教授與亨丁頓教授，一著變遷中的中國人，一著種族的品性，均以生活壓迫來說明自私自利心理之發展。以爲在生活壓迫下，若不自私自利，便不免死亡。亨丁頓氏並以爲自私自利的特性，經過適者生存的天演淘汰，成爲種族血統的一部分而遺傳給後代。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人在荒年時死完了。我覺得這兩位教授的解釋，大是勉強。若說自私自利是生活壓迫的結果，經過天演淘汰而遺傳，則後代中國人應比古人更自私自利。至少上古之中國人不應當自私自利。我們前面特地引了擊壤歌和莊子老子。擊壤歌傳說作於堯時，當然不可信。但至遲想不過戰國初秦，與老莊二子全是西歷紀元四五世紀以前的文獻。他們充滿了孤獨自願自的情緒，毫無社會意識。再看一部詩經，有許多夫婦協力勤勉工作的歌詠，而曾無一些社會協調組織的意味。說到田是「我疆我理」，正與別人無涉。說到雨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說到畜是「言私其穡」。私與家的意識，到處可見。可知中國農人之孤獨無社會意識，自上古初爲農民時即已如此。並且擊壤歌老莊等理想的小國寡民狀態，均是一種自給自足愉快安閒的狀態，全沒有表示生活壓迫的痛苦。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所描寫的農村，與外人隔絕，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卻是黃髮垂髻，怡然自得。孤獨誠是孤獨，快樂卻很快樂。你看他說「自得」，便知這種孤獨無社會意

識的心理狀態，決不是兩位教授所說的慘痛淘汰所養成的自私心理。若照他們所說是遺傳的品性，則要謀改良，要靠優生學家來努力。若照我們所說則中國農民這一串互有關係的習性，散漫，孤獨，無組織，無團結，自私自利，無社會意識，原來祇是小農耕作自給自足的環境所養成。在這種環境下，生產技術的需要，強迫農人散漫單獨耕作，強迫他們不能組織團結。所以這種習性，便是 Pavlov 的狗涎，完全是境造的 conditioned。既然是境造的，當然可以重造的。把小農自給制度改變了，這種習慣的心理狀態，當然也改變。

習慣有積重之勢。中華民族無組織無團結的習慣及心理狀態，經過數千年，而依然適合於民族之生活需要，遂為中華民族牢不可破之習性。有史以前之中華民族性如何，雖無可究詰，但依理推想，在一種民族性尚未切實固定僵化以前，各人對於自然及社會環境，應付比較自由。因之各人習慣，或有較大差異。但年復一年，中華民族既不得不在散漫無團結之小農制下生活，則此種習慣與心理，與年俱長，而逐漸具體化起來，成爲一種社會勢力。到得民族性具體化後，民族子孫所遭遇的已經不再是祖先之單純小農制度，而另受到嚴密的傳統習慣與傳統心理之桎梏。在小農制下，如在其他初民民族下一樣，家庭是政治機關，司法機關，亦即是教育機關。父母尊長的傳統習慣與心理，從小就將後代子孫規範起來。在父權制時代，尊長的教訓就是法律，不容違背。所以一種民族性一成習慣，即積重加強。民族愈古老，特性亦愈著，亦愈難更改。

二 真正農民

從一種角度來觀察農人習性，我們可以發現上面所說散漫孤獨等特點。但從另一角度觀察，亦可以發現這些習性原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農民散漫無組織無團結，但在某種關係上組織得極緊湊，團結得極堅強。農民孤獨自私，但有時又極能為團體犧牲。小農制下，生產工作消費分配，均以家庭為基礎，故家庭組織極堅。從來耕作均以一個小家庭為單位。（課稅以一床為單位，即指一夫一婦。）耕耘的辛勞一家共同負擔。收成的享受亦是一家共同有份。在一家之中，有傳統的分工。什麼是男子的事。什麼是女子的事。什麼是孩子的事。是當地公認的不成文法。工作的分配，自然各地不同。有許多地方，用力的事，幾乎全由男子做。女子只做家內操作。有許多地方用力的事，幾乎全由女子做。男子反在家內抱小孩，坐茶館。但不論如何分配，總之分工互助，各盡其職，正是家庭組織的特點。小農制的家庭，像現代社會之工廠，是擔負生產重任的主要組織。若說到組織的堅強緊湊，一心一德通力合作的情形，傳統家庭，比之現代工廠之勞資對立，常有工潮糾紛，似乎要和諧得多，完全得多。家庭組織正是適宜於當時生產技術的組織。

中國號稱為大家族制度。其實家族雖大，而家庭則小。維繫社會關係的從來是小的家庭，而不是大的家族。組織的重心亦在家庭不在家族。大家族內往往有互相詬讟爭執之事。是一種

離心的力量；而夫婦和未成年子女的小家庭，則往往團結協和，是一種向心的力量。（自然婚姻不滿而仳離的家庭，時亦有之。）中國人，尤其女子，往往爲了家庭的福利，犧牲本人的健康與生命。這種事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見到。即從現代道德的觀點說，我們亦不能以這種犧牲爲私利。我們總不能否認家庭是一種社會團體組織。爲了家庭的福利而犧牲個人，總不能不說是爲了團體組織而犧牲一己的公勇精神。至於這個團體之大小或是否合於現代標準係另一事。犧牲的精神總是一樣的。

現代的中國家庭比之傳統的家庭已經漸漸變質了。但我們每個人都從家庭中生活過來，亦多在家庭中生活着。我們自己可以體驗這個基層組織不夠堅強？是不是散漫？是不是孤獨自私？我們幾乎可以說現代社會下的任何一個組織，沒有能像中國傳統家庭那麼緊湊強固，那麼融合無隙，那麼一心一德。中國人可以完全溶化在家庭內，忘卻自己利益。一個小家庭可以一心一德，像一個人身一樣完整，內內外外不發生罅漏歧異。這是任何現代組織所不曾達到的完善境界。組織一詞，當作給予機體以生命解釋，只有中國的家庭組織，纔名符其實。現代人批評家庭往往以爲小範圍組織太堅強了，妨礙大範圍組織之成立。這話是對的。但家庭組織的範圍，從當時生產關係社會需要上看來，並不是太小，而卻是適宜的大小。中國人既能組織適當的團體，並且組織到如此統一完整的境界，使得團體中的分子忘卻自己個人而只看見團體的利害，則中國人不是本能的散漫孤獨自私，無組織團結已可證明。以傳統農業社會家庭化的組織

來應付現代工業化的新文明，自然覺得不相宜。這可以證明時代之變遷，但並不能證明中國人不會得組織。隨着工業化的轉變，我相信中國家庭化的社會組織亦會得轉變。慣於舊習慣舊組織的人，一旦要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組織新的生產事業，新的社會團體，新的政治機構，不免因為經驗的缺乏而錯誤。更不免要承襲舊的精神舊的方法來處理新問題，而不知道新的工業文明之「法」的關係與「物」的關係，完全與家庭化之「人」的關係不同。這種俱是時代的惰性。在此轉變期內，舊組織不適用，新組織不健全，對於中國誠然是很大的損失，很大的危險。但只要我們認識一般中國人不是本能的缺乏組織能力，則我們總可以希望時代進展，隨着農業到工業的嬗變，而得到最後的調整。

除卻家庭以外，也還有別種組織，可以表示中國農民之團體生活。水利組織，即是一種。「水的調節」，如 R. H. Tawney 教授所說，「在中國南方是生產穀物的條件，在北方……則是農業生死的條件。」故一條河流經過的地方，沿河農村往往有灌溉的組織，規定用水先後，水源維持，水流管理，修堤挖渠等事。儘管是不成文法，卻是切實執行。有時由地方政府幫助支持，但主動組織的總是農民自身。

聯保團防亦是農民自動的組織。勢力大的可以號召幾千人，推及十幾總。一般說來，團防組織與匪患成正比例。匪患愈多的地方，團防組織亦愈大。這些多是維持生活秩序必須的團結。農民們不須有人教導，自然能夠直覺地本能地推舉領袖出來辦理公益的事情。也決沒有人

會得只顧自己私利而不願參加，道德的法律的制裁固然是一種力量，但羣衆的暗示已足夠喚起每人的熱血。抵抗土匪的民團往往遠征到本鄉以外，他們比較一般美國孤立派更要講公道肯犧牲一些。他們決不以爲只要土匪不打到我大門，我可以不管。其餘鄉村中公益事情，如造橋修路等等，農民亦自動肯做。只有到了鄉紳士大夫手中，這些公益的事情，纔變成陰隲修心的私自利行爲。

普通又以爲農人安土重遷，無冒險精神。農民不能離開土地而生活，故農人不願意輕易拋棄土地，原在情理之中。中國是尺土寸地已經盡數墾種的國家。沒有餘剩沃土，可以隨便遷換。美國農人對於一塊不甚滿意的土地可以棄去，收拾行李，跑到數百千里以外，另覓新地耕種。在中國是事實不容許。但中國史上充滿了移民的記載。每當荒亂兵燹苛政壓迫，至於生活所需蕩然無存時，便有移徙與暴動。精神病者如陳仲子及不食嗟來之齊人究屬極少數。五胡十國南宋是避亂移民之大者。漢族向外擴充時，遠征兵士亦多流寓。歷代之經營西域，隋唐之征高麗，明之經營東北，西南及緬甸交趾，元之遠征海外，均將中國人移殖出去。清末之征新疆，尤給我們以實例。迄今新省頗多湘人，爲左部流寓。逃戶逃荒更是常事。或歲荒，或苛政，人民流遷。或冬去春返，或一去不返。近代閩粵僑民移殖南洋。齊魯僑民移殖關外。抗戰期間沿江沿海各省人民，移殖西南西北。可見得中國無論農民非農民，並非沒有冒險遠行的精神。問題還在生產力上邊。如其中國確實知道有改進生活的機會，那像別的民族一樣，不會得

守株待兔。

從農民生活上觀察，我們更可以發現現在環境限制以內他們很有社交意識。鄉村中逢到婚喪喜慶，總是竭力張羅待客。調查農民經濟的人，已經屢屢指明這種社交活動，是農民費用之重要部分，並且是農人舉債的重要原因。婚嫁舖張自然是一種體面關係，表示社會地位。他的背後即是社會意識。農人對客大多很熱誠。這或許還是初民遺風幸而不曾被人為的文化所修飾掉。如其有過路客人到鄉中求宿，十家有九家可以招留。雖然很苦很儉，卻很殷勤，有時還不肯收錢。如其你到城市中望門求宿，十家內祇有十家拒絕。

一般說來，農民的性格爽直誠懇，容易感動，實事求是，和易可親，生活簡單，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近於 *Cyrtologyna* 一型。那應當是富有組織能力的。事實上恐怕他們也確比士大夫們善於組織。許多以農民起為夫子的人，往往比士大夫造反的領袖來得有聲有色，如劉裕比桓玄，竇建德比楊玄感。農民是能組織而能領導的，不過被環境限着罷了。

但三四千年文化的浸潤，在農民心理上，不會得不留下深刻的斑痕。家庭組織的堅強，使他們心理上發生惰性，不能立刻適應新的大的組織，我們已經說過。在各種才能中，卑順屈服 (*Self-submission*) 這一種本能，在中國農民中似乎亦特別發達。在歷史上，農民始終是被統治者，他們無時無地不在壓迫掠奪下求一綫生活。災荒的壓迫是天意，超出於農人抗拒的力量。內亂戰事是國家大政，亦是農民們無可奈何的惡運。幸而時清世平，無災無難，農民們喘過一

口氣。便有豪強大族兼併土地，便有苛捐重稅種種剝削；農民對於這些人爲的壓迫，除了流血暴動以外，更沒有反抗的方法。但流血暴動便是戰爭，戰爭破壞農作比兼併苛稅更凶。因此農民不得不忍痛接受兼併稅租的負擔，降低生活程度以求生活。更不得不忍痛承認地主官僚對於他們予取予求的權利。承認他們統治的地位而承認自己地位之卑賤。久而久之，成爲自然。本來這種社會地位之貴賤，係跟政治地位而來。歷史上的地主先有政權而後奪掠地權。地主未爲地主時已先爲統治階級。農民未爲農民時已先爲被治階級。所以農民之接受卑賤的社會政治地位是接受一種既成事實。三四千年來的文化教育社會倫理，使得農民對於這種社會地位認爲當然的事，幾幾乎與天道命運同一無可頑抗。他們的意識中亦幾幾乎再想不到抗拒。這種社會地位，與有生俱來，在平時下意識中便只有柔服馴順的分兒。不獨中國農民如此，別國農民亦大多如此。農民的社會地位，雖然自出生以來，就是卑賤。但農家小孩子，經自己父母撫養，在自己家庭環境下生長。那種環境，雖然在物質方面很劣，卻是比較近於自然沒有十分苛細的人工修飾。父權的威嚴，母愛的溫情，姊妹同伴的相處關係，比之士大夫家庭，還要親切自然一些。所以這些小孩子，可以養成一種正常的心理狀態，不一定會得發生「卑賤疙瘩」。當他們看見自己父兄伯叔或者受到地主或其僕役們的欺侮時，他們小心靈裏會得感覺卑賤。但這種卑賤心理，他們是以旁觀地位感覺的。對於他們這是一種社會的教訓，而不完全是一種情感的抑制。果然他們可以聽到父兄伯叔們的慨嘆以爲命運如此，無可奈何。在小孩子的心中，這種道

德教訓的意義一天一天積聚起來，使他們漸漸與成年人同樣接受這種已成的環境。中國農民社會地位之卑賤，尙遠在有史以前。恐怕西陰村城子崖的農民，已經是被統治的臣僕庶人。這種社會地位，他們已經接受了六七千年。日積月累而成爲當然。

我們說農民沒有怨毒卑賤疙瘩心理，可以從農民對於新奇事物態度上看出。農民對於新奇的事物往往有好奇心。或聚在一處看，或聚在一處講。如其城裏來了一位美麗的姑娘，或漂亮的少年，穿得好，打扮得好。他們一定是窺看歆羨。這種心理是贊賞的表現。在馴順（*submissive*）的人，感覺自己之渺小與對象之美善偉大時，往往發現這種表情。換了一個卑賤疙瘩的人，他對於對象之偉大勝於自己時，便要覺得怨毒悲恨，或背後咒咀或逃避不願看。中國農人全不是這種型態。所以我們說六七千年的社會壓迫，養成了農民卑順（*Self-submissive*）的心理，但是因爲農民家庭教育，或者因爲農民沒有家庭教育之故，他們並沒有養成「卑賤疙瘩」。

因爲卑順，所以農民是消極的。他們的自信力比較薄，他們的生活比較知足。他們對於不如意的事，能夠逆來順受。他們的生活艱苦，他們不得不重實際而少理想。在他們中間侵占兇暴型態的人（*Aggressive type*）也比較少。這種心理狀態是他們社會的地位，歷史的積重造成功的。在轉變期的中國，能不能不迅速改善，我覺得大有問題。一個卑順馴服，沒有自信心，不積極進取而知足不辱的人，在大時代內可以作爲英雄事業的作料（甚至不是好的作料），可

以作爲傳種接代的機器。除此之外，其生也忽焉，其死也忽焉，簡直是無所用之。他們絕不能擔當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大任。六七千年以來，他們的成就，只是維持了自己一口吃，維持了四萬萬子孫，像牛馬一樣做着，像豬狗一樣活着。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供養一輩士大夫，造出一些不死不活的中國文化。要使他們積極參加中國工業化，得將他們卑順馴伏知足消極的心理改變過來。在討論組織能力時我們比較樂觀。覺得農業的環境改了，組織經驗自會得積起來。在這裏我們便不能如此樂觀。或許工業化起來，生產發展的機會增加，農民們也有發展的機會，也會得興頹立儲。但或許工業化發展的機會，只限於社會上層。社會的限制，仍舊將農民捆在下層，永久不得解放。永久卑順知足。這要看將來國家的政策如何。

消極的心理，一方面說便是偷懶。中國農人無疑是很勤力的。不勤則不得食，自然不能不勤。但體力之勤與心理之懶，是兩件事，不妨並存。農業工作是季節性的工作。Beck諸君調查，中國農人一年之中倒有小半年閑着沒事。這種閑是 J. M. Keynes 所謂「不自願的失業」，不能說是農人之懶。但閑了沒事則不免養成其懶。懶之一字，或者太過火。我們可以改做不緊張。農人即在奮力下地之時，其心緒未必是緊張的。犁地播種戽水的時候，自朝至暮，農人的工作雖忙，但他的速度，他的心緒呼吸，就被老牛緩穩的步伐所磨細。他自己急不出來，也無所用其急。反正今天下種不能明天收割。所以在工作的過程中，休息消閒，談天抽煙，盡是可能的事。這種心理這種習慣與工業生產之講效率講速度者完全不侔。飛機與牛，快與慢，是工

業文化與農業文化一個顯著的分別。蘇聯五年計劃時，很感覺農民弛緩的情緒與工業效率配不上。現在西南各新設工廠招來本地農村工人亦有此感覺。工人們亦不慣工廠工作之緊張，往往棄職回去。印度工廠尤其感覺工人之弛緩。甚至於想盡種種方法，加薪資，發獎金，而工人不願多做。做了一季半年之後，往往回鄉休息一二月，甚至幾個星期的連續工作也不肯做。弛緩的心理是農業造成的。但其惰性很深。農業改了，心理或不即改。這裏也是個脫節。

三 士大夫與組織

中國一般農人缺乏組織能力不足為奇。從來社會政治軍事等重要組織，是統治階級的事，即在外國亦是如此。

然則中國的統治階級，為什麼也不善於組織呢？

以農立國的中國，統治階段即係地主階級。最初練習組織能力的機會，自然是土地經營方式。地主已經握有地權，小的數百頃，大的三四萬畝，自己一家的力量決不能耕種。如其雇工自己經營，或用奴隸經營，即須有大批軍隊式的勞力，少亦數百人，多至萬人。這樣就需要很大的組織能力。從歷史上我們知道這種大規模的集團耕作，從來沒有過。大地主的地上雖多，而其經營仍是小規模的。或將土地出租而分其收穫物。或者其土地是莊客寄戶零星湊集而仍由客戶耕種着。現在所見到的三四萬畝大地主的經營組織，祇是一個商店式的經租帳房，有二三

位師爺專管收租。並且其活動時期，祇在秋收以後二三個月而已。中古田租繳納實物時代，地主不得不自備倉庫。但亦往往責成佃戶自將租粟運至倉庫繳納。連運輸的組織亦不自辦。所以地主雖大，而其經營組織則幾於是「無爲而治」。他們非但不將大的田地按軍隊組織來耕種；反過來，歷史上軍隊耕種田地時，（所謂屯田營田，）亦往往將軍隊組織拆散了，照地主辦法小塊耕種。例如南宋時張浚江淮營田，以地五頃爲二莊，以五家爲一堡，共佃一莊。（見宋史食貨志及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我們祇記着每一農人能耕的田畝有限及農田離住所太遠耕作不經濟這一事實，則可以推想地主如沒有大汽車每天在數百十萬方里內接送成萬農人，其分成小塊而出佃，實係很自然的。因之統治的地主階級，是用「無組織」的方式來經營的。換句話說，他是依賴農人的組織而經營的。他的經營，乃以農人的組織爲前提。而農人的組織，便是一個一個家庭。

統治階級的地主，雖然大多住在城內，可是交通的不方便，與社交的缺乏，還是一樣阻礙了他們團體意識的發展。實在說，他們既沒有團體組織，更沒有團體意識。農民平時雖無組織，而常演戲賽會抗租暴動這種羣策羣力的時候，他們往往表示很好的合羣本能。在這一點上統治階級，尤其上了年歲的人，還比不上農民。我們覺得統治階級的兒童教育，生活狀況，及社會環境，所養成的人格，比之農民，一般地更不宜於組織團結的發展。

我們試讀朱晦庵的小學，陳北溪的小學詩禮，陳宏謀的養正遺規。古來士大夫縉紳人家，

對於小孩子是如何一種管教方法。他們是把聖賢期待七八歲小孩子的。便是再小一些的幼孩，也是嚴厲督教，從不許將順。將順就是溺愛。更古方一些的還要教到胎兒。小孩子時代是本能發展與人格形成的時代。古人的教法，是從小便將本能壓制下去。許多重要的本能，如兩性的本能，爭鬪的本能，貪得的本能，好勝的本能，全認為不當而加以阻遏。這樣，那能不造出一種揉曲不正的人格來？幸虧許多孩子還被溺愛的祖母母親救了一些。賈寶玉是在老太太手裏放縱出來的。若在賈政手裏，天天祇有罵。巴金所著小說「春」裏邊一個什麼「枚表弟」就是賈政所管寶玉的榜樣。固然我們不能證明賈寶玉如不出家，定有組織能力。但我們看得出賈寶玉在姊妹們中間，在沒有拘束的伴侶中間，他是相當個儻，和易可親，靈敏而不太頑固的。這種性格比較近於社會領袖的性格。反過來，拘謹，冷靜或甚至冷酷，固執，猜疑的人，一定不宜於作領袖，擔任組織工作。而古來的兒童教育，便祇會造成這種「冷態」(Desert)的人。

我不大懂得京劇，但我很喜歡京劇的臉譜與化裝。京劇中的鬚生，是典型的藝術化的中國士大夫。尖瘦的面龐，狹胸，長腿，是心理學上所謂 *Schizothyme* 型態。冷工以這種型態代表中國士大夫，是人生經驗之作。這種人感覺銳敏而行動遲緩。多疑三思，孤獨冷淡。自負而不易討好。莊子所說躍出洪爐自己要做東做西的不祥之人，就是形容他們。

個性心理學上術語，以 *Social Index* 來測量互助精神之豐吝。中國士大夫無疑是 *Social*

Hom 極低的人。一般態度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前輩教人以安分守己為良好公民。遇事生風為壞蛋。安分守己的公民道德就是普遍的冷眼旁觀。研究養狗的外國人，以為中國狗種個性最冷，對於外界事物若不關心。我以為他不是說中國狗，竟是借題發揮罵中國人。

但中國統治階級不善組織，不一定是天性，而多數尙是環境造成。農業耕作事實上只能是小組織。組織發達由於分工。一個社會百分之八十人口是農人，其分工範圍自極有限。並且我們既說組織是給個體以生命，則職司傳導的神經系統自屬最要。高等動物組織靈活，因為神經系統可以傳達腦中樞的命令。低等動物便不能有中樞指揮的神經組織。這很可以比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社會政治軍事組織。電報沒有普遍以前，交通最快不過置郵傳命。中國幅員這樣大，命令從中央到地方，或許要二三個月。因此地方不得自主，不得不像低等動物節節活的組織。試想人體組織，從腦神經傳導四肢，不說二三個月，就是二三分鐘，此人還能不住醫院麼？現代組織之緊湊靈活，第一靠交通。在小農經濟下幾無交通可言，自亦無組織可言。中國曾有多次被游牧民族統治。游牧民族向來認為富有組織能力。但他們對於這湖廣大孤獨隔離的農村社會，沒有辦法。他們試過一些新法，如金人之括民戶，弄得一敗塗地。可知中國社會之缺乏組織，不能盡歸咎於士大夫。農業社本身如此。士大夫缺乏組織力，正為士大夫是這個社會的產物。

四 氣節面子等等

孟子說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治人者與治於人者自是兩等人。所謂上等人與平民。多數中國人，在自然壓力下，在政治社會經濟壓力下，養成卑順馴伏的習慣心理。這一事實，亦所以說明，少數士大夫，處優勢地位，掌握政治社會經濟壓力在手內，必然另有一種習慣心理。從心理解析上說來，治人者似乎均帶些「卑賤疙瘩」，有些反抗性，英雄尤然。或可說，對於事物之來，他們的習性，偏要執拗而征服之。這是他們的教育環境歷史所養成。所以歷代討論對外關係，國勢盛時，往往反是主撫論；國勢弱時，往往反是主戰論。孔子說的小子狂狷，是可忍孰不可忍，全是這種氣概。儒家最講究氣節。氣節美言之是道德的涵養。孟子所謂吾善養我浩然之氣。小言之就是死要面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是講氣節的好註腳。這是與實利主義全相反的榮譽心理。

士大夫的心理習慣，在許多歷史大事上，比一般平民的心理習慣還要重要。許多重大史跡，如漢唐武功，如宋明理學，易代之際，如文天祥史可法等可歌可泣的事跡，盡是統治階級自尊心理所表現。因為士大夫階級是領導者，所以他們的心理習慣，在能夠發動多數民衆的時候，可以造成一時代的風氣，深入民間，有支配力量。

士大夫無不愛惜名譽，中外古今皆然。但生產力停滯，生活細膩裝飾的士大夫，其保護名

譽方式，卻自特殊。戰國秦漢時人愛惜名譽是不屑受辱。不幸被辱則不惜傾死相報。漢高詛謾罵趙王敖。趙相貫高至於報仇行刺。聶政刺軻均以生命爲人雪恥。所以說「知恥近乎勇」。後世士大夫是怕受辱。交接往來避免可受辱的人。做事說話避免可受辱的因子。知足不辱。君子不爭。如其不幸受辱，他們並不能按劍而踞，傾死相報。他們只要爭回面子，爭回一口氣。因爲他們過的原祇是有氣無力的生活。有力量的人，生活可以淫佚放蕩，但意氣亦豪邁痛快。唐朝是生產力比較進展的時代，其人生活頗放縱豪淫。掠奴搶人，無所不爲。唐人小說也常常提到游俠。其人舉動也很多豪氣，片言相得，駿馬歌伎，舉船相贈。現在美國人也有這種豪氣。宋人以後便換了面目。再沒有驕縱豪俠的大手面。連呂后武則天這種女人，漢高祖唐太宗（除卻明太祖）這種英雄，全沒有了。司馬遷做史記，將貨殖游俠並傳。歐陽修做五代史卻要爲獨行君子立傳。中國士大夫心理的變遷，從這兩位史家的去取中，可以看出。

有氣無力的生活，遮掩面子的生活，其流弊是卑鄙無恥，沒有信義節操。人與人相處交往，不敢直言，不敢直道而行，生怕得罪人。所謂怕得罪人，並不是設身處地，代人着想的同情心與恕道。怕得罪人是生怕別人見怪報復，使自己失面子。所以做人只顧柔懦無骨。逢到危難，逢到大事，只想推躲責任。是非好歹，不敢在人前主張，而偏喜歡背後批評。說話吞吞吐吐，做事蒙頭露尾。因爲怕失面子，所以怕擔責任，因爲怕擔責任，所以怕做事。不做中人不做保，一世無煩惱，是中國人不負責任的處世哲學。將做人處世的哲學移來做官，怕說話，怕

做事，怕負責，怕得罪人，怕傷情面，儘管清儉安分，而這樣泄泄沓沓無榮無辱，也儘夠壞了國家大事。鄉愿德之賊也，真是不錯。折檻唾面的風骨，請劍埋輪的氣概，在後世甚少。社會上，官場中，只有精於處世的人方纔站得住爬得上。這無異獎勵無恥，獎勵不負責。在這種社會陶冶下，自沒有堅貞剛強的風氣。

愛面子係安慰心靈創傷的自欺辦法，是人生鬱勃情緒的太平門，其功用與夢相仿。中國人之愛面子，似比別民族特爲看重。本來愛面子之心係人類所同具。其他民族亦有掩飾門面的醜態。但中國人則往往爲了面子，不惜犧牲實際利益。只要面子過得去，利益不妨讓人。中國人特別愛面子，正爲中國人內心特別有創傷。沒錢的人對於餽遺犒賞決不肯算小，就怕人家看穿他的景况。處女對於普通男女關係之談話場所要避免，就怕人家注想他內心的衝動。這是解析心理學中之補償作用。中國士大夫既有氣無力的可憐蟲，自然要特別注意到表面的光榮，作爲油彩粉飾，來安慰自己的心靈，來遮掩庶人眼睛。但面子是虛僞的。因此中國人的相處，往往亦是虛僞不能盡情。因爲矜重面子，不得不將真情藏起來，怕他受傷。在外國人間應當顧全對方心理而避忌的談話或事物，在中國人間幾乎無不應該避忌。（特殊的風俗習慣，如請問尊姓大名等等，自屬例外。）但外國朋友間可以隨便率直談論的話，在中國朋友間，非極熟不易出口。因此外國人往往覺得中國人客氣虛僞。明明自己覺得好的東西，卻謙讓以爲不好。明明心裏要的東西，卻謙讓以爲不要。在外國人看來，真難理解。譬如外國人請客，一定自讚酒好

菜好。中國人請客，一定自謙沒有好菜。從外國人看來，既然菜不好，爲什麼不辦好些，明明是主人沒有誠心。那知道中國人的苦處。他生怕人家嫌菜不好，自己先謙說不好則人家不好再說。他明明要的東西，生怕人家不給，先說不要，則萬一不給，尙可推說是他自己不願要。中國人客氣的鬼計，原來就是遮掩門面的方法。中國人的面子，就像海軍戰艦的戰艦，輕易不能讓他見人，一定要四面保護好。所以「君子不爲己甚」。「君子不盡人之情，亦天地含蓄之道」。知恥近乎勇。這些留而子的倫理哲學，盡是中國民族爐火純青以後無恥無勇的哲學。

愛面子愛虛榮這種特性，可說是女性陰柔之美。婦女在現代社會裏，其經濟力量其社會地位均不如男子。其生理構造又有周期痛苦。故在現社會下，無論何國，婦女均爲弱者。因其弱故婦女恆比男子爲和平，又比較消極。S. Freud 的解析心理，即以婦女列爲 *Masochistic* 一組，表示其能忍耐抑制。在男女關係間男子熱烈追求而女子多溫默消受。但在愛虛榮愛面子一點上，女子比男子特甚。從婦女的態度與心理，可以證明軟弱無力與虛榮面子有連帶關係。

愛面子有時面子尙不可得，則有幻想以濟其窮。詩人放情花鳥託意求仙均是此種變態。中國人對於林泉清福，歌詠讚嘆，不一而足。小品文中焚香品茗蒔花讀畫等等無聊的清玩，多表示沒有創造力量而希望享福舒服的補償情緒。陶淵明貧至乞食而賦閑情。李笠翁自云「身處極貧之地，知物力之最艱」，而作閒情偶寄。便是這一流。

愛面子雖爲人類通病，不能獨責中國人。但愛面子而逢到散漫消極無力無組織的社會，就

形成虛矯高調與空疏。中國士人素尚清談。周師將至，而梁元帝猶聚百官戎服講經。末了還說「文武之道，盡於此矣」，真是可笑可嘆。魏晉以來，形式雖變，而麀尾相傳，一脈不衰。吳大激張佩綸輩就是克紹箕裘的後代。歷代黨爭，起於議禮，起於太學，多是很可笑的空論。古人很講實利。孟子所見的梁惠王齊宣王就老實說要自己人民加多，自己土地加廣。並且自己承認好色好勇。他們的戰爭，有聲有色，血肉相搏，一坑降卒就是數十萬。漢朝的公卿有罪輒自殺，決不肯像明朝大學士一樣在金鑾殿上打屁股。他們是率直的人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董仲舒誼語。到後代儒家手中，便成爲一切空疏敷衍的大招牌。要做事施政，便只問合理不合理，有道無道，而不問如何做。一切事實利害問題，變成道德問題。以致向來中國政治只有大原則大前提，而沒有實施方案。上面一紙命令，下面一場敷衍。幾千年來國家大事便在這種狀態下混。混得過去，就是英國人的 *Muddling Through*。混不過去就說是天命。

近百年來，自五口通商至抗日戰爭，中國志士仁人，爲國家爲民族，對內對外，均盡力想使中國趕上西洋文明。百年來一切努力活動，均可以看作此種過程之一支段。中國民族性，在許多地方，已受近代文明的洗禮。但大致說來，仍舊保留着小農制下傳統的情性。一方面還是卑順馴伏，忍耐寬弛。一方面還是虛誕空疏愛面子。而共通的還是散漫無組織，孤獨自私。這些習性大多是農業自給制度所養成。現在中國尚未脫離此種經濟階段，亦即無由先自擺脫其習

性。小農自給制度轉變爲工業化以後，家庭組織的重要性，要被國家組織所代替。各私其家，各忠其君的觀念，要被愛國觀念世界觀念所代替。因而散漫無組織，孤獨無團結，自私自利無社會意識這些特性要改變過來。生產力的發展會得將象牙塔裏的公子哥兒解放出來。卑賤疙瘩消除。而子心理緩和。知足消閑的態度，轉爲積極進取的人生。心理狀態與人格不致於太揉曲。

但農民們卑順馴伏的心理，是長時期社會壓迫的結果。工業化以後這種情形能不能改良，主要的要看士大夫的態度。生產力解放，一切發展的機會，盡待人開發。他們既有解放生產力以謀利增殖的機會，應當也會得發生積極進取的精神。他們從田場走入工場以後，會得因爲工人團體組織之發展，因爲生產力解放後爭取利益分配，得到鼓勵而成爲積極前進的人生，消除卑順馴伏的傳統心理。如其政治真能民主。統治階級不能以政治優勢來捆住農民。則解放後的農民常能將自己傳統的人生價值觀念改變，將寬弛閑暇的心緒變爲緊張積極。同時，士大夫亦要自覺的急起直追。民族性與工業化互爲因果。工業化可以糾正民族性。民族性改變亦可以推進工業化。如民族性頑固不改，則工業化會得流產。八十年來新工業沒有成績，民族惰性是其一因。

上而我們只說了心理而不會說到智力。在心理方面農人比較正常，可以擔當領袖大任。但農人的智力似乎較差。公共衛生不講，醫藥設備不周。鄉村中的傳染疾病，如梅毒砂眼等等流行普遍。減低人口品質，並遺傳到後代而影響到兒童的智力發育。我雖不會做過測驗，但覺得

許多農人其IQ很低，幾乎近於白癡。恐怕有正常心理的人沒有正常智力。有正常智力的人沒有正常心理。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太不幸了。

第四篇 政治問題

一 放任政治

自從十七八世紀產業革命及繼之而法國人權革命以後，民主一名詞已被用慣，民主政治的風氣亦瀰漫全世界。但在二十世紀不到五十年內，已有兩次對於民主政治很兇猛很有力的挑戰。民主國家逼得不得不應付兩次保衛民主的世界大戰。雖然兩次皆戰勝了，而威脅民主政治的新專制政治，以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統制人民支配人民，而不依人民意志進退的新專制政治，依然未盡擴清。以可恥的暴力違反別民族自由意志而統治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作風，亦未消滅。世界未必就算已經在民主政治下安定。不獨正在學習民主的中國內部有許多問題要待安放。即民主先進國家的內部也有許多很深刻的批評與不滿，而這些國家的民主政制，從十九世紀到現在，其內容也大有變遷。要明白這一段過程，我們先得明白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性質及來源。

中古時代的歐洲政治，與中國專制時代之政治相同，是特權階級的政治。當時的社會是一個生產力固定，分配固定，道德關係固定的社會。國王貴族僧侶這一夥人享有特權是統治者，

而農民則爲被統治者。工商業尙未發達。財富之主要方式爲農田，而農田則在國王貴族僧侶手中。故政治權與經濟權連結在一起。產業革命以後，情形大變。財富的增殖，生產力之擴充，前途無限。並且發展的前途盡在商工礦方面。舊時憑藉土地財富以把握政權的特殊階級，其經濟基礎發生動搖。新興的資產階級憑藉其經濟的力量，漸漸來爭奪政權，而舊的沒落的貴族僧侶等階級則仍希望以固定的道德的特權來制裁他們，來抵抗他們。因而發生爭民權的運動。民權的最初爭執，是要使新的資產階級（當時他們尙是與人民一體的）在中世紀特權束縛中解放，而使各人能盡量追求其所欲。並要從中世紀的道德束縛中解放，而使人能不惜種種手段不負任何責任（除對自己負責以外）以追求其所欲。這種政治的精義以放任爲第一。

英國人稱爲近代民治之發源地。英國與法美兩國不同，其推行民治，未經過法美之大革命，但係推演而成。故其蟬嬪之迹，最足表示民權運動之真相。英國在 Elizabeth 朝，承科倫布發見新大陸及 Antwerp 衰落之後，紡織業及礦業日臻發達。而爲其媒介者則爲國外貿易之增加，股份公司之興起，存款銀行之萌芽及倫敦現代金融市場之逐步完備。棉布代羊毛而輸出，本國資本代意大利資本而興起。商業資本對生產事業非常注意，投機與中間商日增。當時「行會」之閉關政策猶嚴，個人生產之活動須受其限制。商人資本家不得不爲種種抗避之方法，或選擇無「行會」限制之城市，或投入「行會」而操縱其行政機構。使名義上自爲主人之工匠，實際成爲雇工。農業方面之變更尤鉅。有錢之農奴贖身購地而自營。畝利之貴族則出租

其采地。均以牧羊利益甚鉅，不顧一切而欲打破當時政府社會對於農地利用之限制。但當時政府及教會，囿於中世紀道德倫常之觀念，對於個人營利之事業，隨時隨地均施以阻礙。尤以圈地一事，破壞傳統土地制度，使多數農民失卻衣食生活的土地，為當時輿論所大不滿。新興之資本家，包括貴族商人與地主，雖無民權思想個人主義之薰陶，而事實所示，明知如欲充分發揮自己之欲望，惟有打破傳統的教育與政治之桎梏。新資本主義係從機械的而非道德的觀念出發，不負人與人間倫理關係之責任。與中世紀之思想制度絕難並立。其時皇室微弱，貴族各有私軍。議會即為貴族之集團。故查理一世被殺之後，英國政權即完全入於議會之手，成為近世民治制度之濫觴。其實當時英國議會乃係貴族政治。地主階級自由利用土地之主張，與商人階級自由貿易主張，互相標榜。卒令下院於一五九七年通過法案准許「將土地用作牧場使其休息」。以前官定物價，限制牙商，禁止放款收息等等辦法，或受當時經濟家之攻擊，或為事實所迫而不得不逐漸弛。一六〇五年下院宣言謂「土地遺傳，其自由經營之權亦同遺傳。自由民有自由選擇生計及居住地之權。商品最為重要財富，如限制於少數人手中，實係違反英國人民之天賦權利與自由。」在此宣言中，個人主義之自由，已屢屢為之保障。尤妙者，則向來傳統之天賦的遺傳權利，即限制個人活動範圍之本分，竟亦解釋成為天賦之自由。而一六四九年一月六日下院之決議，尤確定議院為政權之源泉。

新興的個人資本主義，要克復傳統道德倫常的限制，不得不奪取政權作工具。將依附在當

時政權下的道德倫常制度及觀念變更過來。因之新興資本主義的色彩，便在當時的政治思想上顯露出來。英國革命的哲學家Locke的理論，即注重於限制政府之權利。以爲政府之責任，惟有保護人民之財產自由。與中世紀政治思想之集權力於天子，責服從於人民者，完全異趨。查理一世政府之復古思想及以國家統制經濟之企圖，造成一六八八年之革命。結果英王僅成爲憲法上之元首，政治權移歸半爲資本家半爲商人半爲地主之貴族院。貴族本身既爲商人地主資本家，則對於非貴族之此等人物縱有若干芥蒂，亦必臭味相投。因之而商人資本家等漸漸蠶緣而入議院。世襲之議席可以公開出賣。市價早晚不同。在東西印度經營獲利之商人，以三千，四千甚至五千鎊之費，購買一席，以致Lord Chesterfield於一七六七年願以二千五百鎊購買一席而不得。一七七〇年Earl of Chatham慨然太息謂「毫無鄉土利益之人，將外國得來之黃金，撞進議會之門。大量之賄賂，非傳統之遺產所能抵抗。」一七八〇年Worcestershire等處議員三十六席，貴族共二十九席（計貴爵之子七席，男爵五席，地主十七席）新興資產階級七席（計商人製造家礦主五席，律師二席）。一七九〇年同地三十六席，貴族減至二十六席（計貴爵之子十二席，男爵四席，地主十席）新興資產階級十席（計商人等五席，銀行家二席，律師三席）。其中一名之履歷爲經營外匯猶太富商之子。隨經濟力量之澎漲，貴族政治，不得不逐漸開放，一八三二年卒准許中產階級得合法爲議員。一八六七及一八八四年復開放許工人階級得爲議員。至一九二四年選舉，Worcestershire等同地議席二十一席中，貴爵竟無

一人，僅有地主六人，商人銀行家律師等十人，工黨及其他五人。貴族政治之權力殆已全移於新興之資產階級及工人。

民治運動之目的，在於打破神權君權之限制，而解放政治道德經濟之桎梏，使一部分人得以暢所欲爲，充量謀自己之幸福。新興資產階級，挾其資財，與商工業之智識及技術，明白認識前途無窮之希望，自信有發展成功之把握，克復一切困難之勇氣。在經濟過程中，爲獨立沙場待戰之勇士，既不存依傍蔭庇之意，亦不負對人道德互助之責任。其當前只有勝利一念。任何阻礙，在所必排，任何困難，在所必克。只有自己才是有前程能進步的人。不甘於受世襲權利之限制，而充分發揮自尊自信之精神，故主張一切人類，應爲平等。不甘於受政治宗教之束縛，而欲充分追逐其經濟上之利益，故主張一切人類均應得自由。不甘於道德經濟之束縛，而欲充分追逐其經濟上之享用，故主張一切人類應得享樂。自由平等享樂，爲民權思想之中堅。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宣言，一七八九年八月法國大革命時之人權宣言，均充分闡發此意。（若以與法王路易十四一七六六年致國會之詞「朕卽國家……一切權力法律屬於朕躬」等語比觀，可見其不同。）如果歐洲當時之經濟情形，並不因科侖布之發見新大陸，而有飛騰之進步，當時之貴族不轉移其興趣於企業，當時無充分進取貪得之商業資本出現，則中世歐洲之道德政治經濟基礎，均不致發生根本上之動搖。而民權運動，卽不致發生。吾人當認識民權運動之發生，並非一純粹之政治運動。並非中世紀毫不理解政治之歐洲人，忽然發生政治之具

趣。政治本身僅爲執行某種目的之工具。科命布發見新大陸後之歐洲人，已經發生解除經濟束縛之要求，而政權運動，則爲此種整個經濟要求之一部分。

歷史家以爲歐美之民治運動爲奪取政權之運動，此語不甚切實。卽解釋爲新興資本主義奪取政權之運動，亦仍嫌過於籠統。以革命流血爲奪取政權之代價，非兒戲之事。新興資本主義之必須奪取政權，另有必不得已之條件。人類爲富於惰性之動物，除非環境之壓迫不能忍受，往往不肯發生爆裂之火燄。法國大革命前，經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世之暴政，人民痛心疾首，每次王駕賓天，百姓歡欣歌舞，縱酒暢樂，而屬望於新王之善政。屢年之失望均出之以容忍。眞如 Voltaire 所云，法國人對於統治法國八百年之王室，誠心愛護者。直至路易十六之季世，忍無可忍，始發生流血暴動之大革命。資產階級之民治運動，決非單純之企圖奪取政權。要認識十九世紀民治運動之眞意義，必須把握兩點：（一）爲自信強力不顧一切而求發展之個人主義的經濟力量；（二）爲逢着傳統經濟道德政治之或寬或緊的束縛。只有在此兩種條件下，才會發生民治運動。民治運動發生之方式，係依第二條件，卽傳統桎梏之寬嚴而生反動。英國之貴族政治能容納新經濟力量之轉變與擴充，故其民治運動緩而漸。法國之獨裁政制，美國之殖民地地位，均不能隨新經濟力量而伸縮，其中又參以一般被壓迫民衆之憤怒痛苦，故民治運動，採取革命之方式。但民治運動發生之主要動機，無不爲當時自信自尊之新興資產階級，企圖自由追逐經濟利益所造成。而革命期內小市民及勞動羣衆之參加，則僅爲一種爲其他環境所

造成之附加物。其本身在當時並無胡天胡帝追逐經濟利益之企圖，亦無新興資產階級之階級意識。其道德觀念無甯與之相反，而爲有限制的復古。故此等份子，在美法革命時，雖爲民治運動之支持分子，而不久即脫離剝落，另覓其自己之陣營。

所以十九世紀的民主政治，從政治含義說，乃是極端放任，極端自由，極少限制，極少干涉的政治。這是針對着中世紀種種干涉禁阻而發的政治意識。從這種政治含義說衆人之事，政府要管得最少。各人之事儘量讓各人自由。正如 Locke 所說政府之事，只在保護人民之財產與自由。換句話說，只要各人財產不受侵害，便可放任一切。這時候正是產業發展，發財機會無限的時候。代表新政治中心力量的議會便是新的財富力量的中心。所謂放任自由的十九世紀式民治，便是這種政治要求。其立憲政制與議會制度，便是充分減削君主權力，充分減少封建干涉，充分牽制政府而使人民得充分放任自由的政制。政治本是代衆人管事。衆人之事，不能衆人一自管，故要有少數人代管。理想政制應當有一標準，可使衆人有效參加政治表示意志，而使代管的少數人能有效執行衆人的意志。舊時專制政治，以少數人的意志統治多數，固然失去了政治意義。放任自由的民主政治，矯枉過正，使辦理政治的少數人不能有效做事。因此又發生了兩種矯正方法。一種承襲舊時專制政治的理想，仍使政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使其成爲領袖，依其意志驅率人民。這是極權政制。雖然他脫下了中古時代世襲特權的外套，甚至也借用一些民選憲法等民治幻裝，而其內容是專制的。另一種補救方法，就在民主政治本身

中發展。他企圖以更擴大的民衆爲基礎。用理性輿論鼓舞人民更積極表示意見參加政治，共同肩負公衆國家的大事。他不像放任政治一樣使人民來限制政府權力。反過來他要使人民了解政府應做的事，而積極自動幫助政府來做。這是平民世紀新民治的作風，還正在開始。

二 中國民治運動

中國之封建制度，及其世襲特權，不如歐洲中古之嚴格。但中國之歷史上，卻始終無民治運動，亦始終無民治思想。封建制度之形式，自秦併六國立郡縣以後，業已廢棄。孔子之時，尚有嚴格之名分及特權制度。曲縣繁縷，八佾舞庭，是不可假借的名分。孟子雖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語，但是告誡君主之意，而不是主張民治。自漢以來，以賢良方正舉士，唐宋以後，以考試選士，政權之執行，皆在此輩手中，除專制君主外未嘗有世襲政權之事。士之階級背景，雖未有分析統計，然以中國雖農業社會及重農輕商之傳統觀念推斷，可決定其必爲地主豪族。唐宋以來之以考試取士，雖一變魏晉六朝九品中正門第之習，因之政權有更公開之機會。但考試所取之士，所謂書香門第者，仍不出地主豪族之門。政權之更迭，無非在豪族地主間推移。實際負生產重任之農民，只是農奴。歷史上對於地主及佃戶之權利與義務，雖無紀錄。然觀於現存佃關係而推論，則佃戶與地主，與其視爲商業上平等地位之交易，如近代法上之租賃關係，無甯謂爲主人與奴隸關係之較爲近真。佃戶之對地主均視爲老爺。許多地方佃

戶每年有對地主無報酬服役若干日之義務。歷史上對於農民之逃亡遷徙，一向懸爲厲禁。近代土地調查，謂若干地方，佃戶對於土地之使用有「地面權」，而從某種意義上看來，此「地面權」者，毋寧是將農奴束縛於土地上之「地面義務」。井田制之公田，北朝之均田，唐之口分田，事實上均以強制耕作爲徭役。自耕農之成數，既非多數，而即屬自耕農雖無地主之徭役，亦仍不脫官府之徭役。其農奴之性質，並不變更，僅一重奴隸與雙重奴隸之別耳。且寄莊佃戶有時可藉田主之勢力而得若干保障，比自耕農「次奴隸」之地位，或反見佳。雖中國之田主，從未將莊戶酷待，如中古歐洲之役使奴隸。然莊戶之地位，從不與一般人平等，甚至不及向所賤視之商人。即農人自視，亦復如此。政權在豪族地主手中（有時君主專制有力則政權歸其獨裁）。豪族地主之利益，在於擁護此現存組織，現存制度。此種利益雖非對某一地主某一豪紳世襲，事實上往往亦可因襲若干世。而對於整個地主豪紳階級，則爲不容放鬆之特權，亦即天生蒸民之典則。有治人者，即是君子，有治於人者，即是小人（中國之小人頗近於歐洲 Lower Order，是一切貧窮之人，亦即一切罪惡之人）。君子有君子之本分，即爲保持祖宗成法。小人有小人之本分，即爲順時聽天，不許作亂犯上。封建制度一名詞，定義如何，容有爭執。但吾人如忽略諸侯采地等形式，而從當時特權階級以敬天法祖守成安分爲維護利益之方法與理由，以及與隸從階級之主奴關係看，則數千年來之中國，實從未脫離封建形態，而與民治政制下特權階級以自由競爭個人主義爲維護利益之方法與理由，及與隸從階級之契約關係，可謂全

異。國內頗有人以爲中國平民可爲天子，白手可取卿相，遂謂中國人已極平等。又有人以爲中國人不能團結，意志紛歧，遂謂中國人已極自由。此皆非民治運動中自由平等之真義。中國史上無呼籲自由平等享樂之民治運動，並非中國人已得自由平等，故不需要民治。反過來，正因爲中國人之經濟情形，始終未進步到十七八世紀歐洲之程度，亦始終未產生求自由求平等求享樂而以個人主義之自信力爲根基之資產階級，因之遂始終未發生民治運動。民治運動最主要條件未曾具備。以農村組織爲根基之中國社會，是一種道德社會。以社會爲一整個體，而不承認其中各分子之個性。在此種社會中，社會各分子有相互關係之道德義務。一方須敬天法祖，愛民惜物。他方須安分守己，順時聽天。社會雙方，均在一種道德律下支配，無個人活動之餘地。個人主義，自由競爭主義，只有自己貪得無厭的追求，而不負社會上一切傷害損壞之責任，甚至進一步而解釋舊事物關係的毀廢，與新事物關係的追求爲社會進步爲人類福利。此種思想，及以此種思想爲根據之民治運動，決非傳統的封建中國所能有。

T. Wood 謂十八世紀之英國人，爲不解政治之動物，此語正可爲一般中國人寫照。中國人之政治立場，爲「守分安己順時聽天」。此種態度，此種理想，此種政治組織，均與十七八世紀以前之歐美情形相類。中世紀歐洲，爲一道德社會，政治經濟均爲道德的附庸。教權盛於皇權，教會爲上天之代表，代神司人間之命，具有至高無上之權力。即在宗教改革以後，教皇之勢力減削，而各國之教會，仍與各國之政權連結，各國之君主，隱然兼神權政權於一身。

中國之天子亦爲一切天人權力之總彙。天之意志，經過天子以達於庶民。故一切權利屬於君主，一切服從屬於人民。服從爲對天之職責，亦爲對政權之職責。一五三〇年 Argsburg Conference 宣稱 All authority, government, law & order in the world have been created & established by God himself。而教會對於人類活動的規律，又以上意帝志爲依歸。當時人民僅有服從而無主權。比之後世「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則當時之社會，可稱爲「神有神治神享」之宇宙，而執政者則爲神之代理人。在此種制度下，各人有嚴格之活動範圍。君主代天而有一切權力與權利。貴族爲神之支裔，而有特殊一定之享用服御或權利財產。人民應耕種服役納稅。如爲當時社會秩序維繫之規條，所謂祖宗成法，卽是此種權利義務制度。所謂安分守己之「分」，卽是各人自己應分得之權利或義務。整個宇宙爲神之所有，神以其意志憑藉君主以分配於衆人。祖宗遵神之意志而行，今之後裔，自君主以至衆人，無非遵守此神之定分。晚至一七九〇年 Burke 尙稱英國人對於皇室之合法的世襲，「認爲正道而非錯誤，認爲有益而無可憾，認爲自由之保障而非奴性之象徵」。「一切繼承世襲，均自祖宗傳來」。「國君世襲其位，貴院世襲其職，下院及人民世襲其權利及自由，均自祖宗一脈而來」。「雖深謀遠慮所致，實爲遵從上天法則之美滿結果，天之聰明超乎謀慮之上」。此種思想與二千餘年前子思所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天明，遵聖法……」更無二致。「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時之民，只應秉執常性，遵從天定之法則與分配，

方合乎 Burke 所謂懿德。謂民而有主權，謂民而能治人，乃棄聖絕倫大逆不道之語。

傳統之中國，與十七八世紀以前之歐洲，均爲一分配社會。此時之政治經濟組織，及其背後之理想，無不注重於均富。當時之生產技術，生產力量，均固定而薄弱。以有限之財富，謀社會之生活，不能不注重於均平。中世歐洲，對於富之概念，不認其爲個人之資產，而認其爲對社會之責任。富人之富，應用之於社會福利，對於商業，對於放款取息，均認爲罪惡。此種倫理社會，與民治制度下之自由放任，各人可以儘量謀自己之利益，不負社會之責任，恰爲兩種極端。在注重分配之倫理社會，不得不有一執行分配而依附於天意之主宰，更不得不有一服從天意而接受本分之民衆。民權之思想，民治之組織，絕無發生之可能，亦絕無發生之必要。

中國近代民治運動之具體表現者，始見於孫先生等之提倡革命及戊戌康梁之變法。其間清廷之下詔立憲，開諮議會，後來之復辟洪憲諸役，五四以來之學生運動，表面上，均不無民治運動之關係，雖然有些只是打着民治運動的幌子。以前中國雖有歷次朝代更迭及農民騷動情事，但只是封建組織中主隸關係之轉變。不堪壓迫而反抗之農民，其根本意識仍是封建社會上下關係之道德意識。農民之反抗，係爲治者階級背反祖宗道德規律，暴斂，苛征，使其生活受威脅而起。與民治運動中新興資本階級之求個人經濟利益者完全不同。農民本身並無切待擴充發展之經濟利益。反之，其目的實在於維持或恢復向來上下關係之道德律。故其叛亂，往往擁戴一比較尊重道德律之領袖，所謂弔民伐罪，后來其蘇者，卽是此種事實願望之表現。故新勢

力一旦取舊勢力而代之，其本身即成爲復古運動之勢力，談不上民治，亦決無人想到民治。甲午以後之各種政治革命或改革運動，學生運動及各種工農運動，以其參加人數之普遍，實可謂爲具有民治運動之規模。然如上所云，民治運動，須有二條件：（一）爲個人主義之經濟利益；（二）爲特權階級之壓迫。若以此而論，則此種政治運動，亦祇可謂爲非民治運動。因爲種種運動中，均尋不出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之資本階級，亦尋不出傳統特權壓迫經濟利益之封建階級。反之，上述之種種運動，卻有一共通點，即爲間接的直接的對於外國侵略壓迫之反抗。康梁諸先生變法之動機，是以中國富強爲目的。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亦以民族主義冠首，民權主義實是比較後起的，並且是要待訓政下訓育出來的一「人造」的民權，與歐洲的民權運動又頗有不同。五四的學生運動，更直接是對外交涉的結果（只有從長辛店平漢路罷工起以後的歷次工農運動，可說是有經濟利益作背景，然而這些運動，是另外一種政治理論的產物，因而只是另外一種政治運動）。這種種以抗禦外侮爲前提的政治運動，是人人直覺感到需要的運動。張之洞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李鴻章之辦海軍辦船廠，義和拳之起事，各地戕教仇洋之案。一分析起來，只從這一個觀點出發，即是抗禦外侮。但此種運動，表示一點重要，即此時之中國人，已非不了解政治之動物。且更可注意者，康梁二先生之變法，公車舉子，羣起攻之，而滬粵鉅商，却多贊助。孫先生之革命，所得於僑商實業家之資助者更多。或因僑胞商人比較開通或愛國心切。但其間或有資產階級贊助民意之暗示，亦未可知。

中國之傳統的小農經營區域自足經濟，近年來漸受新興資本主義之侵蝕而破壞。若照歐美民治運動之過程看，新興之資產階級，應為民治運動之先鋒，而中國並無此現象。其故並非因為新興資產階級無貪婪追索經濟利益之欲望，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獨立自信個人主義之精神及力量。中國之新興民族資本，是在外國資本羽翼下孵出來的東西，是先進資本主義照自己模型捏塑的雛形。中國的傳統農業經濟，在海通以後近百年，已早被外國資本主義所分解而逐漸溶化。他本身早已在崩潰的過程中，沒有抗拒新興資本主義之力量。新興資本主義之最大障礙，並非傳統的封建勢力，而毋寧為其宗主的世界資本主義。因之民治運動中個人的平等自由享樂，而均失去了對象。代之而興的為國家地位之平等，民族之自決與建設。因之不是民權主義，而是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資本，其本身尚在幼稚時代，無抵抗世界資本主義之力量。因之新興資本，不得不依附在國家權力之下，藉國家民族之地位，以抵抗外來資本之侵略。近十年來，取消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保護民族資本之立法，及國內資源開發之努力，均以保護及製造民族資本為主眼。中國既無自力強盛可以脫離國家用個人力量打破一切障礙之資產階級，亦無以封建特權阻礙其進行之政權。故吾人可以斷言，中國歷史上無放任主義之民治，現在及將來亦不會有放任主義之民治。

現在中國民治呼聲甚高。但細分析來，這種民治呼聲，決不是十九世紀放任的民治，決不是要放任資產階級儘量擴充而掠奪。今日中國之呼喊民治，倒與法國平民大革命推翻路易十六

之情形有些相似。今日多數主張民主的鬪士，是三十餘年來國家號稱共和，而政府專斷干涉，人民太無保障，政府太無效率的反動。政府不能有效代衆人管事，又不能依衆人意思管事，反過來管理衆人，所以人民要起反感。所以這種意義的民治，主要是要求政府尊重人民，而不是要放任資本家儘量追逐經濟利益。中國民族資本迄今尙當不起工業建國的重任。假使中國的國家資本甚大，則中國也許會走上蘇聯計畫德國統制這條路。但事實上國家資本小得可憐。故雖有人夢想着國家統制也不會成功，而且更當不起人民不願政府多管而管不好的民主呼聲。假使中國私人資本已經甚大，則中國資本家也許要抄襲英美十九世紀放任經濟放任政治的老文章。但事實上中國私人資本一樣小得可憐，故唱不出完全放任的高調，而一方面反要拉住政府拉住國家代他們保護外國侵略。所以中國政治，既不會如蘇德式的蘇維埃與獨裁，也不會如十九世紀英美式的放任民治。中國工業建設有許多地方要靠外國資本。尤其注重英美資本。英美資本歷史上是與放的民治連繫的。所以民治世界的潮流，與中國國內向政府爭權的民治主張，恰好湊合。但論其本質卻絕不相同。中國如能建立新的民治政制，他決不會是完全放任的民治。所幸這種放任的民治，即在英美也已過去，而有新的改變。將來如何調整，使中國新的民治與世界民治趨向合符，我們留待後一些再說。

三 法治與經濟關係的轉變

談到民治即令人聯想及於法治。民治與法治有聯帶關係。民治國家之大本，在於憲法，人民之權利財產，有法律保障。國家權力有法律制裁。在二十世紀之西洋人眼中，沒有法律即沒有秩序。沒有秩序即財產家室幸福自由沒有保障，因而即係無法生活。法律為近代人名譽財產權利之所寄。猶之世襲特權為中世紀貴族財產權利之所寄一樣。中世紀時無財產特權之人，即為下流人 (Lower Order)，為窮人 (Poor)，為社會罪惡之淵藪，可以捉來罰做苦工。現代世界不守法律者為罪人，為破壞私產秩序之人，為社會盜賊，可以捉來依法處辦。

任何社會必有秩序，中國自非例外。中國亦有法律為維持社會秩序之工具。但卻不如西洋人之注重法律。孔子說「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一夥藉法律刑賞以維持相互生活的人，是一夥無恥的人。

大約十餘年前，收回領判權運動時候，某西報載一節通訊。大意謂有欠洋人債款而被控中國法庭者，法官以被告貧困可憐，諭原告准予寬宥。記者據是以為中國法院不能守法。貧窮可憐是一事。欠債償款是另一事。債務人不能以貧窮為減免債務的理由。在習慣以法律來維護產權的西洋人頭腦中，覺得以慈善的理由而寬法律的責任是枉法。

但中國人向來視法律為道德的附庸。在法律與道德解釋不同之時，總以道德為先。從聖經賢傳下至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功過格全是這種態度。中國人將罪過二字連稱。違犯法律的罪與違犯道德律的過不大分得清楚。這與英文中的 *Sin* 一字大致相當。外國稱人不法，則直稱不

法。而中國則稱爲無法無天。天是自然法則，是道德規律的代表。人之無法，是因爲其無天。中國社會是分配社會。儒家治道是感化主義。刑法之目的要人感化，在於糾正道德上的過，不是處分法律上的罪，更不是代人補償產權被侵害的損失。所以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倒有六種是人倫關係。只有後兩種才在近代法中構成犯罪的條件。舊律居喪聽樂及嫁娶杖八十至一百。從現代法意看來，真成笑話。但歷史上中國社會是全體主義的倫理社會。作亂背叛稱兵殺人是破壞社會秩序，不孝不義不順不遜居喪，或亦是破壞社會秩序。倫常關係，不是人與人間的私關係，而是社會的道德基礎，是政教秩序的根本。因此中國的法律處分，從道德上出來。「律之條目，無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無訟是中國人立法的根本原意。陳宏謀說中國人「以政防刑，而非以刑爲政」。很能道出根本。

在道德律支配的社會下，各人有道德的責任；道德責任亦即法律責任。在道德上富人當救恤貧人。所以窮人負債而法官勸諭原告寬宥，正是道德上，亦是法律上的合理裁判。民間小說中流行的清官如包龍圖正是中國社會典型的公斷人。在這種社會下，根本不用有詳細的法典。因爲判斷是非的大原則，自在人人心中。全部聖經賢傳，均可視爲法律。執法之時儘有原情從寬從嚴之可能，乃至有種種不打，輕打，憐不打，禁打，應打不打之戒（見明呂新吾刑戒）。而名宦賢宰亦以訟庭花落爲美談。中國社會只是人與人間家庭化的倫常關係，故用情理維持

着。西洋社會是人與人間工業化的機械關係，故用法律維持着。中國的法律，只是道德生活之一部分，或可說是最不和諧的一部分。西洋人保障人權財產的法治，正是中國人認爲「無復仁恩」的刑政。中西法律如此不同，因爲中西社會根本不同。

西洋之法治，與西洋之民治，同爲個人資本主義發展之副產物。個人資本主義打破中世紀人羣間之道德關係，個人經濟活動絕對自由。人與人間只有物的機械關係，不負道德責任。但「一方面人類行爲的可能性盡量擴大，他方面具有行爲能力的個人數目日增」，「個人的活動與衆人的活動隨在可以發生衝突」。因之「社會只得以法律限制個人，然後他人的自由行爲可以保障」（法學肄言，中譯本第五頁）。法律「是對於個人行動約束的最低限度……倒言之，除幾分約束，須用之以保障全體的自由，使之能與個人的自由並存外，個人行爲須被給予完全自由」（同書二十頁）。西洋社會先有一個以個人主義經濟發展爲前提的道德觀念。有流弊而後加以一些法律約束。中國社會以倫常爲道德觀念。有流弊而後加以一些法律約束。中國社會以倫常爲道德觀念。有流弊而後加以一些法律約束。不是中西法律不同，原是中西道德不同。法律之根本原則，在於主持直道。故法律淵源於道德，近代法家亦承認此說。法律所以濟道德之窮，中西亦是一樣。從西洋若干法律觀念的演進上，更可看出。

上面說過英文中 *quid* 之一字，亦是中世紀罪過不分的表示。當時的社會亦以道德律爲根基。放款取息，高價賣低價買，或因貨物損失，供給缺乏，抬高售價，均屬違法圖利。但自個人主義經濟發展以來，這種以道德律爲基礎的法律，漸逐爲機械關係的法律所代替。英國的屬

地，以農田改作牧場，起初是違法的。後來便以休養地方的名義容許了。存款給利，放債取息，起初亦是違法的，其後始則以所得利息作為善舉而容許，更因借出資本分潤所獲贏利而融通，最後則資本成為生產手段，而法律不得不承認利息之合法。中世紀分配社會，借款為了消費。故向窮人榨取利息為不道德。近代社會注目在生產。借款經營本為生利，無論借去作何用途，必減少出借人生利之機會。因此縱使使用該款而至虧折，亦屬咎由自取。出借人只要收息，其餘更無道德上之責任。或可說收息乃是道德上唯一應盡之責任。

物價之漲落，係因市上供需變動之故。高價出售，低價購進，非但合於個人利益，而高價刺激供給，限制消費。低價阻抑不利之生產，提高一般人之消費，亦可解釋為社會進步，經濟繁榮之自然法則。現代個人主義經濟理論無不從價格與供需關係出發。舊時社會以貨物買賣為人羣間互通有無的道德責任，今則解釋為客體的經濟社會機械的運用。既係機械關係，自無道德的責任可言。

從新舊法意的不同上，最可看出當時人對於政治意識的不同。十九世紀式的放任自由的民主主義，以最少干涉最大自由為政治含義。但中世紀及中國傳統政治，則以固定名分，固定的社會地位，固定的職業權利與義務，為政治上之天經地義。對於變更這些傳統名分與地位的行動與思想，一切在所禁阻。放任自由的民主政治以個人為出發點。除去一些最小限制以外，個人可以為所欲為。國家的責任就在保護個人並幫助個人去為所欲為。中世紀的傳統政制則相

反。他認定一個社會爲出發點。個人沒有個性。他只是爲了社會來犧牲的作料。在中世紀的社會裏，代表社會利益的便是特權階級與平民的隸屬關係，這是人人應當遵守的道德律。這種以整個社會爲出發點而埋沒個人的政治精神，與現代極權政制一樣。在現代極權制下，個人亦只是爲了社會來犧牲的作料。此時代表社會利益的便是抽象化的國家與英雄領袖。所以這兩種政制，非但其形式上俱爲專制獨裁，其精神上亦同爲犧牲個人以利全體。放任的民政政制與極權的獨裁政制，各有所偏，但亦各有其是。放任的民政政制，太重視了個人發展，有時妨礙到全體利益。極權的獨裁政制，太重視了全體利益（有時其利益是假的），又太忽視了個性發展。只有新的平民政治，以積極勸導理性與論示範等種種方式，鼓舞人民，使人民更自動參加全體應做的事情，比較最合理想。他使人民能自動參加全體利益，而又同時能發展其個性。社會的制裁也許要比放任政治更擴大些。但個性的發展一定也要更積極些而更富於高尚的意義。

中古歐洲與傳統中國一樣是農業社會。其生產力停滯無發展，所以社會秩序無變更。在此時代最大和諧的社會秩序是農人人人努力於農作。士農工商各安其職。不使有作亂犯上不孝不弟等等妨害秩序之事。我們以現代眼光認爲消極禁阻的政令，在當時正是最合宜的辦法。生產力既無餘裕，亦無特可發展之機會，自然用不到放任各人自由發展。因爲在生產停滯分配固定的社會，而放任自由，其結果是彼此互闕而動亂，不是各自分頭發展而開闢。放任政治打破了中世紀特權的束縛。使生產力開展，經濟進步。這是他的成績。但同時又發生了分配極度不公

平的壞現象。在中世紀時，雖然豪強佔奪田地，壓榨農民。但其社會中心道德規條，究竟仍以全體分配各守本分爲原則。產業革命後的放任政治，連原則上精神上多放棄了公平分配的道德觀。而代以個人無遮掩無拘束的發財主義。大資本家愈積愈大，社會財富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他們把握住資本，即是把握住生產事業，亦即把握住別人的飯碗生計。他們單獨的謀利，全不招呼到社會全體的需要。往往弄到經濟恐慌與失業。而放任政治下的政府，一切權力被剝奪，竟不能制止補救。所以發生反動。一方面有極權獨裁政制。從全體超然的立場，來制止人民單獨活動。一方面有改進的民主政治。使更廣大的人民，能自動參加全體福利的活動。同時交通與社會各方面的進步，使政治家能以整個國家爲個體來做有意識有目的之處理。使放任弛散的生產力向一個總目標進行。這是針對十九世紀式放任主義而來的新政治含義。政治制度的內容，與經濟需要，在每一時代無不相合。將來的中國政制，亦要與其經濟情形相合。

四 中國政制展望

Prof. Harold J. Laski 說：「一個用強力轉變的社會，從一種生活，過渡到另一種生活，一定爲事勢所迫而不承認自由爲社會生存之規律」（見所著 *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 p. 137）。中國在革命的過程中。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已高度發展之後，中國方圖急起直追。其經濟建設之途徑，其人民生活之規律，可想而知要強力轉變。因而自由放任的民治政制在中

國不會有前途。政治是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中國傳統無爲不擾的政制是一種工具，目的使人安分守己不犯上作亂。十九世紀的民治政制是一種工具，目的使人努力向各方面發展進取以謀財富之增殖。計畫統制的極權政制與二十世紀之新民主治政制另是一種工具，雖自動與被動不同，但均要使業已解放四散的生產力，依社會的意志集中高度發展。十九世紀民治政制既是解放生產力的政制，其前提自然是被束縛待解放之生產力。中國沒有這問題，中國生產力停滯薄弱，是資源未經開發，而不是特權勢力阻礙束縛。極權政制與新民主治政制既是集中生產力規範生產力的政制。其前提自然是業已解放四散奔馳彼此衝突的生產力。中國也沒有這問題。中國立國根基，四千年來，盡在農業。更沒有放逸奔馳的生產力要待集中規範。在中國生產力發展經過兩個階段。相當於此的政制，亦是兩個階段。生產力解放與十九世紀民治政制之自由放任相當。生產力集中高度化與全部的集權的政制之統制與計畫及輔導鼓勵人民自趨一致的新民主政治相當。其順序，其關係，均很清楚。中國不獨要將外國所走的（一）解放（二）集中兩階段併作一步走。中國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生產力。這裏有三個相連而不同的問題。對於現有的桎梏應當解放。對於停滯不進生產力應當提高。提高與解放全應當使每個中國人能積極自動參加。所以中國政制問題比別國複雜。

政制本是工具。從工具的眼光說來，計畫統制的極權政制，確是一個有效力的工具。但在這種政制下，人民完全是被動的。衆人的事不是依照衆人的意思去做，而只是依照獨裁者的意

思去做。不是政府代衆人做事，而是衆人代政府做事。誰也不能保證獨裁者不會計算錯誤，那就變成全國相率而錯誤。所以即使政府機構有權力能做事，也很危險，並且失去了政治代表衆人的本義。從中國農業社會的情形看，人民對政治太無興趣，即在獨裁制下鞭策驅遣，亦不會得發生積極參加的力量。而交通不便，統一未固，政府無效率，政令不切實，這些農業根基，更使獨裁政制不會得發生應得的效力。在農業社會中而勉強集權，結果只能造成歷史上的暴君而已。若要看將來工業化的情形，則極權政制對中國尤無前途。因為中國工業化要將中國文化一齊變過來。每個人的思想全要解放。而同時國際資本必要來參加投資。在這民治高潮下，國內人民解放的思想與國際資本帶來的思想全向民治一路走。所以極權政制在工業化的前途中，沒有地位。

如此說來，十九世紀放任的舊民治，與二十世紀獨裁集權的新專制，既然均無可能，則中國政制的出路，自然只有積極輔導人民自動參加政治經濟工作的新民主政治一種方式。中國的經濟出路要使全國人民個人能浸沉在工業化裏，被工業精神所同化。中國文化的種種方面，道德思想等等均要隨之變化。中國的政治制度即要一達成此種目的之制度，要使工業化能得到大衆積極自動參加。換句話，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如其能够工業化，中國人如其能够個人被工業精神所同化而改變其思想態度，包括其政治態度在內，則中國人要個個成爲積極自動參加工業建設的人。因而此時的政府，必然是一個積極輔導人民工業化邁進的民主政府。不獨世界

潮流向這方面走。中國本身的潮流亦往這方面走。

但是從農業社會舊的專制服從關係尚未全泯的中國現政制，要進步到將來人人積極參加政治，政府全依人民意志而又有權力做事的新政制，過渡期間，必須先具備若干基本條件。政權是推行政令的工具。但以中國傳統的政制，而推行工業化，非但不成爲工具，簡直是障礙物。中國是小農耕作自耕自給的社會。家庭是社會基層組織。全國四萬萬人當得有八九千萬家庭。家庭是生產分配的樞紐。要推行政令，要製造產業，要分配產權，不免要在八九千萬處着手。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直接推動八九千萬個細胞之理。那竟是毫無組織毫無着手地方。無可奈何，畫分地域，使成爲獨立小單位。因而發生離心力的危險。即不然也僅是鬆散的籠繫着。交通不便。指揮不統一。力量不集中。這樣便是基本條件不備。政府且不成爲政府。談不到生產與分配。縱有極高的政治理想也行不通。所以在政治方面，眼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基本條件具備的國家。分而言之，有三點問題。一是如何謀得強固的統一政府，消滅離心力的傾向。二是如何謀政府組織真能擔當「全能」的名義，切實做事。三是政府業已全能了。如何使其接受衆人的意志去做。如果不稱職，如何使人民有「權」可以和平撤換他。也就是說如何使人民意志能充分表達，並積極有效。這三個問題的根源，實在只是權能的分配安排問題。

歷代政制對於這個權能分配問題，始終不會有過滿意的解決。有些朝代，如兩晉，如漢末，如唐末，如民國初元，權與能盡分散在地方。中國成爲四分五裂割據的局面。中央政府空

擁名號，甚至名號也不足動人。國家不成爲國家。卽在表面上比較統一的時候，地方政府往往也有很大的權。地方自己有財政，有軍隊，有僚屬，乃至自己有外交。這種离心力的傾向，在中國歷史上非常強。一半因爲交通不便，消息遲緩，所以中央集權的指揮，事實上不可能。因之地方政府如要辦事，不能不有相當大的權力。全國統一這件事，是一個國家成爲國家的基本條件，我們還得最先努力。

地方權力過大造成割據局面。故自北宋以來的政制，只顧傾向於減削地方權力。地方官作爲中朝官臨時差遣。行省使司這些制度盡由此而出。文官與武官分治。督撫互相牽制。這許多防弊監督的制度，真發生了效力。每個地方官的權，削去不少。但同時他的能亦削去了。他成爲無權無能的官。動輒得咎。最好是不負責任不做事。有權的地方官，固能做壞事，但亦能做好事。兩漢地方官均自辟掾僚，久職不遷。吏治號稱隆盛。後代種種迴避防制的法度一周密。地方官便無事可做。壞事尙可偷偷摸摸做，正經事要層層轉呈准駁便無法可做。但地方權能雖削了，中央權能並未增加。交通不便，指揮不靈是事實。一時無法改進。所以結果地方與中央，大家無權無能，大家不能負責做事。以前的中國本以無爲而治爲目的。不做事尙無大礙，只要禁止百姓不亂就得。以後的政府，既是全能的，又是全責的。新中國建設的責任，多在他肩上。自然不能再因襲舊制的精神。這方面亦是要大大努力改革的。

如果政府能依人民意思辦事又辦得好，自然最理想。如果辦不好，又有了全權全能，霸佔

了非他辦下去不肯放，那怎麼辦？歷史上對此問題沒有好辦法。在春秋時代，貴族有相當勢力。權與能不盡在君主。秦雖統一六國，尚有集議之制，沿至兩漢。漢初宰相權位尚重，頗爲天子敬憚。宰本古君主臨祭宰牲之人，相爲相禮之人，均屬高職。以相權對待君權，雖不能說是權能分配之意，亦談不上尊重民意，但多少還有些制裁。漢武帝以後相權日輕。君主往往不願將國家大事與宰相商議，而偏令近臣洽辦。因之尙書，中書，祕書令，侍中，門下，翰林，內閣學士，雖無宰相之名，而迭掌宰相之權。這輩人，從其官名，可知最初原爲給筆札供奉差喚之人。大率前一代之侍奉書吏事實上成爲宰相，則下代又拋開，而另信用較疏的書吏。如光武用尙書，尙書成爲宰相。魏遂用中書，而將尙書出爲外朝事務官。甚至君主糊塗之極，只信任外戚宦官女流等等。所以二千年來中國政府的權與能沒有一個着實安頓處。人民的意見沒有一個妥當表達處。如其君主實在濫用權能太過，只有等人民自己起來流血革命。廢立之事，古代尙偶一有之，後代絕談不到。全能政府的權力，不小於古之君主。爲了避免濫用威權至於不得已而革命流血起見，二個代表民意，能夠代人民用和平方法執行裁判的機關，定少不得。憲政實施以後自然有議會擔任此項工作。問題不在有無此一機關，而在此機關能否切實執行民意，全能的政府能否服從。甚至吾們可以懷疑此種民意機關的決斷裁判，是否真是最明聽合理而最能增加國家利益。民意機關干涉太煩瑣，或不合理，則全能政府沒有權能而無法做事。如民意機關只在政府鼻息下做應聲蟲，完全沒有獨立的意見，又怕有別種流弊。所以人民的權與

政府的能如何安排，是吾們也得努力解決的難題。

這三個問題，很明白全從農業上來。交通不便，組織散漫，權能不得不分散在地方。又怕地方出亂子。不得不互相牽制，大家不做事。人民不能監督政府。又不能主張自己權利。因之有權能偏在的危險。要救過來，要交通便利，指導統一，民智提高，能監督政府。要辦到此，便要工業化。自從清末以來，政制的改革，曾引起最熱烈的犧牲，四五十年來，中國政治社會一直動盪不安。使最緊要的工業化，最緊要的根本建設，反而耽擱了。在野政黨雖可以主義與理想發動民衆。但上台以後，問題全非。平時倡導的理論，逢到實際環境的限制，無法推行。而平素對於實際問題，又爲理論所眩，沒有切實研究的機會，把握不住。從前以種種口舌攻擊當局者，現在自己成爲別人攻擊之具。所以任何人當政，卑之無甚高論，先不能不建立一個基本條件具備的統一國家與統一政府。要這樣便不能徒恃武力。不能不先發展交通，提高人民智識及其生活程度。然後指揮可以統一，組織可以緊湊，地方離心力自然消滅。不同的政治理想，可以各循和平的方式而謀握政權。中國政制可隨工業化而自然發展。過去政變的犧牲與工業化的頓挫，應當教會我們一課苦痛而寶貴的經驗。

但中國政制只是世界政制之一部份。若放眼一二百年以後，世界政制會有什麼變化？二十世紀之民治主義，若以與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自由放任之民治思想比觀，則實已逐漸變質。近代民治學說，已了然於經濟不平等一切不平等之原則。因而二十世紀之民治趨向，主張以社會

之收入養社會。表現於事實者，則爲國家對於稅收之分配及各種社會事業之舉辦，工業立法之發展及全體就業之安全計畫等。「國家非但以工業之自治爲目的，而干涉經濟界之各種活動，且經濟界之各種基本事業，如仍以營利爲目的，則與國家干涉之目的抵觸。因而近代民治思想，視社會爲一種機構。舊時契約自由之觀念已無地位。」(Prof. Harold J. Laski: Democracy: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V p. 83—4)。現代民治國家，已不再無條件承認十九世紀放縱自利之個人貪利主義。其精神上，雖然一方面仍承認個人發展之重要，但另一方面亦已承認社會爲一種機構而非各個不負相互責任的烏合之衆。他對於人民之福利，智識教育之進步，將積極的指導其活動，並予以種種助力。並且有意識的使全體人民能自動以整個國家爲一個單位而謀其集體的發展。而不是個人無限制的放任競爭。二十世紀的新民治主義，其內容既與從前不同，其形式亦必變更。如其封建極權可以說是代表新舊專制政治的形式，議會立憲可以說是代表放任政治形式，則新的集體民治必然將有另一種方式。新的政治內容正在發展中，所以新的政治形式亦正在發展中。議會政治似乎太保持了十九世紀放任的形式，不能完全符合集體發展的理想。現代的獨裁政治又似乎太注重了集權方面，而忽略了民治的意義。如何在民治與集體發展間求一中正妥帖之道，不獨是中國政制問題所係，亦是世界政治未全解決的問題。但其趨向已經是很白的。除非世界和平不能保持，聯合國組織重又失敗，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爭執重又掀起第三次武力統一世界的職爭。假使如此，則民主政治要讓給獨裁極權，民

族自決要讓給帝國主義，和平生產與公平分配要讓給軍備競爭與全體貧窮，理性要讓給野蠻，人類要讓給洪水猛獸，我們也不必再談下去。否則世界政制的大勢所趨是很明白的。他是以更廣大的民衆，真正全體民衆作基礎的民主政治。政府將時刻在民衆批評監督下，但亦時刻在民衆支撐擁護下施政。輿論要能够正確自由完全表示出來。理性的探討將使人民的意見漸漸求得一致。而政府根據一致民意所施行的政事，將有極大力量，受到全體人民的自動擁護。所以這個政府是完全民主的，但亦是非常有力的。這個政制是從全體利益出發的，但亦是鼓勵個人人格才能之充分發展的。在國際間他必將以和平正義理性求各國之並存與民族之自決。世界將在極大的民族差異下得到理性的統一。在國內他必將提高生產力以增加財富之總量。又將以租稅政策社會安全政策等設施求得分配之公平。這一切將以極廣大的民意作基礎。這是平民世紀的新民治，這是中國的路，亦是世界的路。

第五篇 國家

一 中國人的國家意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之夜，日軍在中國故都北平城外蘆溝橋起釁。大時代的烽火，從此燃燒起來。在五年以內，不單燒遍了神州禹域，燒遍了黃河黃海長江南蠻，燒透了歷史上積累的文化，並且燒着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燒乾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眼淚。使每一個中華兒女，無論在國內在國外，在天涯或海角，只有赤緊的憤怒與悲痛。這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對外全民族戰爭，這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對外民族意識的集體表現。中國的兒女，一向在壓抑煩悶的情緒下生活。他們不單像各國青年一樣，有個人的煩悶，他們主要的是國家的煩悶，與民族的煩悶。蘆溝橋的烽火使一百年來煩悶沉鬱的積愆得到爽快發洩的機會，得到以自己的血與淚來親手安排中國命運的機會，他們安得不慶幸？安得不驕傲？

誰能瞭解這一百年來中國兒女的煩悶，而順應他宣洩他，誰是東亞的主人。誰敢蔑視他而與他挑釁的，誰會逢着最堅決的抵抗。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是近百年來中國史的一個主動力，亦是近百年來世界史的一個大關鍵。

中華民族政治上雖屢受外族統治，但中華民族兒女，從未失卻自覺性，從未失卻其中華民族之意識。中國人始終自認為中國人，以別於外國人。近百年來的對外交涉，對外戰爭，處處失敗。每一次失敗，即在中華民族自覺的民族性上，增加一條創痕。一個民族，能夠在一百年內，累次並深深地蒙受這種煩惱鬱勃的民族情緒，而不至於發狂，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只要將凡賽爾和約到希特勒德國的瘋狂情形一比較，就覺得中華民族的兒女，經過四千年歷史的陶冶，還是比較太老成太耐氣了。

一位戰地通訊員——立波——在山西一個小鄉村——洪店子——住宿。屋主人是一個六十多歲白頭髮的老人。他保存了三十八年前——庚子——一個洋兵用小刀鏤刻名字的桌子。經過三十八年的磨洗，這西文名字還可以依稀辨出起首是個C字（見立波所著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八國聯軍之役，是中國北方農民反帝國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自然是很愚蠢而沒有近代意識的舉動。但是當時洋兵的暴酷，在三十八年的完全隔離與和平以後，還深深鐫刻在農民們心上，反映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們還記得德國兵在城外山上用水龍噴火油到城內，使羅馬的大火，在山西邊原上燃燒。野蠻的得意的嘲笑，與漫天烟火下妻兒的哀哭對照。昔日校場閱師的威武，與現在荒涼的歲月，一一還深鐫在老年人的腦中。並從他們的傳述中，普遍印入後一代中華兒女的腦中。復仇的女神，時時照臨他們。三十八年的隔離與和平，不曾使他們忘卻慘痛。人類不是和平的動物，根本也不曾從和平中得到生活。抱這樣意識的民族，還能夠更容忍

一次投降屈辱的恥辱嗎？

從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的中國史，是一部錯綜複雜的人類活動記錄。其間有對外戰爭與對內戰爭，有君主立憲，有民主革命，有共產，獨裁，有農民暴動。一個以故事為歷史的觀察家，感於這許多矛盾複雜的活動，會得迷惑尋不出頭緒來，或只能觀察到每個問題的因果關係，而把握不住整個歷史的中心關鍵。其實任何歷史，均只是羣衆意識的表現。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以迄中日日俄之戰，八國聯軍之戰，處處逢到對外交涉之失敗，與外國之侵略。故中國近代史中所表現之種種活動，不獨其對外的關係，即其對內的關係，亦處處為這種壓抑憤痛的民族心理尋找發洩結果。要明瞭中國近代歷史的整個性，只有從這一點上出發。

鴉片戰爭時，廣東民衆號召數萬人。這是中西交涉的第一幕。其時已經就發動了民族意識。嗣後各地仇洋戕教之案極多。到義和團之變而造極。以義和團之荒謬怪誕，尊孔衛道的一般士大夫豈有可以相信之理。然而當時竟會得造成如此巨變者，正因為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號召，正合於羣衆心理，亦正合於士大夫統治階級的心理。在數十年壓抑憤痛的民族意識，得到一個似乎可能的發洩機會時，像火山一樣的暴烈熱情，決不是理智考慮所能阻止的。在歐戰初了時，誰會相信希特勒墨索里尼之瘋狂政治，會成爲後日半個歐洲之主宰。然而歷史竟依着德國意國的羣衆心理走了。

義和團之變，是中國民族意識，忍無可忍的發洩。他不是統治階級自尊自大心理的表現，

而是一般農民，一般勞動羣衆，普遍的要求。美和團的挫敗，給予中華兒女以更深刻的民族羞恥。使他們向外噴烈的熱情，轉而向內。使他們感覺要對外抗戰，先要從內政改革入手。他們以熱烈的情緒要謀中國之富強。從康梁變法，到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北伐，到國共十年內戰，這數十年苦痛流血的過程，就只是被壓抑的民族意識向內發洩的結果。一切對外失敗的痛恨，歸咎於內政之不當，國家之不能富強。因之移對外之熱情怨恨而對內。要求改革一切制度，無論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或以爲君主制度是腐敗的總原因。或以爲階級統治是罪惡的總原因。有人主張改革兵制，改革教育，改革實業。亦有人主張改革思想，改革道德。有人主張公妻非孝。有人主張復古讀經。我們綜攬近百年來中國政治道德教育思想各方面之活動，覺得其動亂得利害。屢次對外戰爭，屢次內部革命，不單無數青年人肯拚擲頭顱灑熱血，卽最保守的縉紳階級亦往往是主戰最力的份子。不單是知識份子統治階級的人焦心苦慮要謀中國之富強，卽農民勞動大衆，亦會得揭竿而起，以抵抗外國的侵略。一次失敗，卽來二次。此處失敗，卽起他處。對外碰壁，卽轉而對內。營營蠢蠢，表現無量活力之盲撞。這是一個深厚的民族自覺，長時期內被憤痛羞恥壓抑而發洩的共通現象。在個人交往間，一個被抑制的深切熱望，會得使人瘋狂。在民族國家間，人人的深切熱望被抑制的民族，會將成爲瘋狂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不致於完全瘋狂者，還是因爲他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農業民族，還是因爲他二千餘年來傳統的和平的民族性。

康梁六君子戊戌變法的主張是『務農勤工惠商恤窮』，是要致中國於富強，是屢次對外失敗後要求內政改革的第一次呼聲。孫中山先生的興中會同盟會，其綱領是要求富國強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黨之出現，亦是對外交涉屢次失敗的結果。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雖然各不相謀，而從原因上說，竟可以說是一種運動之兩方面的發展，同樣是鬱勃的民族情緒之對內的爆發。這種鬱勃急切的情緒，非但是歷次變法革命發動的主要原因，並且也是歷次變法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他成爲決定中國歷史的主要原素。

民族的羞恥太深，民族的情緒太緊張，所以在任何一些星火的引導下，可以發生燎原的火燄。也因爲始終只是在忽遽緊張的情緒下，所以種種蠢動，往往顯得沒有深切考慮，甚至淺嘗皮毛，沒有了解一種運動的真義。機械的或割裂的模仿外國。舊的逐漸破壞，而新的卻雜湊起來，不成一貫的條理。一個美國式瑞士式的民主政治，一個德國式的軍隊訓練，一個舊道德哲學的新教育制度，一個大多數依舊是自耕自給的農村經濟社會，一個十六七世紀的封建自關的軍閥制度；這樣是一個雜湊的中國。並不是像許多外國人所說，中國人根本不夠維新。這是因爲中國人太急於維新了，中國人求民族富強的情緒太熱切了，所以弄成這急不暇擇的怪樣兒，也所以註定了歷次維新運動失敗的命運。

戊戌變法只有短短幾個月，而光緒變法的手諭多至百餘次。只是些空洞廣泛的原則，究竟要從何處入手做起，恐怕主持變法的康梁諸君，也不見得會有深切的認識，這可以從康梁諸君

以後的政治主張而推論的。這種情形，一方面表示革命的急切，與不瞭解改革的實際需要，同時惹起了反動的勢力，而有戊戌政變之失敗。戊戌變法，就失敗在空泛與急切的民族情緒上。

辛亥年武昌起義的革命，同樣被急切求功的民族情緒支配着。這次革命，在幾個月內，兵不血刃，而推翻數千年的專制政權，二百餘年的異族統治。這時的民族情緒多麼暢遂發洩，但是隨中華民國的誕生，革命軍馬上妥協，而造成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局面。改組以前的國民黨。是許多氣味不同的分子，在一個目標下鬆散的遇合。這個目標，就是以推翻滿清為富國強民的第一步。滿清已推翻了，革命已成功了，國民黨也散了。急於要求統一富強的民族意識打消了辛亥革命的一切努力。

從國共分裂以後，十年來的勦共與長征，這種慘痛的經驗與損失，可說是充分表示不妥協的精神。但是在九一八以後，外患的壓迫下，共產黨表示了聯合的希望。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變的結束，確定了國共一致抗日的基礎。同時福建的事變，兩廣的事變，均在外患緊張的關頭下和平解決。這樣，不妥協的政見到底在外患壓迫下調和彌縫起來。

這些歷史的事實，說明一個共通的原則。即是累次革命，與頻年政爭，抵不住一個前提，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真正動機，是民族鬱勃情緒的對內發洩。革命表面上的成功，使鬱勃的情緒已經得到發洩，即是革命已達目的。革命的志士，奪到政權，希望實現其「富國強兵」的幻想。革命的不良分子，達到目的，希望實現其名利權勢的夢想。同時民衆對於革命，也認為

已經成功，而希望其建設強有力統一的國家。在這時候時，不單革命失去領導，並且失去民衆的支持，革命黨人即使不願妥協，而要求繼續爲革命奮鬥。無如革命的前提已失，民衆也會得被國家意識所指示，而要求妥協，要求從團結統一下去建設新國家。國家意識自始至終，是一切問題的發動力，他匆匆製造了革命，也匆匆收束了革命。爲了民族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之故，革命只能在妥協下軟化，不能在不妥洽下硬撐。

（註）民族與國家原非一物，但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往往通用慣了，故本文亦不予嚴格分別。

二 國家意識之演進

常有人說中國人不愛國，沒有國家觀念。不愛國與沒有國家觀念是兩件事。沒有國家觀念是不覺得有國家。不愛國是知有國家而不愛，比不知國家更進一步。

普通以爲中國自古以來，環繞他的只是些文化低落的民族。沒有對手的國家彼此競爭。所以國家觀念不發達。這種解釋或許是對的。照此說則現在既有許多國家與中國對壘，中國人一定可以發生國家觀念而愛國了。但事實似乎不如此簡單。

中國史上有過許多國家對立的事實。春秋戰國南北朝便是如此。當時甲國人才投効乙國甚至反來侵略甲國是常有的事。他們並沒有因爲國家對立而發生祖國觀念。他們很清楚說「非但

君擇臣，臣亦擇君」。孔子孟子均周游列國求售。反看中古歐洲的時候，列國用人，亦有這種情形。也無所謂國家觀念。可知國與國的對立，不能作為國家觀念發達的前提。沒有國家對立也不能作為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的理由。

在農業社會的中國，生活之保障，生產之進行，是家庭組織之事。政府高高在上，無為而治。農民只有家庭觀念而無國家觀念，只知愛家而不知愛國是當然的事。至於士大夫們呢，他們自然要為政權出力。但農業社會的國家，只是一種無為而治的組織。他們對於這個空無所有的組織，自然不能寄託愛情。所以他們的愛國心，是用別種象徵來表示的。忠君是中國式的愛國之一種。以人為國家之象徵而寄與無窮的敬與愛。古人所講事君之道，諄諄款款，真是盡忠竭力。諸葛武侯的鞠躬盡瘁，岳武穆之精忠報國，還只是為了一姓朝廷。他們不能想到一個超乎君臣朝廷的抽象的國家組織。因為他們意識中親切的原只有家庭。而君臣朝廷的國，無非只是擴大的統治天下的家。在歷史上本是如此演化。治國的宰相，本是治家的冢宰。宮中府中，國事家事，早期朝廷就不大分別。朝中之臣本來是家中之僕，前清旗人在皇帝前自稱奴才，原是家庭方式的稱謂。做帝皇的人以及其臣民，無不以天下為一家基業。所以我們一定要將國家連稱。士大夫之效忠於君，猶之奴才效忠於主人。這是人的關係而不是物的關係。有時古人也能將君臣的關係擴大一些，而以社稷代表朝廷的繼續。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便是此意。杜工部的「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其國字的意義亦比君臣關係為廣。士

木之變，于忠肅立景帝，是社稷爲重君爲輕。但岳武穆的應詔回師，卻是重君命而犧牲民族勝利。雖然各人應變不同，但現代意義的國家意識，在古人中，從來沒有發生過。

最可注意的是外族入主易代之際的士大夫態度。作爲國家組織象徵的舊君舊朝廷已經消滅。士大夫愛國之心無處寄託，會得變爲擁護道統。道統是比國家更抽象更沒有象徵的觀念。若追問什麼是道統，原來就是禮義廉恥等等道德觀念與倫常組織。可知道統就是脫離偶像崇拜的理想社會組織，倒與國家的意義不很相遠而比較多一些理性教育的成分。當時人能夠忠於君主，忠於朝廷，忠於社稷，忠於道統，而想不到忠於國家，正因爲當時的社會，可以說是「家庭聯立」的社會，而不是國家統治的社會。

民族意識是人類本能。同種與外國人的分別，最早就有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近代國家觀念，則與近代國家俱生，近代國家建立於產業革命前後。生產力擴大超過國界。本在國內自給的經濟活動，迫得要擴充到國外去要市場要原料。其勢必與外國發生磨擦。商人企業家在國外活動時自然要有本國政府在背後支持。因此而有國際的磨擦。國家成爲擴充生產，增加幸福，保障人羣的新組織。自由平等是個人人才力發展的根基，要待國家保障。企業生產是個人財富增殖的手段，要待國家保障。殖民投資是向外發展的出路，更要待國家支持。在家庭經濟時代，一家是一個經濟單位。現在國際間一國成爲一個經濟單位。自然實際參加國際經濟競爭的只有少數人——商人拓殖家，軍人，大企業家，大金融家等。這些人最先將國家牽到競爭

的舞台上來。國家主義在他們心中先發芽。他們以愛國心鼓動着其餘國內和平而無直接利益的人。這是十九世紀的愛國思想。他反映着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的建國運動。但近代全體主義的國家思想則是強國對強國的生死相拚，他反映着統一世界的企圖。其背後是更大的生產力。既不局部利益的磨擦，也不能局部解決。殖民地的爭奪，不能以殖民地的移轉了結。原料市場的爭奪不能以原料市場的分配了結。讓步的妥協政策沒有止境。任何一方均以根本殲滅對方，完全消滅敵人的反抗力量為目的。在這種全體主義的國際競爭下。真正是全體人民生死以之。所以近代國家主義，不獨在國際競爭尖銳化時使用國家力量。在平時就以一國為一個單位而準備着鬭爭的姿態。國家成為神聖。國家主義成為宗教的信仰。愈變愈積極，成為支配人類活動的重要原素。

中國在梁任公的新民叢報時代本已介紹過十九世紀的愛國思想。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民族復興的意識已經進步得多。抗戰以來，隨着戰爭之深入持久而有「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口號。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公布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清楚提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鞏固民族生存應先於一切」。「國家民族之利益應高於一切，在國家民族之前，應犧牲一切私見私心私利私益，乃至犧牲個人之自由生命，亦非所恤。」接著就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國民一切之思想行動，均應絕對受國家民族軍事利益之支配。」「國家民族得要求國民為一切之犧牲。」救國的道德為「對國

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此種強有力的全體性的民族主義色彩，為以前所未有。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示，也一樣深切著明。中共六中全會指出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十五條，其第一條即為「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中共中央復稱中國「是中國人歷史上生息休養創造奮鬥的地方，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本來中國共產黨隨着蘇聯作風的轉變，早已傾向民族主義。其無產階級的口號早已轉變為「只有為着保衛祖國而戰，才能出全民族於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解放。」而尤其可注意的，是其中國式民族主義作風之傾向。毛澤東說要「把馬克斯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便要使馬克斯主義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他。作成爲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毛澤東論新階段。）共產黨機關報「解放」也大談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節廉恥，以爲是中國共產黨的道德。這大概是平漢路罷工，江西長征，海陸豐建蘇維埃時夢想不到的。

近代民族主義之傳佈需要物的條件，那就是工業生產，及伴隨工業生產而來之社會組織及交通制度。工業落後的國家，（蘇聯除外）遭逢時會誠然也可以掀起民族主義的狂潮，而建立近代式的民族主義國家，如基瑪爾之土耳其，畢蘇斯基之波蘭。然而根基不固，隨時可以倒坍。一個農業社會，要推廣民族主義，尤其在廣大地域如中國者，有種種困難。第一、農人散漫無組織無團結，其職業散布鄉村，又不適於組織團結。而近代民族主義則要在組織團結下才能滋長發榮。

第二、農業社會交通不便，消息隔膜，農人對於外界事物，往往不甚關心，亦很少接觸。因而民族主義之宣傳不容易推行，不容易發生效力。第三、農業社會往往教育不普及，農人固守宗法社會的舊道德觀念，和平柔順而不容易振奮激越。第四、近代民族主義之進展，在國際間必然引起磨擦。即使極狡滑靈敏的政治家，盡縱橫捭闔之能事，儘管在國際糾紛中利用時機，以恐嚇與欺詐來獲取利益，而終結仍不能不靠武力。全民動員，全民族戰爭的意義，無非以全國為大營壘，以全民為戰士，使一切適應民族戰爭之需要。而在現代戰備下，工業生產是必不可缺的條件。要工業生產能夠增加，戰備力量才能夠增加，對外交涉才敢於抬頭，民族主義的信心才能夠堅定，才能夠因為交涉勝利而增強。照現代中國的工業生產力量說，誠然談不到軍備自給。但民族主義之強化，不待工業生產與軍備擴張完全成功之後，而卻在其進程之中。工業生產與軍備增一分，民族主義即能強一分。此次蘆溝橋事變，中國會得奮起抵抗，未嘗不是近來國內力量比前充足之故。中國工業化前途，必有發展之望，但不是一蹴可幾。故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達到全體性高度，亦有待於工業化之逐步推進。

三 戰爭與和平

中國人素來是和平主義者。孫中山先生以和平奮圖救中國昭示後人。二十七年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亦以為抗日戰爭是為東亞和平，為世界和平的抗戰。並「鄭重聲明吾人之本願

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這種說法，以戰爭爲達到和平之手段，並不是宣傳，並不是曲解，而是中國人心中實實如此感覺的說法。中國人渴愛和平，只在砲火稍遠一些的地方，人民即刻會恢復和平秩序的生活。中國人的抗戰爲「應戰」。只爲向來和平秩序的生活，被日寇所威脅所破壞之故，才不得不起而自衛。自衛什麼？自衛其和平秩序之生活。因此在中國人說來，民族羞恥的報復，與和平生活的維持，同樣可貴。一是內心的和平。一爲物質的和平。是整個和平生活的兩面。爲維持物質關係的和平而屈服降順，增加民族羞恥與怨毒，在普通中國人心中不是和平完滿的生活，而是不和、不平的生活。同樣，爲了雪洗民族羞恥怨毒，而永久維持敵愾戰備的國家主義，使日常和平雍容的生活方式，變爲仇敵怨恨的人生關係，亦必是普通中國人所不樂意的生活。中國人向來主張中庸。依照中國人想法，最好能在兩極端中找個中道。在極端的國家主義新野蠻主義，與極端的文化生活和平退讓生活中間，尋個中道。要民族的光榮，與生活的和平，得個調和，得個平衡。

這個調和與平衡，當然不是輕易所能安排妥帖的。安排調和的責任，不能不望之於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與爲國家砥柱爲民意先驅的中層階級。中國知識份子中層階級民族意識之發生最早，民族情緒亦最熱。自九一八以來，智識份子與社會輿論，時時刻刻以屈服妥協責備政府，以抵抗作戰督勵政府。因此之故，燃着了抗戰的火燄，推動了抗戰的輪軸。但事勢與機會，均不曾容許我們將抗日戰爭的民族主義，預先深刻傳布到民衆中間去，預先有充分的組

織。使抗戰不得不以早熟的形態出現，使長期的抗戰備嘗許多不必要的損失與痛苦。使許多中華兒女會得心理上毫無準備而去做順民做漢奸。中層知識階級非但沒有將民衆宣傳好組織好，並且自己也沒有準備好。知識階級本身，即是意見最紛歧最無團結的雜湊。我們有了民族主義空頭的熱情與勇氣，而沒有得到民族主義的技術與方式，更沒有得到民族主義的紀律與服從。

與熱情幼稚相對的，我們更不得不致痛於知識份子中層階級敗北主義之多。大小漢奸，十之八九屬於智識份子中層階級，國家平日屬望之中堅份子。中華民族雖願和平，卻不甘於百年羞辱之上，輕輕再加降服的羞辱。抗戰雖爲政府決定之大計，而實有大多數人的民族情緒民族恥辱爲其後盾。何以許多一向具有革命政治經驗之人，亦會得盲目於羣衆的民族情緒，違反着百年來推進中國史的原動力民族怨恨而主張敗北，誠不可解。

如其瘋狂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生活，有可以調和並存之處，則以中國人之好中庸，儘可以在半民族主義與半文化生活中間，覓一平衡。但現代式的瘋狂民族主義，與和平文化，決不容並存。實行民族主義，則遵其反理智尙武力的政策，必然要破壞社會上優游閑雅的生活。而且必然要擾亂此種文化生活背後和平安閑的心境。要維持此種心境與生活，則必不能使其搢旗傘串跑龍套，爲不可知不可信不可捉摸之民族至上主義，而打架，而捧場，而吶喊，而拚命。兩者根本不相容，故中道折半之主義不能行。

如民族主義可以不用素養，可於一日一夜間造成，則中國可繼續其優游文物之生活，在外

患臨頭時，一號召而得十足之民族主義信徒。如人類之信仰行爲習慣如此善變，毫無挂礙，則中國之前途，自無問題。無如浸潤於文化生活之人，雖敵兵臨城，尚不忘臨寺講經。雖戰書星急，尚不忘後庭低唱。民族主義之敵愾民氣、要平時不斷的刺激與訓練，決不能臨時湊數。如此則中國前途之民族主義，又如何而可與其向來之和平文化相并存？

在理想上至少尚有一條路。近代國家主義之根基，是國家的光榮與偉大。但人類對於宗教信仰亦能發生偉大的愛與光榮的犧牲，其狂熱程度不比國家主義爲差。在無階級而真民治的國家間，能不能鼓起一種新的時代精神，以人羣的愛的力量來代替國家主義。以武裝準備爲世界和平的根基，而以扶良除暴爲世界戰爭的職志。使全體主義工業化的武備，民族自衛及國家觀念，可以與和平及理性並存不悖。許多和平主義者均不免有此想法與希望。事實上行得通行不通要看此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全體主義國家在平時即以戰爭的姿態存在。新的閃擊戰術又是無堅不摧不能消極防禦的戰術。如其對於國家平時生產力之發展，用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要於戰時臨時動員物質資源，臨時號召民衆，來作全體性的殲滅戰，不免吃虧。軍隊的訓練，軍器的生產，動員的完成，均需相當時期。而無情的閃擊戰則可以於數日數星期內消滅半個世界。鑒於法比英美等國在此次大戰的吃虧，這種臨時動員的辦法，太是危險。如此則任何國家不得不於平時就實行全體主義的戰備，將生產力的發展用在軍備而不用在人民幸福上。致多只能希望他們不以侵掠爲目的。但軍備的競爭沒有限制。列國並存，彼此擁有巨大武力日增不已而要

和平非戰事實上不可能。要和平只有全世界整個和平。

世界上沒有武裝的和平。要和平只有等人類理智充分發展，所有國家均放棄武裝，或世界統一以後。如果此次大戰，不能實現如此偉大的和平計畫，——則就中國說，尤其有一個危險階段。中國尙不會工業化，沒有全體主義國家的武備，而遭逢着世界性殲滅性的全體主義戰爭。結果世界和平不能建立，則放眼一二百年的將來，真可不寒而慄。世界殲滅戰爭要一天緊一天。二十世紀短短四十年內已經來了兩次。以後可能的更緊。戰爭的雙方均要完全消滅或完全制服對方。失敗的國家非滅亡則降為屬國，沒有自主可言。中國如不能於此次戰爭中得勝，並於戰後數十年乃至十數年之間，發動並完成初步的工業化，從此發動最低限度的全體性的民族主義，則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臨時，要比這次更手足無措，這是一個時間性極重要的問題。在討論中國文明、中國民族性及政制時候，我們覺得只要工業化，這些舊的不合時代的制度思想與文物，早晚會得消滅改變。我們沒有提出時間問題。如其世界戰爭不是一步緊迫我們一步，則我們在國內關了門緩緩工業化，也未嘗沒有好處。免得太忙太亂，諸多錯誤諸多犧牲。現在討論國家主義時，我們清楚看出緩緩改良是行不通了。新的國家主義要待工業化移植到中國來。但這不是緩緩的事情而是急迫的生死呼吸的事情。

這個時間早晚問題，在中國初變法時，便是一個焦惱的問題。康有為先生上光緒書中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其弟有溥先生與人書

則云「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但有爲先生以爲「列強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來得及。」結果戊戌政變九十八天完全失敗而中國至今尚未被瓜分。從今日以看戊戌，似乎大康先生估計錯誤了一些。從戊戌（西歷一八九八年）至今四十餘年，如其中國好好從工業化上立定脚跟做去，則中國在今日應當更可以擔當得起世界性的全體戰爭而無愧色。

四十餘年奄忽過去。誰能看得準以後是否更有四十餘年許我們從容建國。如其看不準，則「速變全變」這句話，在戊戌雖然太早，在今日或許正用得着。但戊戌之敗就敗在速變全變上。今日國民守舊的程度，反對革新的士大夫們，誠然均比戊戌差得多了。但農業社會的種種惰性，仍未消除。速變全變會不會得重蹈戊戌覆轍。即使不至於像戊戌之失敗，但能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我們已經屢屢說過社會各部門互相牽制，要進一齊進，要倒一齊倒。要速變就得一齊速。新的建設要速，舊的破壞亦要速。其中就有許多事實問題。工業建設資本籌集能不能速？人才訓練能不能速？農業改變能不能速？職業轉移，人口遷徙政治離心的力量，卑順寬弛的習性，一一要改變能不能速？

因此，種種問題，將我們迫到一個最後解答。從前中國的農業經濟背景，農業文化生活，農業組織的民族性，傳統的政治組織，全不適宜於眼前全體主義工業化的世界。要提高生產

力，提高政治效率，提高人民智識水準以應付這個世界，只有工業化，並且火速工業化。但工業化便有許多事實的限制。究竟能速不能速？能速到如何程度？世界情勢能不能相待？這些問題成爲一切問題的中心。我們必須解答。

第六篇 工業建設的可能性，速率與限度

一 爲什麼中國尙未工業化

本書目的只要說明：中國一切現狀由於農業化，一切改革要待工業化。時代精神有三點（一）生產力之發展與分配之趨向公平，（二）世界統一趨勢，（三）理智的發達。這三點全是工業文明的高度結晶。中國是傳統古老的小農自給經濟，其生產力停滯不進。貧弱雜湊的武力，知足消閑的文明，散漫和平孤獨自私的民族性，全從農業社會發生，有效的政治機構，神聖的國家主義，積極前進的人生，自力圖強的武備，全要待工業化而後建立。自然除了工業化以外，別方面也應當努力。但大致說來，一切傳統的劣根性與弱點，不適於現代競爭圖存之世界者，多數係從農業經濟而來，亦多數可隨工業化而得糾正。本書所要闡明的主旨，原已達到。至於工業建設的一切問題，係屬專門技術，非著者之學識所能妄談。但中國前途之一切，既然係於工業化，并且係於急速工業化，則中國究竟能不能工業化，能不能迅速工業化，迅速到如何程度，這些均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不能不談。

在本篇內，我們要討論下列這幾個問題：

(一) 爲什麼中國至今尙不會工業化？有什麼困難？這些以前阻礙中國迅速工業化的因子，對於將來工業化前途，是不是仍是阻礙？

(二) 中國工業建設的前途，資源，人力，資本，經驗等等條件能否容許中國工業化？能否迅速工業化？

(三) 國際形勢對於中國工業建設是否有利？

如其從這些討論而發覺中國工業建設，可以迅速推行，則中國的前途可以樂觀。舊社會舊文明的民族性。可以迅速改變，而新文明新社會可以迅速建立。如其不能，則非但工業建設無法推行。中國將長期或永久留在農業階段上，作爲別人野心爭霸的作料。中國人將長期或永久過一種悲慘屈服的生活。

這一章先討論中國爲什麼至今尙不會工業化。這一問題又有兩重意思。一是工業化爲什麼不在中國自動發生。這一問題比較遠。我們不談。二是工業化已在別國充分推行了，爲什麼中國跟不上，學不會？這是比較切近的問題。我們要討論。

爲什麼中國不會工業化，討論的人很多。有許多理由，實在是說明中國爲什麼不會自動發生工業革命的。譬如說，中國地理環境不適。西北大陸與游牧民族爲鄰。東南雖沿海而無大的國家交易。國內無南北流的天然河流，致南北交通不便等等，這些理由以之說明中國沒有自發的工業革命，可以成爲一說。但不能以之說明爲什麼中國通海以來，受到世界工業革命的影響

已經百年，而仍舊沒有工業化。德國重要諸邦的工商業與交通在十九世紀中葉，也還不曾十分發展，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一八六八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於一八七一年。與李鴻章張之洞諸位創設輪船機器製造紡織工業約略相距不遠。蘇聯的工業化，更只是最近十餘年的事。爲什麼別國工業化有很大的成就，而中國仍舊不曾工業化？

我們要答復這一問題，不用抽象的遠溯及地理環境，重農政策，科舉制度，技術落後，諸子繼承制度等等。我們只須簡單的將問題換一個說法。我們問中國一百年來的工業建設，有什麼特別困難？這樣，答案就迫我們搜尋事實。究竟過去的中國工業建設的特別困難在那裏。這即是中國爲什麼尙未工業化的答案。

一般說來，中國工業過去吃虧的地方約有幾點：（一）是資本不夠，（二）是管理不當，（三）工人技術太差，（四）是洋貨的競爭，（五）是社會政治秩序不安定。其中第四點是外來的力量，其餘四點全是農業社會本身內在的阻礙。小農耕作自給制度，薄弱停滯的生產力，維持低度生活尙且不敷，自然很難積蓄資本。而資本是工業建設的第一前提。勉強建設的少數工業，亦因爲資本不充足而難於發展。農人的訓練與工業不侔。其寬弛散漫的習性亦與工業工作不合。農業社會的家庭經濟制度，其親親仁民的道德觀念，缺乏責任效率進取奮鬥的精神。對於工廠的管理，工業的發達，均有不良影響。而一個生活壓迫到不能喘息的農業社會，隨時隨地層層苛捐重稅，常常內亂災變，更使工業生產無法順利進行。市場狹小，購買力缺乏，新的工業產

品，只有排擠舊的手工產品；但舊的產業破壞，即係一部分生產力與購買力之減少。所以的農業社會的種種條件均與工業化對立。農業社會要待工業化方能改變，但農業社會本身是工業化的阻力。再於其上加以帝國主義的侵略，關稅的束縛，條約的束縛，自使新工業更難發展。

但這些只是一般的困難。我們還沒有追究到問題的根本特點。在沒有工業化以前，德日蘇等國也是農業國。工人技術之差，管理能力之缺乏，企業經驗之不足，均為一般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之通常困難。均不足為中國還不會工業化的特別理由。我覺得中國工業化特別遲緩困難的理由有三點：（一）是資本蓄積，特別困難。中國每一農家之農業資本據 Dr. J.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1931. Chap. III) 的調查，平均只一，三七四元。較之美國之平均每農家資本一〇，七七四元（依一九二三元折算），約僅八分之一。此一，三七四元之分配，土地投資百分之七七·七。農舍百分之二四·一。牲畜百分之三·七。農具百分之二·六。雜項百分之一·九。自身流動資本尚且無着，安有餘資發展工業？工業是維持最低生活以上的餘閑發展。人人救死不暇，更何有資本積蓄。我雖然沒有確切資料，可以比較德日蘇等國工業化以前資本蓄積的難易，比中國如何。但中國生產力之僅够或甚至不够生活，以致資本不能蓄積，卻是中國工業化不能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我們打算另闢一章來討論資本問題。這裏暫不談。（二）是所謂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個後進國家要建立工業，與先進國工業競爭，至少在初期，不能不有國家的保護。德國是保護政策的首倡者。日本在東亞範圍內是個先

進國。在世界市場上他靠着歐戰的保護而發展。蘇聯在計劃經濟下更享着長時期孤立，可以在國內埋頭苦幹而沒有外國進口商品或資本之競爭。這三國所享到的保護與機會，中國均沒有。在世界工業市場上，中國之出頭，幾乎遲了一百年。門戶開放。毫無保護。甚至外國進口貨及外國在華工廠，比本國工業更爲優待。這就無怪中國工業建設要有大困難。但這一問題已有許多專書討論。不久亦將成爲過去。抗戰以來，中國國際地位，已經提高得多。抗戰勝利，不平等條約取消。所以從將來工業建設上看，這個問題，在以前雖然重要，在以後卻將消滅。合理的保護獎勵政策，以後當不至再有阻礙。故這裏亦可無須多談。(三)是中國廣大的農業社會與一統的國家政教對於中國工業化特有的阻礙。這一點注意的人很少，我們可以多說幾句。德日的疆域人口比之中國均不過大些的一省。中國有二十二省。風氣的開發，事業的推動，發軔於少數先知先覺的努力，而收果於多數人風雲景從，潛移默化。地域愈廣，人民愈多，則引導與同化均愈難。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數目比例。同化二十二省的中國，比同化一省大小的德日，并不是二十二倍困難。比二十二倍更要多。有一萬個先知先覺，一省大小的國家裏，或者很可以創造一種風氣。若在二十二省大小的國家裏，或許反過來，對一萬個先知先覺包圍消滅了。

中國一向是統一國家。在妨礙工業化時，就發揮了統一的力量。在雅片戰爭以前，廣東的對外貿易，雖爲十三行獨占，亦已相當發達。本來從秦漢以來，廣州幾乎永久是東亞第一商港。假使廣東是一個獨立國，其政制道德思想，從趙佗至今，與中國不同。則雅片戰爭以來的

國際貿易，恐怕早已將廣東工業化了。不幸其時中國正是乾嘉以來鼎盛一統的時候。自明代中葉開倭寇以後，中國一向嚴守閉關政策。從中朝從北方一層一層向廣東及沿海地方築閉關之壁壘。廣東官是中朝的官。廣東的政教規律，是中朝農業社會的政教規律。在徐廣縉葉名琛這幾位守舊政令之下，要發展的廣東人只能跑到國外去殖民，而不能在本地建設資本生產的工業。

將廣東與日本比極有興趣。在 Commodore Perry 的艦隊逼日本通商以前，日本曾過着三百五十年閉關生活。只有長薩等藩經營國際貿易。也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廣州的商港。但門戶開放以後，國際貿易利益迅速增加。超過德川幕府的財政收入。一共小小一個島國，貿易經營所給予人們的機會，利益及刺激，發展的可能與潛力，當時人人親見親聞。一時島國上，風起雲湧，貿易經營的先聲布滿了各地，轉移了人心。不用有人特別提倡，而人人自然同化。從此一步一步從商業資本轉移而為工業資本。不到一百年，成爲一個工業國。

返觀廣東，儘管歷史上貿易重要，勝於日本，而開關以後，並沒有迅速進步，因爲少數廣東人雖然親身受了國際貿易的刺激，而中朝政策，卻仍以爲紅毛國進貢。佛郎機火炮，是夷人譁張爲幻。一貫的用傳統政教勢力來阻遏他。這不能怪中朝頑固。貿易經營的風聲，可以一刻同時吹遍日本。卻不能同時吹到長城的每個角落。這種通商貿易所傳來的刺激，多數中國人未見未聞。全不感覺。或者得之傳聞以濟東野語的神話心理對付他。百聞不如一見。新勞力新思

想從通商口岸傳入內地，愈遠愈間接，愈薄弱愈不親切。正因為中國廣大，多數人不能直接親自感覺到新工業化的力量，不能自動轉變。要待先知先覺用思想文字來鼓吹宣傳，根本落了第二乘，不能親切入扣。所以新工業化在中國傳播困難，更要處處遭逢挫折。

一社會之改革，主要的是發動力量所能造成的風氣。風氣轉變，羣衆心理隨而附和，改革運動就能得到雄厚的潛力，可以迅速傳佈。舊制度舊思想迅速破壞改變。地域大而又加以統一政教的阻遏，則舊的思想制度，有多數人的力量支持，堅守不讓。而新的風氣，即無由造成。過於熱心發動的新思想新事物，處處被舊的傳統所打擊。不獨康梁諸先生之變法，歷次革命，李鴻章諸位之工廠船局，全似北冰洋內，丟下的花子。只有水面的波動而不能生根發芽。社會的動亂崩析，亦更阻礙了新工業化之迅速進行。

世界各國無不受工業革命的影響。但新舊衝突之甚，無論德日蘇聯，均沒有中國這樣持久，廣大，而頑固。這正是說明中國舊勢力靠着地域遼闊，交通不使所生的隔閡，與農業社會政教一統的勢力，對新工業化抵抗了一百年。到現在，傳統的社會已是處處營壘破碎，潰不成軍。謝謝抗戰將工業化打到了西南西北的邊綫上。舊勢力的抵抗，日漸消滅。一百年前通商貿易勢力所不能達到的邊僻地方，全成了工業化的領域。所以這最後一個阻礙工業化迅速發展的原因，也已不再存在。

以後的中國是工業化的中國，只要自己不大走錯。

二 資本

現代工業之主要現象，即為大量資本之使用。任何生產組織，均為一部分資本與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工等等之配合。資本為生產之原動力。擴大資本以後，各方面均隨之而有影響。第一資本與勞工之關係必須改變。勞力之生產量及生產效率均將提高。工作效率，速度與紀律，均不得不適應機器之需要。工人之階級意識亦將增加。貨物大量增加，刺激新的需要，開拓新的市場，隨而發生新的金融商業運輸方式。同時舊的手工機械與勞動人口，被機器生產所排擠，而致於廢棄。人口將被新工業所吸收。社會收入分配改動，新的財富與新的貧困發生，使政治社會各方面均將發生重大影響。非但商業組織與習慣，人口之遷徙，新舊市場之交替，必然發生。乃至教育思想，政治制度，家庭關係，社會組織，道德宗教哲學均不得不隨而改變。而資本實為其發動力。因為資本之使用擴充，而生產要素之組織配合變更。因生產要素之組織配合變更，而後一切社會政治組織變更。

故在未會討論本題之先，不得不將資本一名詞，正確說明。本章所用資本一名，係指物的資本，即用以再生產的實物而言。故機器，工具，廠房，大而言之，至於鐵路，汽車，船塢，船隻，堆棧，庫倉，其他實物設備及原料，凡作為再生產之用度者，均可視為資本。商業界甚至經濟學界常有將資本一名詞作為資金解釋者。從商業眼光言，有資金而後可以購買實質資本

物，作擴充生產之用，故以資金爲資本乃自然之事。但同詞混淆，往往使思想與政策，均難清楚。本文之目的，注重在實物之生產。故資本一名詞在本文中只作爲實物講。而對於投資用之貨幣則稱爲資金，以示分別。

● 中國有資本若干？如何積聚而來？均不能簡單答復。第一統計資料缺乏。第二資本既解釋爲生產用之實質物料與設備，而物料設備如此繁頤，無法可以總加而得答數。一條鐵路與一具機器相加，不成話。因此，各種資本物之增減不能比較。譬如鐵路增加十公里與動力減少一百瓦特，究竟總資本是淨增或淨減，無法可說。只有將其化作共同貨幣單位後，方可比較。如云鐵路資本增十萬元，動力資本減二十萬元。但化作貨幣單位之資本，即受貨幣價值及物價變遷之影響。仍非極妥當之辦法。第三新式資本與舊式資本中間無明確之界限。鐵路及其路基以及公路舊式阡陌，其效用相同，不能嚴格分別。而生產與非生產之性質，事實上亦極難分別。例如農人房屋，用作住宿亦用作倉庫，如何分別。以此類推，農場，牛，馬，手工業器具，作場，公路，民船，等等，四千年來爲中國人生息衣食之具，當然應爲資本。如此則非但估計數目更爲龐大而難於着手；且從本文之觀點言，亦屬不妥。因舊式生產工具，在中國工業化之過程中，比之近代機械資本，其重要性必日趨減少。如根據過去舊式資本之蓄積，而推測中國將來新資本之蓄積，既不合理，亦易錯誤。舊資本在過去曾爲中國文明發揚之基礎，其總數之偉大，亦無可疑。其在新工業化之初期，亦必然保持重要之地位。但吾人之目的，在於推進新工

業化。故本章之注意點，亦以新的生產資本為重。

用貨幣單位表示產業資本之多寡，有不妥之處，已如上述。但既欲化成總數相比，除此更無別法。以後不得不用貨幣數目表示資本。吾曾初步估計中國全國在此次抗戰以前共有之新式產業資本總數，其中包括本國人資本及外國人投資在內。分析列舉。可得下列各數：

	本國資本	外國資本	共 計
製造工業	六七·六	一、〇七六·七	一、七〇四·五 <small>國幣百萬元為單位</small>
公用事業	—	二七七·七	二七七·七
礦 業	四·三	八八·〇	一三三·三
運輸業	三五·二	一、三七八·一	一、六九三·三
共 計	九七·三	二、八二〇·五	五、八〇七·八

據此，吾人可得數點意見。

(一) 新式產業資本，在中國整個生產事業中之地位，實太微弱。中國之國富雖小，總應在二千萬萬元左右。因為中國國民收益，每年約為二百二十至三百七十億，則以八厘年息折合，應有生產之資本報酬連人工二千八百七十五至四千六百二十五億，即折半除去人工報酬新式產業資本，尚只國富總額百分之二。

(二) 在新式產業資本中，外國資本之重要性顯然。代表現代資本之股票債券，可以隨時移轉。故分別中外資金，難以辦到——亦難以準確。但估計雖粗疏，而製造工業與礦業中，外國資本均比本國資本為鉅。運輸業中之外國資本更鉅。新產業資本，共僅三十八萬萬零七百八十萬元。而外國資本卻佔二十八萬萬二千零五十萬元，合百分之七三·八。本國資本僅九萬萬八千七百三十萬元，合百分之二六·二。其比數約為三與一之比。

(三) 中國每人攤得新產業資本額之微。本國新式產業資本僅九萬萬八千七百萬元。以人口四萬萬攤計，每人僅得二元四角七分。美國一九三〇商業衰疲之年，其製造工業一項。資本額尚達五百二十六萬萬九千五百萬美元。人口一二二，七七五，〇〇〇。每一美國人合攤美金四百三十元。以美金三十元合國幣百元計，即每人得國幣一千四百三十三元。比之平均每一中國人所有之產業資本總額，高出六百倍。

(四) 中國新產業資本微不足道，即係表示中國用作生產之資本物微不足道。故生產量與生產效率均受其限制。劉大鈞先生曾計算每人每年消費工業產品的價值，其數如下：

中國	二·五〇元
美國	三三四美金
英國	七五·八鎊
蘇俄	二八七盧布

日本

三四七日圓

讀者如反躬自省，此數（二元半）能足敷一年一人之用否？現代工業式生產之利益，縱有多端，利害見解，亦不盡同，但大量生產與合理化均為現代工業生產之利益。故產業資本必須集中，其組織必不能過小。劉先生又調查上海十二個主要工業之平均資本。發見除鐵路及少數特殊之製造，開礦，造船業外，平均每廠資本——以貨幣計——多數在一萬元至五萬元之間。故生產之規模極小，幾不合於經濟生產之原則，而不得不對於勞工極為苛刻，以期減輕成本。

（五）中國新式產業資本在農業中幾全無足稱。此又為一特殊重要之點。因為中國仍為農業國，百分之八十之人口，仍從事農業。將來中國工礦業之新式資本，無論如何發達，如其農業資本，仍如現在之落後，則中國之工業化，即難得滿意之發展。農人除居屋及極原始之工具外，無資本可稱。即富農亦僅稍多力畜。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 D. H. B. C. 調查七省十七處二，八六六農場之結果，每一農家平均有房屋值二一八·七六元，力畜五八·九四元，工具設備四五·三三元。上表列舉中國近代產業資本，其中竟無農業之新式資本。

中國雖有新式產業資本三，八〇七，八〇〇，〇〇〇元，但此項資本，並非均能生產機械工具等等，作為擴大生產之用。運輸，公用事業，及大部份工礦製造業之投資，均係為製造消費品（例如棉紗麵粉）及直接服務之用。其產品並不能加增中國之產業資本數量。故不能作為工業化擴大再生產之用。要擴大再生產必須要有資本物之增加，如機器，工具，設備等等。故

此等資本之數量，在本章內，尤爲重要。不幸在總數三、八〇七，八〇〇，〇〇〇元新產業資本內，本國產業之生產資本物者，連價值七，一一〇，〇〇〇之兩個國立鋼鐵廠在內，仍只有四〇，九二二，八九九元。新產業資本總額。本已微不足道。而機械工業之資本尙只及其百分之一。且均爲極小之機器工場。主要只是修理零件，而不是製造機器。每廠平均資本僅約十二萬七千元。製造機器及零件之廠家一四四家，僅有資本七，〇五八，七二一元。其中國立者兩家，佔四，三〇七，九一五元。其餘一四二家，共得資本三，七五〇，八〇六元。每家平均二六，四一四元。劉大鈞先生調查上海十二個主要工業之平均動力數量。大多數廠家均少於一百馬力。每一工人平均分配尙不及半匹馬力。故從機器及從動力方面說，中國之產業資本，實屬極微。如要靠現在之機械工業，供給中國工業化所需之大量機械與工具，幾屬可笑。此等小工廠每年營業所入，連零星修配在內，在一九三三年，只有四三，八一九，六二一元。只及中國全體新式產業資本總額百分之一稍強。恐以之補充現存資本物之消耗與折舊，尙嫌不足。美國一九二九年全年所產資本物總值一四，四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以國幣一元合美金三角三分計，合國幣四三，三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五年爲五，九九九，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合國幣一七，九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如將折舊與消耗不計，則每一中國人，每年可增殖資本國幣一角，而每一美國人，在一九二九年，可增殖約國幣三五二元（註）

中國工業化所需之資本物，向來均仗國外進口。中國自身既不製造重要機件，故進口機件

之數，約略可代表中國產業資本陸續累積之過程。吾曾根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進口機件價值計算其每年累積率。機件之消耗頗遲，在此短短二十七年之中尚不至完全消耗。故吾將進口機件價值，累積計算，而得現在之機件價值總數。為減少匯價漲落之影響計，一律化為英鎊。但英鎊之匯價本身亦有漲落。機器售價，亦有漲落。且一九三二年以前，進口數係連東三省在內，以後則否。故其數亦并非十分準確。計其增殖之率，從一九一二年之六四二，九一一鎊，達一九三八年之一三〇，六一一，六五四鎊，二十七年中約增二〇三倍。以直綫趨勢表示每年增殖率之公式為：

$$y = 69,001.547.1 + 5,518,969.3x$$

即每年增殖五，五一八，九六九鎊。

此項增殖之數，係連中外資本均在內。中外資本之分配前經估計為三與一之比。故本國資本之增殖率，每年約為一，八三九，六五六鎊。以人口四萬萬五千萬計，每人每年增殖百分之一鎊。此係連外人投資計算在內。如只算本國資本，則每年約增殖千分之四鎊。照戰前匯價，每人每年約增殖國幣六分。

用別種方法亦可得到別種中國產業資本增殖率之估計。

紗廠為中國新產業資本最重要亦最有成就之一業，其統計數字，比較完全。中國紗廠創立歷史比英日在華紗廠為早。若以一九一三年為基年，迨至一九三五年，華廠紗錠從一〇〇增至

四六一·六五，日廠至九七八·七四，英廠至二三九·〇三，共計爲五六二三五。二十三年之內，增加五倍六。而外國在華資本比本國資本增殖尤速。

在過去八十年內，中國逐漸向工業化進行，其環境并不佳良。革命，戰爭，內憂，外患，苛捐，雜稅，農村之解體，舊文化之崩潰，人民購買力之減低均使工業建設困難。如當時新式產業能在和平良好之環境下發展，人民之信用與購買力均能加增，則新式產業資本之增殖，定可較速。但優良之環境，適於本國資本發展者，亦適於外國在華資本。故中外資本之分配，未必定有重大變更也。

同時，戰爭與侵略，繼續不斷，使資本從中喪失。此次中日戰爭，對於全國三，八〇七，八〇〇，〇〇〇元之新產業資本，破壞必多。戰爭確已結束，詳盡之損失估計，尚非其時。一部份資本，業經內遷，一部份幸得保存，其餘則告損失。但同時後方各地建設猛晉。鐵路公路一而拆除，一而新建。新動力來源，新礦山，均予開發。汽車進口數萬輛。新工廠亦陸續設立。其影響尙待時日證明。但其總數終不能抵過破壞之數。故將來之中國工業建設，其起腳點，不獨須比戰前之資本蓄積水準爲低，并且先須清除戰時所遺留之種種問題。先須解決善後，方能談到建設新資本。其詳細方案，自須每處不同。但戰後中國工業資本建設之過程，必因此而稍受稽延，則可無疑。

至於中國工業建設所需資金總額，現在自然無法確切估定。建設的期望愈大，建設的時期

愈長久，則所需資金愈多。並且工業建設隨時代日新月異沒有止境。沒有一天說工業建設已經成功，可以不再繼續建設。工業建設是個做不完的工作。做不完，無止境，日進不已，就是工業化的精神。所以中國工業建設最後所需資金總額是不可估不必估的數目。我們所能估的只能是最初開始數年所需的資金。即使這樣，也可以有種種不同的估計。一種狹義的估計，專以工礦為限，但包括一部分民生工業的資金，五年之內，需要戰前幣值的國幣四十四億至五十三億，美金十六億至二十五億。若以戰前三對一的匯率計算，即共需美金約三十至四十億。美國對外經濟事務局代我們擬議一個三年工建計畫，也是狹義的以工礦為限，計需美金六億七千萬。我個人曾經做過一個粗略的估計，其中不包括民生工業及農業改良費用，但包括水利交通運輸建設費用在內，計五年之內，約需戰前國幣七十三億，美金二十七億，共計折合美金四十八億七千萬。若將農業改良費用及民生工業所需資金併估在內，則可能要達到六七十億美金。這是最初五年的需要。此數若以國幣計算則需要戰前國幣二百億以至二百五十億。比全國戰前共有中外資本三十八億要增加五六倍。此中國自有資本九億八千萬元要增加二十至二十五倍。若依戰前資本增殖之能力速率而言，此項鉅額資金，決非中國自身所能蓄積。即以戰前外國資本來華投資之數額及速率而言，亦覺渺乎其微。工業建設尚未成功，生產力尚未提高，國內人民尤無大量蓄積資本之可能。故中國工業建設之初期資本，主要不能不依賴外國投資，尤其要依賴外國之大量投資。估計全部所需資本中，約五分之三，係機器原料等等必需外國輸

入。即其餘之五分之一，屬於本國原料工資支付等費用者，恐亦難全由國內籌措節省，而須由國外輸入一部分消費品接濟。必須待初期之建設成功。工礦產品可以應市，鐵路公路可以通車，水利已有成效，然後人民之生產力提高，可以增加資本之蓄積，可以使以後之工業建設，在國內多籌資本。最初一步發動工業建設之資本，必須大部分由外國投資。

第一五年工建成功以後，可能增加的產值，約戰前國幣六百億。以後每年約可增產二百億。如以十分之一作為外資利息，每年亦尚可增產百八十億，此數也許覺得比較太樂觀一些。因為從普通工商業經營看當無此大利。這是計算的不同。因為普通工商業是計算投資淨利的。而我們從經濟建設的立場看，則以增加財富的總值計算。財富的總值增加，即是整個人民的享用與蓄積增加。中國戰前國民收益估計為二百三十至三百七十億。如以全國四億五千萬人口均攤，則每人每年之平均收益為六十至九十元，第一五年工建成功以後，每年國民收益可增加一百八十億，即每人可平均增加四十元。若能將每年增加之收益，以半數再投資於工業建設，則每年可增加新投資九十億。新投資又增加新產品新收益。又可從新收益中再為節省投資。如此循環不已，資本額與國富可以日增月盛。

上面自然是一帆風順的說法。問題有幾點：（一）是如何使外國投資能大量到中國來。（二）是如何使本國蓄積的資本，繼續投入擴大再生產。（三）是增加生產的財富，如何使其平均分配於全體人民，而不為少數資本家所獨占。要仔細分析這三個問題而提出解決詳細方

案，不是本書的作風。我打算另在別處詳說。這裏只要指出一條大路。中國政治如真正民主，使多數人民能積極自動參加政治意見，則多數人民必將積極自動參加經濟建設之工作，必將積極增加資本財富之生產。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平等，因此亦必然得到。政治在人民手裏，則分配不會得偏袒到資本家。而民主平等的作風，保證國內政治經濟之安定進步，又為吸引外資之最要條件。同時中國政府如真正是有效率的政府，他必然能夠引導人民的意志使趨向於工建，必然能夠保證外資來華的必要條件而向國內公平分配之理想前進。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將以簇新的政治經濟方式解決其經建問題。中國將採取蘇聯計畫經濟的精神，積極創造資本與國富，但完全從自由引導的方式達成其目的，而一些不用強制壓迫的手段。其增加的財富，將公平分配於全體人民，既不放任資本家獨占，益不使其屬於一個抽象的神聖化的國家，而實際成爲少數政治家的工具。中國將採取資本主義蓄積增殖的精神，但將消除其浪費與磨擦，有意識地自覺地向公平發展的道路前進。也許他將多少依TVA民主經濟計畫的方式而加以擴大。使計畫以全國爲對象的發展，而同時採取許多新的經濟理想，從就業保障、累進租稅與公用事業這些設施中消除資本主義的不平等與失業。這些理想在國外正在開展着。指示我們一條不向資本主義也不向計畫獨裁而中道走向民主經濟的大路。

(註) "Commodity Flow & Capital Formation" b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 Y. 1938.

附表一 戰前中國工業資本估計

類	別		總計 (國幣元)
	本國資本 (國幣元)	外商資本 (國幣元)	
製造業：			
木材業	一、二五、一七五		
家具製造業	三八一、五〇〇		
金屬工業	九、八〇〇、七九〇		
機械製造及其他金工業	一七、六九二、七〇八		
造船業	二、三三九、一〇七		
磚瓦士敏土等業	三七、八〇一、一六〇		
建築材料業	二九八、二二〇		
電氣及自來水業	一三四、二〇三、六二五		
化學工業及有關製造業	四九、一四六、九六五		
紡織業	一九五、六二六、五四八		
製紙業等	六、〇〇六、〇七六		
製革業，製橡皮業	一〇、七二一、二九二		

食料飲料及菸草工業
製紙業，印刷業等
樂器製造業
其他

製造類總計

公用事業

鑛業

運輸業：

鐵路、十六條國有鐵路(九、七三六、八八三公里)
浙贛鐵路(二〇三、四公里)
粵漢鐵路韶株段(四四、三公里)
淮南鐵路(二六、四公里)
漳廈鐵路(二六公里)
滇越鐵路(六五、二七公里)

二六、〇九一、五六六 三三、三五三、〇七二 八二、三〇〇 二、四二六、〇〇〇	六二七、八二二、九六四	一、〇七六、七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四、五二二、九六四
—	—	一、三三、七〇〇、〇〇〇	二、七、七〇〇、〇〇〇
四四、二九六、〇〇〇	八八、〇〇〇、〇〇〇	八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三、二九六、〇〇〇
二〇、六三四、〇〇〇 六四、五〇〇、〇〇〇 六、四八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六、〇一八、八二四 二〇、六三四、〇〇〇	八〇六、〇一八、八二四 二〇、六三四、〇〇〇	
	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	

滬杭甬鐵路延長綫及錢江鐵橋
 隴海路西安寶雞段（一八三·二公里）
 其他五條鐵路（一、二三四公里）

鐵路合計

公路汽車等

航空公司

輪船公司

運輸業總計

各業總計

百分比

	五、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五七、一四五 九、一五〇、〇〇〇	
鐵路合計	一四八、三二八、〇〇〇	九六一、六五九、九六九	一、一〇九、九七七、九六九
公路汽車等	一一六、九七六、〇〇〇		一一六、九七六、〇〇〇
航空公司	七、六四六、四〇〇	四、一七六、二〇〇	一一、八三三、六〇〇
輪船公司	四二、二三一、一四八	四二、三〇〇、〇〇〇	四五四、五三一、一四八
運輸業總計	三二五、一六〇、五四八	一、三七八、一三六、一六九	一、六九三、三〇三、七二七
各業總計	九八七、二七六、五三二	二、八二〇、五三六、一六九	三、八〇七、八二二、六八一
百分比	二六·二%	七三·八%	一〇〇·〇%

附表一 註釋

（一）本國製造工業資本 此類數字之估計係根據民國二十二年資源委員會之全國工業調查材料

(未發表)改編。全國各種工業別爲十六大類。據原報告每類資本總額如下：(一)木工業一，一一五，二七五元；(二)家具製造業四一九，五〇〇元；(三)金屬工業二，六九〇，七五〇元；(四)機械製造及其他金工業一六，五四九，七〇八元；(五)造船及鐵路修機業九，〇〇四，四〇一元；(六)磚瓦及土敏土業二九，一八四，二九九元；(七)建築材料業二九八，一二〇元；(八)電氣及自來水三二，六二二，六二五元；(九)化學工業，有關製造業二六，三二六，八八二元；(十)紡織業一六六，八八二，二九八元；(十一)製衣業六，〇〇六，〇七六元；(十二)製革業及橡皮業六，三三九，八三九元；(十三)食料飲料及菸草工業六八，三八〇，一九〇元；(十四)製紙業及印刷業二七，八七七，四六一元；(十五)製樂器業八一，三〇〇元；(十六)其他二，四二六，〇〇〇元；合計四〇六，八七二，六三四元。惟此項調查並不包括新疆，雲南，貴州及東三省。亦不包括兵工廠，造幣廠，電影製片廠，大部份之電力廠以及不用動力與雇用工人在三十名以下不合工廠法規定標準之小工廠等。

此項數字之改編，係取近年調查資料將原調查所缺少之各地各業及新興工業的爲增補或修正，惟力避其重複。若于新資料雖未註明調查對象是否合於工廠法同一標準，但歧異之可能當屬輕微。增訂之結果，計添入中央某機器廠及某鍊鋼廠資本七，一一〇，〇〇〇元；雲南之八家金屬工廠資本一，一四三，〇〇〇元；土敏土廠及國營西北窯廠資本八，

六二二，八六一元；電氣業一〇二，〇四〇・〇〇〇元；電木，三酸，合成淡氣，曹達，酒精，火柴工業等合計二二，八二〇，〇三三元；棉毛各紡織及西北毛織廠等合計二八，七四四，二五〇元；製革廠四，三七二，四五三元；麵粉，碾米，製糖，榨油，紙煙，製酒各廠合計五七，七一一，三七六元；製紙及印刷工業五，四七五，六一一元；其中或爲新廠設立或在舊廠增資。惟另有資本較二十二年調查爲減少者，卽地氈工業中減去三八，〇〇〇元；及鐵路修機廠資本因併入鐵路項下之故而減去一六，六六五，三〇四元是也。

除電氣工業，金屬工業及一部份印刷業外，幾有大部份之修訂數字係採自商務版一九三七年英文中國年鑑或先一年之中報年鑑。電氣工業之修正數字係採自建設委員會報告，其雲南部份則採自雲南省政府出版之雲南概覽。惟此書中關於其他工業部份之數字因已收入前揭兩種年鑑之中，故不再併入以免重複。製表時尙未獲得關於合於標準之貴州資料，卽新疆之數字亦未可得。訂數字時並未包括東三省及兵工廠，造幣廠，電影製片廠等，蓋仍二十二年全國工業調查之例也。

(二) 鑛業資本 此類數字之估計，係根據鑛業聯合會二十三年度國內鑛業概況簡表。原列資本總數爲七八，六七〇，〇〇〇元。惟其中尙有開灤，門頭溝，魯大，臨城，正豐，六河溝等煤鑛之資本總計五四，一二六，〇〇〇元。原表未經列入，茲就一九三七年英文中國年鑑爲之補入。

鑛業中之外商資本據 F. O. Berner 教授之估計在一九三一年應爲八千八百萬元，茲估計鑛業資本總額爲一萬萬三千二百萬元，即假定此兩數之差數四千四百萬元爲中國資本。

(三)鐵路 此十六條國有鐵路爲(1)津浦，(2)平漢，(3)北寧，(4)京滬，(5)杭甬，(6)平綏，(7)正太，(8)道清，(9)汴洛，(10)隴海，(11)全上潼關西安段，(12)廣九，(13)粵漢北段，(14)膠濟，(15)南潯及(16)粵漢南段等。據鐵道部報告國有各鐵路投資總額在二十五年六月爲九〇六，六八九，七四九元。此數字中應減去總務費七三，一九〇，六一九元及工務費二七，四八〇，三〇六元，而認爲其淨餘之八〇六，〇一八，八二四元約略代表此十六條鐵路之物質投資。論者往往謂鐵道部所借之外債債額代表吾國鐵路外人投資之總數，惟鐵路外債實際上並未全用於鐵道建設。(關於東三省鐵道投資可暫置不論。)故鐵路外債之數額實超過吾國實際投資於鐵道之資本遠甚。

浙江省政府曾募集債款六百萬元爲杭江鐵路之用，嗣路線更改，並延至萍鄉復於民國二十二年借款兩次各八百萬元。二十五年借款兩千萬，又二百三十三萬一千海關金單位。依是年海關金單位折合國幣二、二六〇元計算，兩年共借債四一，二六八，〇〇〇元。除前述之六百萬元外，每次借款均由國內某銀團供給流動資金及國外某廠商供給材料。惜兩方面投資之比率無由探悉，姑假定其爲中外各半可耳。(見 Finance and Commerce)

鐵道部爲完成粵漢鐵路韶株段，曾成立兩新借款，一爲國幣五百萬元，一爲二百二十萬元。此外復由中英庚款中借得英金一百六十六萬鎊及國幣三千萬元，共約折合國幣六千四百五十萬元。依每公里費用計算似嫌太鉅。此項借款或未全用在本路綫上。（商務版英文中國年鑑一九三六——三七年。）

滬杭甬鐵路延長線及錢江鐵橋之外債爲英金一百一十萬鎊，其時爲一九三六年折合國幣一八，八五七，一四五元。

隴海路西安寶雞段投資計九，一五〇，〇〇〇元（按一八三·一公里，每公里費用五十萬元計，）以原有隴海全線均係外資興築，故此段投資亦列入外資欄。

其他五條鐵路不能獲得投資之實數者爲（1）潮汕鐵路（四二公里），（2）順寧鐵路（一五一公里），（3）同蒲鐵路（六六八公里），（4）江南鐵路（一八九路公里），（5）蘇嘉鐵路（七四公里），總計一，二二四公里，假定每公里投資五十萬元，總計投資五六，二〇〇，〇〇〇元。此五綫均屬吾國資本。

滇越鐵路之投資據 *Reber* 教授在其所著之外人在華投資一書所載爲估值美金三千二百萬元，如按美金三十元折合國幣一百元計算，應爲國幣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四）公路汽車等 據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統計吾國共有各種公路汽車一九，四六三輛，每輛估

價國幣六千元，（均指戰前價）估計總值如本表所舉。

（五）航空公司 數字來源據民國二十五年交通部報告。中國航空公司資本總值國幣四，一六〇，〇〇〇元，其中政府資本佔百分之五十五，外國資本佔百分之四十五；歐亞航空公司資本總值六，九一二，六〇〇元，其中政府資本佔三分之二，外國資本佔三分之一；此外有完全國人經營之西南航空公司，資本總值國幣七十五萬元。

（六）輪船公司 華商資本之輪船公司共八十八家，總噸數為三八一，〇一〇噸；其中有資本數值可以統計者有二十六家，總噸數二三一，七二〇噸，資本總值二六，六八四，〇五一元。（見商務版英文中國年鑑一九三六——三七年）。依此估計八十八家輪船公司應有資本四二，二三一，一四八元。

（七）外國資本 外人在華投資總額，據 Remer 教授估計為美金一百一十四億八百萬元，其中用於運輸事業者計美金五萬萬六千零五十萬元，用於公用事業者美金九千九百萬萬元；用於鑛業者美金一萬萬零九百萬萬元；用於製造業者美金三萬萬七千二百三十萬元；國有鐵路外人投資部份並未包括在內。惟為合於吾人研究範圍，此中應減去日俄在南滿投資之美金五五二，三二〇，〇〇〇元及滇越鐵路之法國資本美金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共計應減去美金五八四，三二〇，〇〇〇元。

英國在香港之投資總值美金八九，八一二，〇〇〇元，其中有美金七百八十萬元係用

於廣九鐵路之英國所有段，另有相當數額之資本用於香港電力公司，香港電車公司，鑾山電車公司等，以無各公司分別報告可擬，故不擬自外人投資總額內減去此項數字。

外人在華投資企業資本總額，經修正後如下以百萬元為單位：

- 1. 運輸業 四七·三 (百萬元美金)
- 2. 公用事業 八三·三 (百萬元美金)
- 3. 礦業 二六·四 (百萬元美金)
- 4. 製造業 三三·〇 (百萬元美金)
- 共計 八五〇〇 (百萬元美金)

此外如 *Reiner* 教授所著之外人在華投資一書單列公用事業為一項，中文材料則多將併入若干工業之內。又我國資本之投放於電報無綫電等交通事業者不可詳考，姑從略。

附表二 上海十二類主要工業之資本額統計

類別	工廠數	平均工廠之資本額 (國幣元)	原料估資本總值之百分比	成品估資本總值之百分比
鑄造	一五三	一九三	一九三	一九三
鑄器	三五	二〇	二九%	五〇%
機器	二六	一三、六三	二九	三〇七

化學	六〇	六	一九四、八七八	一二三	一九七	一八七
火柴	二	四	七二〇、〇二七	五五	一〇〇	八一
紡紗	七	二九	一、四〇五、六三八	一八五	三七八	二四九
棉織	六	六九	七三、三三九	四四七	二八七	五四三
纜絲	六	九	四三、一〇〇	六三七	一一九	九四三
絲織	二五	二五	一九、一〇一	三三五	四五五	五二七
針織品	九	五	三三、一二七	二五〇	三三五	三五〇
橡膠品	二	四	八〇、九六九	三三九	五六五	五九〇
麵粉	一	一五	四六、七〇六	九六六	一、一六七	一、一六三
紙煙	四	四	四七九、八二一	三二九	一、一四九	五四〇

錄向劉大鈞上海之發展與工業化(英文)附表 TABLE

附表三 製造生產物之中國產業資本統計(一九三三年調查)

類 別 工廠數 資本總額(國幣元) 全年主要產品總值(國幣元)

金屬工業:

翻砂及零件

二四

一三三、七五〇

六五五、九三八

鍋爐及水管

五

五八、〇〇〇

三三五、一一〇

鍊鋼

三

二、四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八、六四〇

總計

三三

二、五九〇、七五〇

三、四八九、六八八

機器及工具製造工業：

印刷機

九

一〇八、〇〇〇

四三四、四二五

針織機

一〇

六七、五〇〇

一九九、八〇〇

紡織機

三二

四二四、五〇〇

一、六七八、二〇〇

動力機

三三

四六七、六〇〇

一、六八八、一七三

其他

四二

五、五八五、二七六

九、三八二、六三八

機器零件：

斧等

一

九五、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

針

一一

二九、六〇〇

一五四、六五四

龍頭及水門等

四

五六、五〇〇

六三五、二八二

其他備用零件及修理

二五

二三四、七四五

一、一五五、三三四

總計

一四四

七、〇五八、七二一

一五、三七〇、四九六

電氣機械製造工業：

電機及電器

五

一四四、七九九

四九七、四〇〇

電機及電池

一

五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總計

六

六四四、七九〇

六六七、四〇〇

翻砂作業：

紗織機

五

一七五、〇〇〇

五一九、〇〇五

動力機等

二

一三三、二四〇

一、三〇六、〇七二

其他機器及金屬物品

三

四七一、二三〇

一、四七四、三七六

零件及修理

九

二、六三五、八六七

二六五、四四六

總計

四七

三、五五四、二三七

三、五六四、八九九

運輸器材工業：

造船及修船

一五

一、八二六、八〇〇

八、一六五、一〇五

鐵路修車

三

一六、六六五、三〇四

一〇、八六五、五九三

其他運輸車輛

一四

五二二、三〇七

一、六九六、四四一

總計

五二

一九、〇〇四、四一一

二〇、七三七、二三九

總計

二八〇

三三、八二二、八九九

四三、八一九、六三三

(註)表中所列工廠以合於工廠法規定者為限

統計

金	累	積	數	勢趨綫價值	累積數之連鎖指數	
士 9	4/10 鎊	642,911	先令 6	便士 4 4/10 鎰	2,745,053.8	100.0
6	7/10	2,962,541	0	11 1/10	2,773,915.5	460.8
10	7/10	4,034,276	10	9 8/10	8,292,884.8	136.2
9	4/10	5,075,717	4	7 2/10	13,811,854.1	128.8
9	1/10	8,989,616	11	0 5/10	19,330,823.4	177
10	1/10	11,733,459	13	3 1/10	24,849,792.7	130.6
3	8/10	15,641,193	7	6 7/10	30,368,762.0	133.3
1	10/10	27,770,416	11	8 9/10	35,887,731.3	177.5
9	4/10	39,783,794	10	6 3/10	41,406,700.6	143.2
11	8/10	53,749,156	0	6 1/10	46,925,669.9	135.1
11	8/10	65,424,497	2	5 9/10	52,444,639.2	121.7
0	6/10	71,148,488	2	6 5/10	57,963,608.6	108.7
5	7/10	76,627,019	18	0 2/10	63,482,577.8	107.7
9	10/10	80,816,047	5	10 2/10	69,001,547.1	105.4
0	5/10	85,568,286	11	3 7/10	74,520,577.4	105.8
11	3/10	89,087,395	4	3	80,039,485.7	104.1
3	2/10	92,967,567	15	5 2/10	85,558,455.0	104.4
4	4/10	97,916,230	0	10 6/10	91,077,424.3	105.3
5	9/10	101,248,739	1	4 5/10	96,596,393.6	103.4
10	3/10	104,653,891	2	2 8/10	102,115,362.9	103.3
9	4/10	106,725,059	3	0 2/10	107,634,332.2	101.9
1	3/10	108,935,692	3	1 5/10	113,153,301.5	102.0
8	5/10	113,030,001	15	10	118,672,270.8	103.7
6	2/10	117,523,251	0	4 2/10	124,191,240.1	103.9
2	2/10	122,847,550	14	7 4/10	129,710,209.4	104.5
10	8/10	127,527,268	3	5 2/10	135,229,178.7	103.8
11	6/10	130,611,654	7	4 8/10	140,748,148.0	102.4

$$y = 69,001,547.1 + 5,518,969.3x$$

附表五 歷年輸入機械、工具及零件與鐵路材料統計

年份	農業機械、農具及零件		其他機械、工具及零件		前兩項合計	鐵路材料、枕木等		各項總計	上海倫敦間之匯價(平均)			總值	英金	
	海關兩	海關兩	海關兩	海關兩		海關兩 a	海關兩		先令	便士	英鎊		先令	便士
1912	60,798		5,994,147	6,054,945	3,364,302	9,319,247	3	0	5/8	642,911	6	14		
1913	112,700		8,241,856	8,354,556	7,176,201	15,530,757	3	0	1/4	2,319,629	14	6		
1914	53,145		8,864,652	8,917,797	11,792,007	20,709,804	2	8	3/4	1,071,535	9	10		
1915	52,935		5,066,666	5,120,601	5,230,718	10,401,319	2	7	1/8	1,041,440	14	9		
1916	204,520		6,857,624	7,062,144	19,181,472	26,243,616	3	3	13/16	3,913,951	6	9		
1917	108,190		6,133,307	6,241,497	7,476,509	13,718,006	4	3	13/16	2,743,783	8	10		
1918	164,183		8,237,126	8,401,314	7,223,664	15,629,918	5	3	1/16	3,907,733	7	3		
1919	521,022		15,560,815	16,081,837	24,346,661	40,423,498	6	4		12,129,223	4	1		
1920	1,004,277		24,679,676	25,683,953	14,355,357	43,039,310	6	9	1/2	12,013,377	18	9		
1921	2,192,404		56,220,204	58,412,608	34,660,249	93,072,857	3	11	7/16	13,965,361	9	11		
1922	695,732		51,551,801	52,247,533	25,566,676	77,814,209	3	9		11,675,341	1	11		
1923	301,716		28,826,808	29,128,524	9,025,322	38,153,846	3	5	3/4	5,723,391	0	0		
1924	279,158		24,447,168	24,726,326	11,789,168	36,515,494	3	7	15/16	5,478,531	15	5		
1925	161,288		17,664,320	17,825,608	10,096,688	27,922,196	3	5	7/8	4,189,027	7	9		
1926	511,540		19,199,565	19,711,105	11,969,280	31,680,385	3	1	3/8	4,752,239	5	0		
1927	665,976		20,447,841	21,113,817	14,062,886	35,176,703	2	9	13/16	3,519,108	12	11		
1928	743,364		22,083,126	22,826,490	15,957,619	38,784,109	2	11	1/16	3,880,172	1	3		
1929	1,407,226		33,038,663	34,445,889	16,024,630	49,470,519	2	7	13/16	4,948,662	5	4		
1930	1,489,757		47,505,320	48,995,077	17,595,796	66,590,878	1	10	11/16	3,332,519	0	5		
1931	682,198		48,556,853	49,239,051	18,827,474	68,066,523	1	6	7/10	3,405,152	0	10		
1932	58,849		31,445,641	31,504,490	9,911,101	41,415,590	1	71	1/4	2,071,168	0	9		
a. 1933	國幣元 29,764	國幣元 39,910,168	國幣元 39,939,932	國幣元 14,260,026	國幣元 14,199,957		1	2	13/16	2,210,633	0	1		
1934	14,712		36,315,932	36,330,644	25,527,409	81,858,053	1	4	1/8	4,094,309	12	8		
1935	49,540		63,031,474	63,081,014	26,740,930	89,821,944	1	5	3/4	4,493,249	4	6		
1936	114,426		56,993,297	57,107,723	49,357,193	106,464,922	1	2	3/8	5,324,239	13	2		
1937	21,486		61,453,161	61,474,647	32,101,449	93,576,134	1	2	5/16	4,679,708	7	10		
b. 1938	10,072		53,543,161	53,556,233	8,118,819	61,675,052	1	2	1/2	3,048,395	1	11		

a. 本年不包括枕木及未列名材料

b. 1912—1932 單位為海關兩

1933—1938 單位為國幣元

直線方程式: $y = 69$

附表四 上海十二類主要工業動力消耗統計

類別	工廠數	平均每工廠消耗動力	平均每工人消耗動力
鑄造	三	四八 H.P.	〇三 H.P.
機器	二九	一四·九	〇四
化學	七	五三	〇七
火柴	四	七·〇	〇二
紡紗	二	一、五〇·二	〇六
棉織	七	六·九	〇三
繅絲	九	二〇·二	〇三
絲織	三	二二·七	〇二
針織	五	一九·二	〇三
橡膠	四	一四·五	〇三
麵粉	一五	七九·四	四·六
紙烟	四	六〇·五	〇三
總計	一九三	一九三	一九三

錄自劉大鈞上海之發展與工業化(英文)附表 V-D

附表六 中國紗錠統計

年份	華商紗廠		日商紗廠		英商紗廠		總計	
	錠數	指數	錠數	指數	錠數	指數	錠數	指數
一九九〇	一一四、七三二	一七、六〇	三三、四三三	九、六一	七二、三三二	七四、〇三	一一四、七三二	二一、六七
一九九〇	二二三、七四四	三四、〇三	一四九、六〇八	六四、〇九	七二、三三二	七四、〇三	三二五、四八八	三三、一〇
一九〇〇	四二六、〇五六	六三、八四	一四九、六〇八	六四、〇九	七二、三三二	七四、〇三	六三六、九七六	六四、九一
一九〇六	四八四、一三六	二四、二九	一四九、六〇八	六四、〇九	七二、三三二	七四、〇三	七〇六、〇五一	七二、八二
一九一〇	六五一、六七六	一〇〇、〇〇	一七二、六四八	七三、九五	九七、六八八	一〇〇、〇〇	九三三、〇二二	九三、八一
一九一五	九八七、九六四	二〇五、五一	三〇七、〇四八	一三一、五三	一五三、三三〇	一五六、九五	一、一四八、三三二	一一六、八四
一九二〇	一、三五八、五五二	一〇八、四七	五四〇、七五二	二二六、六四	一五三、三三〇	一五六、九五	二、〇五二、六〇四	二〇八、八二
一九二五	二、二五六、六二四	三四六、二八	一、六三六、一五六	七〇〇、八七	一五三、三三〇	一五六、九五	四、〇四六、一〇〇	四二一、六九
一九三〇	二、三九五、七九二	三六七、六四	一、六七四、八四四	七二七、四四	一五三、三三〇	一五六、九五	四、二三三、九五六	四二九、七八
一九三五	三、〇〇六、四七九	四六一、六五	二、二八四、八六〇	九九八、七四	二三三、六〇八	二五九、〇三	五、五二六、八一七	五六一、三五

三 資源，人工，組織

在將來工業化的過程中，國內資本在某種限度，某種條件下。可望迅速積聚。但亦有不容樂觀處。在資源，人工，組織方面，我們亦可以發現許多樂觀之點，但亦有別種不同的限制條件。

先說資源。

經濟資源自給是近代國家努力想做到的理想，亦是近代國際爭戰的原動力。若執此以論中國之資源，則缺陷甚多。汽油，橡皮，某幾種輕金屬我們或者完全沒有，或者蘊藏甚少。這是天生的缺陷。現代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具備各種必需的資源。我們也不用太過求全責備。我們的目標，是要建設工業，我們只問中國的資源，能不能建設一個像樣的工業國。我們亦不能將各種資源一一討論，讀者可以參考地質調查所的礦業紀要及各種年鑑等書。工業生產是機器生產，運輸是機器運輸。製造機器的是鋼鐵，運轉機器的是動力，而動力大部分起於各種燃料。所以工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工業的工業，繫於鋼鐵，燃料，動力。所謂鋼鐵帝國主義，所謂石油爭霸戰，所謂電汽化，無非是這種事實「劇情化」的說法。

鐵的儲量，中國不多。第五次中國鑛業紀要共列一，二〇六，四三八，〇〇〇噸。東北四省佔八八三，五二二，〇〇〇噸。而關內僅三二二，九一六，〇〇〇噸，但東北淪陷後，日人仔細探查，發現新鑛甚多。鐵儲量增加額據稱數倍於昔。第六次鑛業紀要僅調查川滇黔桂康五省，儲鐵量為七千萬噸。主計處統計局估算為全國一，四五二，七七八，〇七〇噸。如其全

國積極建設工業，推廣機器及新法運輸，每年所消耗的鐵砂量，可能要到二三千萬噸。西南的儲量全部。只够全國三年消耗，關內儲量全部只够十年消耗，全國儲量只够四十年消耗。況且蘊藏的礦量，不即是可以經濟採用的礦量。或許有礦質不好，地位不好，以及別種原由而不能開採的。除非進一步的調查，能發現大量新礦源，則藏鐵一節，對於中國工業化的前途，不免是一個不幸的限制。來華考察的外國經濟學者，如 R.H. Tawney 及 Sir Arthur Salter 等，均以中國鋼鐵缺乏，認為重工業發展無望。吾人雖不必如此悲觀，卻不能不認識此事實。在此種情形之下，仍要推行工業建設，只有兩條路。一是根本放棄鋼鐵工業。國內生產所需用的機器，運輸所用的車船，建築所用的材料，乃至軍備所用的武器，一切靠國外輸入。國內只有輕工業。未嘗不能相當推行工業建設。但工業的根本不曾建立，甚至軍械要靠外國供給，不免太危險。第二辦法，就是輸入外國製鋼原料。鐵砂重而提煉時消耗大，則可以輸入廢鐵及鋼。這樣也可以發展相當鋼鐵工業。日本自己鐵藏亦極少。他的煉鋼業，就靠東省及漢冶萍等礦的鐵砂與美國輸入的廢鐵。所以東三省是中國工業化必爭之地。

燃料方面，石油極少。第五次礦業紀要，列為四，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噸。東北四省佔二，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關內二，二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噸。第六次紀要列四川儲量為三萬九千七百萬桶。占全國百分之三十一。第三版英文中國年鑑估計列為全國四，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桶，但美國一年的產量，經常要六萬萬至七萬萬桶以上。我國全國所儲，

只值美國六七年產量。內燃機的發動，多賴石油。近來石油逐漸用爲工業動力，且有代替煤之趨勢。此方面中國很大吃虧。將來或能希望人造代用品，或多多應用油頁岩提煉或更發現新礦。在眼前只有靠國外輸入。

各種煤礦藏量，據第五次礦業紀要爲二四三，六六九 〇〇〇，〇〇〇噸。除國外四，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以外，均在關內。這好像補償一石油的缺乏。但第六次礦業紀要，對於西南五省煤藏量減少頗多。原來川省九，八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噸，雲南一，六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噸，貴州一，五四九，〇〇〇，〇〇〇噸。今則四川爲六十萬噸，雲南爲二十三萬噸，貴州爲十四萬噸。其餘各省，分布相當分散。山西最多，一二七，一二七，〇〇〇噸，佔全國之半。陝西亦有七一，九五〇，〇〇〇噸。工業用最重要者爲烟煤，全國共一八六，八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噸。亦以晉陝兩省爲多。但晉陝煤雖多，而鐵的儲量不多。華北鐵礦比較以冀察爲多。從煤鐵分佈的地理看，華北重工業的希望，似乎勝於華東華南。西南特別是四川，有鐵有煤，亦可成爲一個工業區。所以華北亦是中日必爭的地方。

中國水力資源，尙未全部調查。東三省蘊蓄力源甚富，吉林尤多。開已被日人部分開發。關內則華北一帶無大資源。黃河上游壺口及漢水洛水上游，有開發可能，但未經調查。浙閩湘贛山嶺地帶水力均可供發電，且交通較便，而西南各省則爲水力精華所在，長江峽谷可發電一千萬萬瓩。四川樂山附近岷江上游之大渡河及馬邊河可發電八十餘萬馬力，昆明盆地區域各河

可發展約一百萬馬力。世界最大水力發電廠，美國波德谷一百八十四萬馬力。其次蘇俄尼褒八十一萬馬力。我國西南水力超而上之。估計全國水力資源之蘊蓄，遠在一萬萬馬力以上，其中約過半數集中於川滇兩省。唯許多水源，交通不便，築壩開發，需資極鉅。故一時未能大量應用。（以上大多根據施嘉煬先生民國二十九年工程師學會之講詞）最近長江三峽水電計畫經美國工程師之研究調查，而益證明其偉大。美國已開發之水電量爲一四，八八五，〇〇〇馬力，約佔全國潛藏水力百分之二十弱。其餘百分之八十，亦因投資過鉅，離市場過遠，未能開發。一九三〇年美國全國供給電力共三〇，六一九，〇〇〇瓩。其中約三分之一爲水電。（見 *Nourse and Associates: America's Capacity to Produce*）。如各方之估計大致不誤，則中國一萬萬馬力之水電資源，且大於美國之蘊藏量。可以輔助煤藏之不足。特別是西南區內，水力，煤，鐵，均有相當蘊藏。加以鎢，錒，錳，銅各礦，集中於桂粵贛湘諸省。則將來之西南各省，當可發展成爲工業中心。中國立國根基，從中原農業，到江淮農業，從江淮農業，到沿海貿易輕工業，而迅速轉入東北及西南重工業，在資源蘊藏上看來，似非無望。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R. H. Tawney 教授在倫敦中國委員會席間演講戰後中國問題，以爲中國要學英美德國之工業發展是大錯誤。除軍械製造必須自理外，中國所缺是鐵，所多是人。故宜仿法國之樣，發展精細的輕工業。Tawney 是宏博深密的經濟學者，又到過中國研究，我們相信他的勸告是好意，亦是事實。但他如其遲一年演說，我想他一定不會勸我們仿效

法國。並不是因爲法國一次戰敗了便看輕他。中國，法國，甚至英國多應該從經驗中得到教訓。一個以精細輕工業立國的國家，是不適宜於現代世界的。Fawcett 的話是從純經濟的觀點出發。在這世界爭霸的時代，即使不說「經濟人」已經沒落，至少政治的考慮，不能不占很重要的位置。從長時期說來，中國的鐵藏確是太少，不能和英美德相比。但我們不用自餒。第一照工業區位的理論，工業中心可以建立在原料所在地，但亦可建立在市場在燃料動力所在地。中國雖然缺乏鐵礦，但燃料動力尚不缺，尚可輸入生鐵或廢鐵作原料來鍊鋼。因此鋼鐵工業機械工業儘有發展之地。歐美鍊鋼也從中國輸去鎊鎢，中國鍊鋼何嘗不能從歐美輸入鐵料。所差只是運輸多少及製造成本問題。鋼鐵工業既是工業建設的基本，又是國防安全的保障，不能單從成本貴賤上着想。只要我們願意貴一些，我們沒有不能建立鋼鐵工業的理由。

其次中國鐵藏雖不豐，但從短期眼光看來，所藏鐵量，即在極度工業建設的消耗下，也可支持三四十年。初期工業化時，不會得一年就消耗二三千萬噸。有許多地方可用他物代替。所以國內的藏鐵量使用一百年或以上而不竭，是可能的事。在眼前中國只要能於一二十年以內，建立起五個鋼鐵工業中心。譬如說，東三省，河北，南京，湖南，湖北，四川，各一處已經要算很大的成就，東三省，河北，湖北，是已有的根基。南京，湖南，四川，均是戰前後查勘認爲原料燃料近便相宜的地方。有這樣五六廠，鍊鋼鍊鐵，跟着就可以鑄造軍械，車，船及重要工業機器。如其能力不足，則先顧及了國防及基本工業的需要。其餘輕工業所需要的機械，

儘可以如戰前一樣，從國外輸入。留出鋼鐵資源，供國防及基本工業之用。則鐵的儲量更可不愁驟缺。中國的資源決非十分不夠。否則日本爲何要攫奪我們。日本攫奪我們的資源，可以希望建國。難道我們自己倒說不能麼？

再說勞力。

第一期五年工建，單從工礦來說，估計需要管理人員約二十二萬，技術人員約十八萬，技工約一百二十萬，粗工約二百三十萬，合共約四百萬人。中國從來只嫌人多。工業建設所需勞力，在量的方面說，決不至不夠。農業耕作經營制度如予調整及部分的使用機械之後，當可以省出勞工數千萬人至一萬萬人。如大量使用機器，可以省出更多。質的方面，中國一般農人，身體，魄力，智識，並不特別壞，至少本質上不壞。近來因爲農村衛生太不講究，花柳及若干傳染病盛行，以至農村壯丁的體質智慧，似有退步的危險。但工業化逐漸進展，人民智識提高，教育普及，公共衛生改良，這些缺點，亦有改良之可能。資源對於工業化的困難，在於長期；反過來，勞力對於工業化的困難，不在長期，而在眼前。在工業建設初期，如何將向來沒有工業訓練，亦沒有工業興趣的農村剩餘壯丁，轉變爲工業工人？這一轉變期便有許多問題。在量的方面，要調整得宜，使農業方面省出的剩餘工人恰夠工業需要。如其農業改革及農業機械推行太快，農村內被排出的勞力太多，恐怕要鬧失業問題。否則廉價的產業預備軍，將使工業與農業的改良與機械化受到阻礙。這是以前妨礙中國工農業生產率提高諸原因之一。反過

來，如農業耕作沒有改良，不能省出勞工，則新工業因為招雇勞工困難。亦會受到影響。戰時後方便有這種現象。

但職業轉移的困難，主要不在量的方面，而在質的方面。這種職業轉移包括兩種。一是從農業工人轉到工業工人，二是從一般書寫計算工作，所謂白領階級，轉到工業技工。新工業生產，需要許多粗工或雖無機械智識而手藝熟練的半粗工。這些工人可以從農民中選練。但工業中尤需要許多有相當機械智識的技工。他們需要相當教育，能夠教得懂機械理論。至少要小學卒業，最好是初中畢業程度。不識字的工人，憑長期經驗自然亦可成爲很好的技工，但終不如具有相當教育的人容易學會。再高一些則工頭與助理技工，處於一般工人及上級技術人員之間，身親工作，領導工人，如軍隊中連排長地位的人，更是工業組織中重要職位。他們更需要較高的機械智識與教育。更上邊的自然高級技術人員。要從現社會的士農工商四民中去訓練這四種從技師以至粗工的工作人員，各有困難。在技術訓練方面有困難，在心理轉變方面更有困難。照現在社會一般教育程度說，農家子弟及工人子弟，往往全不讀書。或只在小學勉強讀上二三年。出校以後，沒有能力自己看報讀書。不上幾年，所讀也就忘了。這幾年的教育，可說是白廢了。聰明的人自己可以從機械的實習中得到實際智識與經驗，但不能深造。如其憑他們單靠經驗磨練而做成上級技工與工頭，那就非待二三十年不與。中國要迅速工業化，不能這麼等。能夠在小學畢業的人，在中國已是少數。能夠在初中畢業的，更是家庭比較寬裕的人。從

智力測驗上，我們知道智力是天賦的。疾病可使之減低，但沒法使之增加。教育只能增加智識。但現在的小學與初中教育所灌輸的智識，不完全適於技工職業上應用。小學初中所教的學科太注重一般常識，如歷史公民地理等等。不能說其沒用，但至少對於技工將來事業上很少用處。中國學制，好像小學是中學預科，中學是大學預科，又好像小中大學各成單位，讀完一階段也可以自給，所以儘不妨半途而廢，讀中學不讀大學。但事實上各種職業需要各種專門技術訓練。所以爲了適應工業化起見，我們的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全得改變。我以爲初等小學應當造成學生讀報及寫信和計算的能力。使他將來有志，可以有求深造的工具。常識的課目，教而不用，日久遺忘，不如不教。將來在社會上做人自能學得。高小除了爲升學以外，應當另有一種職業高小，爲卒業後即作工學藝的人特別設教。初中高中全應當爲職業的與升學的兩種。從現在一般家庭栽培子弟的能力而論，職業學校應當特別多，而升學的中小學應當限至極少。並且不預備特別深造讀完大學的人，限制他不要入大學預科的中學。如此，再加以各工廠自辦的各種職業補助班，將工作與智識聯合起來。則一二十年之內，或可造出大批技術工人及工頭。

但心理方面的困難，比之技術訓練，似乎尤難措手。手藝工人與農人的心緒均是寬弛慣的，特別是農人，尤不慣於工廠中紀律及緊張的生活。他們不肯好好學，亦不肯好好做，常常回家歇工。戰時後方新興工業便有此困難。蘇俄五年計劃時亦感到工人不湊手之苦。而在需要殷切的時候，技工成爲天之驕子，亦往往放縱沉湎，自暴自棄。眼前後方工業工人便有這現

象。至於學校畢業的子弟，已經是一「士」的階級，更是心理上深閉固拒，不願做工。一個中學生，出身於小地主，小商人或自由職業家庭，有多少青春美夢，往往甯死也不肯做工。除了面子關係以外，也確有實質困難。工人往往是粗人。與他們是絕對不同的兩種社會階級，兩種道德標準，竟可說是兩個世界上的人。如黑旋風李達與賈寶玉，他們沒法在一處工作生活。許多工廠用學校畢業生做工頭或助理技術員，往往不瞭解工人，與工人水火，做不好。從工人中提升工頭，又往往不識字，全不了解工廠管理應做的手續。

中國工業化要順利進行，中學生大學生要完全變更心理，變更態度。在外國工讀是常事。百萬富翁出門時儘可自己背包，沒有僕從。吾國舊時太學亦有儲讀。吾在浙江天都參觀一個小學。那是朱晦庵先生講學遺址。小學生皆自己擔水煮飯，尚有古風。現在的學校制度，非但不能給予學生以職業上應需的智識與技術，更不曾給他們以道德的心理的訓練，教他們以「做人的做法。教育的改革，固然不專爲了工業化起見。但工業化若沒有教育改革同時創造適應的工人，則工業化是定要失敗的。

順便說一說人口問題。

中國人口並非絕對過多。但因生產力停滯薄弱，故全體人民所生產之貨物，尙不敷全體人民的消耗。以致資本無法蓄積，工業無法推進。最要緊自然提高生產力。但如其生產力提高一些，人口亦增加一些，則結果仍是不敷，仍是貧弱。印度在英國統治下就有這種情形。所以在

眼前提高生產力，勿宜鼓勵生育。至少人口之增加，要比生產力來得慢才好。中國對於人口品質的改良，比人口數量之增加，尤其要緊。生產力增加以後，人口數量自可任其增加。一切生產事業要人來做。人是增加財富的原動力。人愈多則財富生產愈多。所以鼓勵生育原自不錯。但全體人民生產的財富至少要能養活全體人民。若不能則是人口相對過剩。在此時要提高生產力亦要暫時節育。

最後我們再說組織。

組織能力之差與經驗之缺乏，可說是過去八十年辦工業而工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組織有兩種，一種是為全社會國家組織各企業部門，這是經濟計畫。一種是為一個企業組織內部分工，這是工業管理。我們對於兩種人才均缺乏，兩種經驗均沒有。將來中國工業化的企業家，無論是國營抑私營，終不免要出之於士大夫階級。但他們的道德觀念，做事精神，往往與現代企業不合。人事的不善，帳目的不清，責任不確定，效率不講究，使得事業家庭化而不得進步。這種情形，是歷史的階段，恐怕一時難得猝改。十六七世紀英國之棉紡業及羊毛業，亦是家庭化工業。其企業精神與經營方法亦與中國相近。（見 Miss Eileen Power Medieval People）日本工業之興，亦是三井三菱等數家。工業建設之初，社會上無經驗已著之管理人才。與其用毫無瓜葛之外行人經營，何不委任自己親信。直至現在英國尚有許多工業在家庭經理中。只要法的關係，物的關係，不瞻徇人的關係，則家庭經理尚非全不可行。但中國人對於

大的組織，似乎特別不擅長。許多事業小範圍經營時頗有成績。事業擴大了，便會失敗。這或者因為交通不便指揮不易之故。或許中國人才力氣魄，真是宜小不宜大。換句話說，即是中國企業的 Optimum Size 小於一般外國。這種企業經驗與企業精神，往往不是學校教育所能栽培。要從事業中親切磨練出來。一部分還靠天才。所以企業人才與經驗的缺乏，尤其為社會國家分配組織企業的人，其經驗魄力之缺乏，亦是將來中國工業化迅速發展的一個關口。據有經驗的人這樣說：中國如收回東三省撫順煤礦，國內有能力管理這樣大礦的人，只有幾個。又據說長辛店機廠被日本人霸佔開工後，生產能力比前增加一倍，而機械及工人仍是老樣。所以中國工業化時對於組織人才和經驗的培植，真是很重要。

總括起來，中國資本不能迅速蓄積，重要資源有多種甚為缺乏。工人雖多而不能順利轉變職業。企業人才與經驗難以培養。這均是不許樂觀的地方。但資本雖缺乏，而輕工業資本可望於短期內重造戰前八十年之蓄積總數。自此以後，資本累積以愈多而愈速。資源雖有限，而眼前數十年乃至百年之消耗，儘可無慮。職業轉移雖難，但教育制度如能適宜改革，可望於二十一年之內，造成大批技工及工頭。有許多困難，可望從國際合作中得到解決。重工業及基本工業所需之資本以及大規模開發所需之資本，希望友邦可以投資或借款。不足的資源原料希望從國外輸入。眼前需要的技術工人工頭技師，希望可從友邦借聘。企業人才與經驗，可以向國外實習，亦可歡迎外國投資來中國示範。這些有待於國際合作之問題，當於次章論之。

中國士大夫一向憑藉其社會地位，輕視農工。數千年來，積重難返。弄到農工自視爲賤民，無自信力，卑順屈伏，消極忍耐。在以前士大夫憑此以治天下，以保祿位。養成了他們虛嬌愛面子心理。治人者與治於人者打成兩橛。這樣的社會，在以後工業建設、世界爭霸戰中，無法維持，在工廠中，自工人以至技師經理，彼此是薪給勞動者。在國家內，自農工以至文武官吏彼此是公僕。只有職事的不同。沒有階級的貴賤。不獨士大夫應該穿上工人裝，鑽到機器底下與工人一齊動手。尤須將一切發展才能增進幸福的機會，向農工羣衆開放。使他們能夠憑藉自己的聰明才力，從社會的階梯上，步步上升。這樣纔能恢復他們積極自信的勇氣，來擔當責任與艱鉅。中國是全體主義的工業化。世界是全體主義的競爭。如其一個國家百分之八九十人民沒有效力的機會與興趣，而以百分之二一十人的力量來應付這局面，是不可能亦是不智的。所以工業化的成敗一面係於士大夫的態度，一面係於工人的自覺。

四 國際合作

中國工業化，在資本，原料，人才三方面均需要國際合作，然則國際合作是不是可能呢？從長時期說來，絕對的可能。中國有豐富的蘊藏與地力，有勤勞墾作的多數人民，這是世界人類的一部分資產。「天生尤物不自禁」，如其中國人一時自己不能開發，外國一定來投資開發。甲國不來，乙國必來。海通以來一百年的中外關係，簡單說，就是各國競爭開發中國；或

企圖霸佔中國獨自開發的爭鬪。門戶開放與東亞秩序就代表共同與獨霸開發的兩種趨向。中國方面，感於強列這種侵迫的威脅，自然有抵禦外侮而打算自己開發的企圖。這樣就發生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所以無論獨霸，或共同，或自力更生的開發，其開發是一定的。所爭者是開發方式之不同。有些外國政論家對於中國主盟東亞，比日本更爲擔心。原因是中國強盛以後，東亞許多殖民地民族全要學步興起。這種心理 Dr. Owen Lattimore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號 *A. J. C. 雜誌* *America has No Time To Lose* 一文中就明白指出而加以駁斥。試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法荷所有東亞殖民地，在戰事一開始時幾乎全被日本佔據過去。連印度延至近東，南至澳洲紐西蘭，均岌岌可危。殖民地對於母國一些沒有好感。這是很自然的。殖民地土人反正是做奴隸，何必幫了一個夠凶夠狠的舊主人，去打一個至少表面上甜言密語的新主人。有殖民地的國家，應當從此明白。在二十世紀全體戰殲滅戰的時代，要保持殖民地抵抗侵略，一定要發動殖民地全體資源與全體民衆。要這樣便不能不給殖民地以自由獨立。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再有殖民地。菲列賓、荷印、新加坡、緬甸，這些殖民地並不是爲中國強盛失去的。反過來，如其中國真是強盛，能夠絆得住日本，則這些殖民地倒可以苟延多時，慢慢再圖改良。這次戰爭的經驗，應當明白教會了聯合國。只有強盛的中國，才是安定東亞的真正力量。在這次大戰在下次大戰，乃至無數次大戰中，日本與美國必在太平洋上互爭雄長。日本是「無一」的國家，必然要搶奪，而英美必然要保持。世界陣營已分化得很明白。英日同盟，藍辛石井條約的時代早已

過去。日本將永久成爲軸心的一角，永久與聯合國爭衡。而要在東亞牽制日本打擊日本的必待一個強盛的中國。所以中國將永久成爲聯合國的柱石。只要世界爭霸戰不休止，這種陣營亦不致於改變。從聯合國立場說遠東的盟友中國愈強，愈能打擊敵人。所以強大的中國與南洋菲列濱澳洲結合的共同防禦集團，是太平洋霸權所係，世界和戰所屬，亦是英美盛衰所關。

大勢既然如此，聯合國自不得不盡其全力協助中國。所以中國工業化的國際合作，原則上應當沒有問題。問題是戰後復興建設需要的資本太多。在歐洲，自由法國，與山自捷克，自由波蘭，自由荷蘭等等國家之重建，定要與中國工業化競爭着英美等國之資本與原料。這是一個優先權問題。直到現在，英美總是注重歐洲。他們或許要以爲恢復東南北歐許多國家來包圍復仇的德國，比之資助中國鎮壓復仇的日本更爲重要。如其這樣想，他們便錯了。在全體主義的世界性殲滅戰爭中，小國沒有地位。如其恢復東南北歐許多小國，無非更將他們來喂復仇的德國罷了。這次大戰諸小國對於德國所能給予的抵抗，可以證明此種政策完全無用。要鎮壓德國，要靠歐陸上的陸權大國。要鎮壓日本，要靠亞洲上的陸權大國，亦要靠海軍。在將來一二百年的世界中，如其我們沒有辦法將德日感化，成爲和平發展的國家，則我們只有用世界聯合的武力，以集體和平鎮壓住德國與日本。但要壓住強國只有比他更強。不能用小國來圍繞他。因此歐洲小國的復興需要，不應當與中國工業化競爭資本與原料。

從世界和平說，從英美霸權說，從中國立場說，戰後協助中國工業化，協助中國建立強大

的陸空軍，（加以英美的海軍）是最緊要亦是最有利的事。英美應當向中國充分投資開發。這種投資要用什麼方式，我不打算詳談。只消指明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式的直接投資，含有政治作用的投資，非但爲中國人所不歡迎，亦決決行不通。以後投資應當是純粹的商業投資以及善意合作的政治投資。投資國不妨派遣技術及管理人才，參加組織經營，但只是商業的合作。抗戰以前很有幾宗國際投資，採取這種中外合作的方式。在中國可以得到資本及技術，可以學得組織及經驗。而投資國亦可以多一保障。這種投資，主要的將爲重工業，國防工業，基本工業，及投資較鉅的建設事業。主要的對手方，在中國定是政府，在外國或是政府或是大公司。至於民間輕工業的投資，雖然不禁阻，也不用十分提倡，只消加以大綱上的指示，使其事業發展的方向，不致與國家建立國防工業的原則太違背。因爲中國最需要的外國投資，盡在重工業國防工業方面，所以尤不容許附有侵略的政治條件。

要使外國能大量投資於中國重工業，中外兩方，全須要一種心理上的準備。外國資本家應當改變以殖民地待遇中國的態度。以公平合理的商業態度來投資。尤當認識中國工業發展軍備建立，爲對付共同敵人計，即等於其本國之軍備工業一樣。要以政治上善意協助的態度來投資。在中國方面，應當認識中國非有外資，不能大量迅速工業化，因之就不能立足在下一次的世界戰爭中，這是中國存亡問題。中國需要外國資本，外國技術人才，及企業人才。對他們應當歡迎。不應該用民族資本國貨，這些籠統而多含意氣的觀念來抵拒外國資本人才。中國所反

對的乃是帝國主義式的政治投資。至於以公平條件來開發中國，使中國工業化的資本人才，乃是中國的救星。我們要明白，中國有很好的富源蘊藏，是個謾藏誨盜的局面。如其我們自己能迅速有效開發，又拒絕盟友善意的協助開發，則結果是東隣強盜恃勢侵占。八年來艱苦的抗戰，即是一百年來自己不爭氣不會好好工業化的結果。如其現在仍抱着深閉固拒的態度，不能迅速工業化，不出二十年，中國重作戰場，就沒有今天的機會了。

但是要外國資本投資中國來促進中國工業化最急要的前提，還是要中國人對工業化有共信，能確實將工業化當作第一件事情來辦。一切政治糾紛，思想異見，權位爭執，不要使他妨礙工業建設。工業建設要以和平為前提，所以決不可打內戰。工業建設要有相當計畫，所以決不能四分五裂而要相當統一。工業建設要羣策羣力，所以至少大家要能容忍講理性。否則戰亂一起，兵連禍結。工業建設固無從談起。外國資本也無法輸入。中國只好打回頭，重走歷史上停頓進退之路，甚至像五胡亂華時代一樣，重走歷史上黑暗之路。

但是世界已經走上原子能時代了。中國縱不自惜，自願打回頭去。世界是人類的世界，他們不會得放我們回去。在這充滿矛盾的世界裏，政治上的民主與集權，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上的自由與統制，正在展開着。不會得放過中國。這樣廣大的土地與資源，不會得放他荒廢。這樣多的人力不會得放他閑散。世界逼着我們。我不自謀，必有人起而代謀者。不入於左，則入於右。工業化還是要工業化的。但恐怕是殖民地的型態了。是奴隸們的工業化了。

因此我不得不再三致意於中國士大夫及各政黨。他們掌政治樞機，爲民衆先導。他們對於工業建設，及工業建設所發生的同化作用，是迎是拒，是中國工業化順利與否的樞紐。士大夫已經固執了三千年。夠了。在二十世紀的時代精神下，沒有面子可要。這句話，不獨對中國士大夫適用，對外國士大夫也同樣適用。他們對於殖民地次殖民地的面子尊嚴，也應該卸下了。只有大家認識事實，大家才有誠心通力合作的可能。

五 工業化的中國

中國既有工業化的必要，又有其可能，甚至說有其必然，然則工業化以後的中國是如何情景呢？是否全盤西化了，親吻，抱腰，裸體生活（*nude life*），機器奴隸，是否一一要搬到中國來？是否中國文化另有什麼本位？是否五行陰陽仍舊相生相尅？是否孝弟忠信仍爲人之大本？舊文化與傳統的民族性，積世的制度文物思想道德，有若干要消滅，有若干要變態，有若干要保存，有若干要光大起來？

從理論的步驟說來，似乎先要說明中國工業化的方案，步驟，然後方談得到工業化以後的展望。但我故意將此一節避免了。工業建設與工業化是要切實做去的事，不是紙上高談的方案。本書目的是只要說明一句話：中國一切現狀由於農業化，一切改革要待工業化。而工業化又有可能性，則結果應當趕速工業化起來。如其因爲本書的論證，使國人更明白工業化的需

要，工業化的性質，與工業化的困難限度；使得人人能夠對工業化正確努力，不致像過去八十年那樣紛亂錯誤，使工業化能夠更順利推行，則著者已算盡了力。至於如何入手實行工業化，那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四萬萬人各人有自己可能努力的地方。著者決不應該代每人來擬具方案，規定他在工業化過程中應做的事情。人人皆有聰明才力，知道自己所能做的事。比之別人借箸代籌的方案，總要高明適宜一些。只要信仰的方向相同，則努力的結果自然如康有溥所說「如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至於工業化時許多專門建設計畫，譬如說，工廠如何建設，選何處地點，資本如何籌集等，自然要一件事一件事立方案，更不是著者所能代勞。所以本書全部不談方案。但本書雖不談方案，而著者心目中自不免有一些捉摸。從將來工業中國的展望中，也多少可以反映出著者所暗示的工業化方針。

工業化後的中國是如何情景呢？我們先從實物環境說起。

工業化以後，交通非常發達。運輸量非常增加。消息的傳遞非常迅速而正確。國內主要城市，均有火車網聯絡。蒸汽機與柴油發電的大貨車，可以一次拖運五千噸，每小時速率七十五英里，十小時繼續不歇（這是美國現在已有的貨車，不是理想）。貨物的大量流通，使全國成爲一個市場。在火車網中間，則有輔助的公路網。每個人家，每個農場，可以有汽車直達。輪船航運與水道開發亦同時增加。舊的運輸工具，駝騾驢車，扛抬推挽，幾於絕迹。只有帆船或許在水運中尚有地位。騎馬划船成爲運動競技的工具，不作爲運輸之用。

電報與無線電發達。到處可以通話通消息。在海岸經營進出口的商人，可以在辦事處提起電話聽筒，與喜馬拉雅山脚的牧場經理講定交易。伊犁塔城的西域考古家可以將當天的發掘，Television 傳佈到廣州香港。可以當時得到聽衆的詢問與批評。全國人民，不但文字言語上彼此可以完全瞭解；在心靈思想上亦沒有絲毫阻隔。彼時的一國，其統一程度，就像現在最和融的一個小家庭一樣。

航空更是普遍發展，而爲人民餘閑旅行常用的工具。海拉爾的農人，在農隙時褪下皮襖，便乘飛機游歷南洋羣島，看那裏的農人，穿着單衫，種橡樹。西貢的農人可以飛到江南，實地研究稻作改良一法。混一的交通，使知識思想觀念亦混而爲一。

許多從前僻陋的地方興起而爲工業中心。動力工業，機械工業，製造工業，化學工業，一步一步進展。隨着工業的發展，現代商業機構與金融機構亦日益完備。貨物大量生產，而廉價發售。人民的物質享用，比現在大大增加。非但生活資料絕對沒有恐慌，並且有餘剩的生產力，生產種種文明裝飾的東西。現代中國富貴人家的享用，成爲將來普通平民的享用。食物滋養料大大改良。不單每人可以有充分的乳肉，蛋，並且有水果。住的屋子亦大爲改良並擴充。衣服亦更豐富並且漿洗得乾淨。更有充分餘閑的時間，從事於其他多方面趣味豐富的發展。

與工業中心並存的便是許多海口商埠。這裏有往來國外的輪船，有船塢，有堆棧，有銀行，有多數人口。人與貨的往來沒有停止。

工業生產力發展，人民生活程度提高，人民的體力智力亦日益提高。優生選種的方法，衛生疾病的預防，在彼時成爲人人所知的常識。所以人口品質，年齡，體力等等日益進步。再也不是東亞病夫。

人民的職業分佈，大大變動。從事農業的人大約仍有百分之三四十（中國人口約四分之一業農）。但從事工礦商運等等的人民日漸加多。國民收益分配，自亦隨之變更。美國一九三二年各級職業的國民所得分配爲：

政府人員	六、七九六（單位百萬美元）
製造業	五、八七三
商業	五、四〇八
自由職業	四、八一三
金融業	四、六一四
運輸業	三、五八五
雜類	三、三六七
農業	二、二三二
電氣業	九五八
通訊業	七四〇

鑛業 五二七

建築業 四五二

共計 三九、三六五 (見 Senate Document No. 124, p.26, 1934)

農業在全體中所占不過百分之六，而製造運輸電鑛建築五類（這五類可說是工業部門）共占一一、三七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幾達百分之三十。商業金融通訊，這三類主要可說是附屬於工業的共占九、七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合百分之二十五。兩類共占了百分之五十五。自由職業與雜類其中包括許多餘暇創造的文明生活在內。政府人員中亦包括若干工業人員在內。總數幾達百分之四十。粗粗說來，吾們可說美國人只將百分之六的收入，用在維持生命的糧食上，百分之五十五，用在增加生活享用的各種物質上，百分之四十左右，用在自由興趣的活動及社會文明的改良上。自然其中有許多浪費無聊下流墮落的因素在內，那是沒有利用得好。我們只是大段說法。中國工業化以後的收益分配，大概亦要接近這種型態。農業利益比美國可能會得成數大一些。礦業金融可能會得小一些。政府人員的收益成數希望他不必占第一位。但大致分配或許要跟美國的趨向相仿。從事於工礦金融運輸商業的人日多，從事於農業的人日少，這是工業化必然的結果。

農業並不是衰落退步。反過來農業是進步了。新式機械在農業中逐漸使用。農業經營制度經過整理，生產力大大提高。集體農場制或不必要推行，但每一農場所有的耕地一定要大大增

加，增加到技術上可以經濟使用的限度。耕農的數目十分減少，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則達到。使用機械的自耕大農場，是當時的普遍情形。農作季節性自然仍舊存在。在大平原上，例如華北，一年之中，像美國西部一樣，恐怕只消四個至六個星期的耕作。其餘十個月是作物在地中自己生長的長時期。(F. G. Nourse And Associates: America's Capacity of Produce) 這種情形，即使改換作物，亦不能完全改變。當此時候，會有農村工業興起，來利用農閑時間。藉高壓電力的輸送，鄉村中可以得到廉價充分的動力。因此許多輕工業在鄉村中發展起來。據日本的經驗，鄉村工人的生產效率竟勝於城市中工廠熟練工人二三倍。(見 Oriental Economist Tokio, August 1938: N. Hasegawa: Heads, Hands And Machinery) 農人因為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及鄉村工業的補助，其收益大為增高，其生活狀況亦大為改善。

美國六百萬農場中，百分之四十九農場甚小，只生產市場上出售農產品總量百分之十一。其外百分之一·五，大農場反生產百分之十八。(見 F. G. Nourse 前書) 所以即在美國，農業仍是家庭經營為主，並且這些小農場亦是自耕自食。將來的中國農業仍不免一大部分採取這種型態。仍舊保持一些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風味。農業不獨是一種謀生的職業，亦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最和不寬緩的方式。人之性情不同。天下總不免有許多願意多享一些山水清音田園風味而少嘗一些乾脆肥濃少謀一些心機的人。也有熱鬧夠了而願意換一些清閑口味的人。農業對於他們，自有心理上的興趣，與利益工作無關。這種別裁異調的職業，使社會生活更豐富有趣，

是有益無損的。在這輩人中間，傳統的細膩和平雍容閑雅的心境與生活，可以繼續保持着。但這時的農人。已不再是社會金字塔最下層的底腳。農業是他們獨立自擇的職業，是他們不願意過匆忙低等的都市生活而自己經營的樂園。所以他們並不卑順柔懦。他們有的是自信力與勇氣。但散漫孤獨的心理，在他們中間，恐怕很強。

至於農業經營許多技術的，政治的，天然的困難，自然大部分已經克服，或已完全消除了，水災、旱災、蟲災已很少。科學的發明，非但增加了灌溉功用，並且改變了氣候。作物病害消泯了，苛捐雜稅，更不用說，完全取消了。

這一部分傳統文明與思想的保存，並不妨礙中國工業化。不獨因為多數農人的心理與生活已經變更，並且因為農業在這時的中國，只是比較不重要的退隱的職業生活。雖然農人仍有百分之三四十，但他們已不是中國立國的根基。政治設施自然仍有農人的利益，但政權已不在農人或地主手中。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側重在工業，及其關連的礦冶金融商業上面。這些新的社會階級，是生產力解放中間創造出來的英雄。他們貪得進取緊張勇猛。他們能組織能團結。他們愛國家亦愛自由。他們的生存發展要靠國家。他們的自由，他們的職業，要靠國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是有能力的民主政府。完全執行人民意志，而人民亦積極自動參加。至於這種國家，將來是不是像 Lenin 說的那樣「羨謝蟬蛻」，要留待更後的數世紀去證明。

這時候的中國是一個陸權國。他大約要有二三十個完全機械化的師團，備有極堅強迅速的

坦克車。有一二萬架飛機，有原子彈。有數潛水艇。這些軍器全能自己生產。其預備的生產力甚大。可以一年或半年之內，重新生產全套軍備。所有士兵長官全是職業的，並且經過長期訓練。十九世紀全民皆兵的徵兵思想已成過去。但全體人民在幼年時，像 H. G. Wells 的建議所說，要受一種類似軍隊訓練的社會教育，在軍營中學習紀律，技術，團體生活與團體意識。（見 H. G. Wells: *Work, 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中國的軍備是攻勢防禦的軍備。他的潛艇與飛機足以消滅任何侵略國海軍進襲的企圖。不幸已登了大陸。他的飛機與坦克足以迅速消滅敵人登陸的部隊。不幸飛機坦克不熟可以於半年以內增加一半或三分之一。有這樣的軍備可以阻止任何擾亂東亞的野心，但中國自身沒有侵略野心，不積極建設海軍。國家主義與和平可以並存。

家庭關係自然要發生變化。家庭已不再是工作單位，所以家庭利益觀念，人家對我家之分，要減輕得多。但家庭仍是生活單位。家庭團結的意識，可能的會得仍比別國來得重。交通便利，各種社團增加，自然會得減輕人們對於家庭的興趣。但是像 G. E. M. Joad 所說，家庭是一個人生活最能放鬆，靈魂最不需要提防的地方，可以捲捲袖子隨便說話。（見 Joad: *The Testament of Joad*）一個工業化社會，人與人間，白天競爭計較了一天，晚上不能再提心弔膽。家庭正是供給了這完全休息的需要。在歐美各國家庭關係沒有十分親切的地方，人們不得不於晚間追尋低級的狂歡，以解鬆白天的緊張。但在家庭關係和滿的地方，加上子女親情的聯

係，科學新供給的娛樂如收音機 *Television*，以及別種博戲，很可以使火山生活，使 *strip-tease*，使回力球，使輪盤賭失去一部分引誘能力。中國人生活雍容細膩慣了。即使工業化，可能的在鬆散休息的時候，一部分和諧優游的文明，會得被家庭保存下來。事實上歐美家庭之和諧優游者也很多。中國人一向側重家庭，或許能夠更多保留一些。

社會上也許會得有下女，有 *Strip-tease*，有賭場。這些不足為奇。正如社會上也許會有冬溫夏清的孝子，有割臂救夫的烈婦一樣，也不足為奇。這些俱是個人好惡的自由，不在當時的道德問題以內，只要不太過火。妨害國家安甯與社會秩序的事情，才成爲問題。但國家是超階級的國家。他將儘力以求多數人民智識之提高，與生活程度之改進。故民治主義之理性，公平與自由，將儘量尊重。國家雖然有權，而不用權力來阻礙人民各方面的發展。不獨科學研究，技術研究，要受到國家的提倡。各種哲學問題，社會思潮，文學戲劇小說，從極左到極右，全可以自由討論，儘向各方面發展，而以不妨礙別人的自由，或社會秩序國家安全爲限度。輿論有很大制裁力量。

這種全體性的民主的國家組織精神（假使許我造一個名詞），在工業部門間也同樣代表着勞資關係。工人在本業中可以參加到經營管理的意見。有發展才能的機會。他們是爲社會國家負責生產的國民，而不是私人雇用伺候機器的奴隸。工業立法規定了工人神聖的地位，與經理技師一樣是整個生產中不能缺少的一節，所以一樣得到應得的報酬與享樂。靠着他們的努力，

中國的生產力，中國的國防，中國的民智，全可以提高。

這樣就是中國工業化以後的大段輪廓。自然人與人的關係，不能全無磨擦。儘管玫瑰花美麗而香，不能無刺。在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只可儘方避免無謂的過惡。許多我們不願見不願談的事情，或許要隨工業化俱來。那也不用驚惶。我們尙不曾見過完全無刺的玫瑰花。漸漸我們會過得慣，漸漸我們會改良。舊文化有保存的，我們不用喜誇。有變質消滅的，不用惋惜。新文化因素有加入的我們不要抗拒。若說工業化後的中國文化，比舊文化是好是歹，我不用說。新中國文化是合於時代精神，因之合於中國人生存發展光大的文化。文化本來就是生活與發展。新時代的生活方式與發展方向已經變了，我們不能不變，不變就要淘汰。要從不變的傳統社會到變後的新時代新社會，簡單只有一句話，乾脆又乾脆：

工業化！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35614.3)

中國工業化通論一冊

(原名舊文明與新工業)

定價 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著 者 谷 春 帆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84006

